

# 漫长的革命

〔美〕埃德加·斯诺 著  
THE LONG REVOLUTION

东方出版社

# 漫长的革命

THE LONG REVOLUTION

〔美〕埃德加·斯诺著 贺和风译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曹春

Snow, Edgar, 1905—1972  
The long revolution. [monograph]  
New York:Random House, 1972.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长的革命/[美]爱德加·斯诺著 贺和风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1

(红色档案丛书)

ISBN 7-5060-2354-7

I. 漫… II. ①斯… ②贺… III. ①史料 ②社会-评论-中国-  
1960~1970 IV. ①D652 ②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29496号

## 漫长的革命

MANCHANG DE GEMING

[美]爱德加·斯诺著 贺和风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京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68千字

ISBN 7-5060-2354-7 定价:15.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红旗东博览 网站编辑  
[www.mzdbl.cn](http://www.mzdbl.cn)

**此书谨献给**

精心治疗和照护了我丈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生和护士们

**献给**

赋予我丈夫爱与关心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洛伊丝·惠勒·斯诺

---

## 原出版者的话

1971年，埃德加·斯诺最后一次访华后返回了美国。1972年2月15日，他遽然长逝。如果他活着，他肯定会给《西行漫记》和《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的新版本添加注释和参考文献，为读者奉献更多的历史事实。他肯定会根据自己的记录，增加1970—1971年他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谈话的内容。

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洛伊丝·惠勒·斯诺在同意出版《漫长的革命》一书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我的丈夫刚刚开了个头，便出乎意料地离去了。书中播撒下了中美两国人民新关系的种子。在我们的培育下，它们将会成长壮大。”

# 目 录

## 第一编 不同的国度？

- |                     |    |
|---------------------|----|
| 1. 天安门上见面 .....     | 3  |
| 2. 周总理的暗示 .....     | 6  |
| 3.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 | 12 |
| 4. 局外的公民王某 .....    | 21 |

## 第二编 医疗保健与人口控制

- |                     |    |
|---------------------|----|
| 5. 针刺麻醉堕胎 .....     | 29 |
| 6. 针刺疗法是什么？ .....   | 33 |
| 7. 性与人口统计 .....     | 40 |
| 8. 例外的情况 .....      | 48 |
| 9. “把重点放到农村去” ..... | 52 |

## 第三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    |
|------------------|----|
| 10. 个人崇拜降温 ..... | 61 |
| 11. 文化 .....     | 68 |
| 12. 宣传的阴谋 .....  | 76 |

13. 公开战争 ..... 83

#### 第四编 军队、党和人民

14. 军事专政 ..... 93  
15. “为人民服务” ..... 100  
16. 作为建设者的军队 ..... 105  
17. 爱丽丝在南泥湾 ..... 111  
18. 军队和人民 ..... 121

#### 第五编 人民公社

19. 起点 ..... 131  
20. 令人动情的旅程 ..... 134  
21. 富人和穷人 ..... 139  
22. 回顾与展望 ..... 141

#### 第六编 与总理彻夜长谈

23. 周恩来与敞开大门 ..... 147

#### 第七编 与主席共进早餐

24. 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 159

第八编 尼克松要去紫禁城

25. 强势地位 .....	169
附录一 山南海北：1965年1月9日与毛泽东主席的 谈话 .....	178
附录二 1964年与周恩来的两次谈话 .....	208
索 引 .....	220

第一编

不同的国度？



---

## 1. 天安门上见面

那是10月里的一个朗朗晴日，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1周年庆典。我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拥挤的人群中没有人注意到我。我感到有人在拉我的袖子，我转过头去，看到那是周恩来总理。他很快把我和我的妻子洛伊丝带到毛主席的身边，我们在那里站了一段时间。那个位置是占世界人口1/4（或1/5？）的中国的中心。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举动总是有目的的。一定是发生了重大的事情，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城楼下是可以容纳50万人的宽大广场，广场的对面树立着一座巨大的标语牌，牌上写着毛泽东1970年5月20日声明的摘录，巨大的字体一个街区以外仍历历可见。树立这样的标语牌是要宣告，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的政变，反对朗诺的美国盟友，坚决支持新成立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联盟。为了突出这一点，西哈努克亲王也站在那个中心的位置，站在主席的另一边。亲王面带微笑（他喜欢微笑），我的妻子告诉他，反对入侵柬埔寨的美国人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他热情地回应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毛的号召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中国的宣传语汇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奴性十足的帮凶。

后来，《人民日报》在毛主席77岁寿辰那天刊登了我们在

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对我的称呼是“美国友好人士”。当天的报纸在右上角，也就是每天刊登毛语录的地方，登载的语录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主席尽力把人民同政府和政府的政策区分开来。如果这样做需要一个象征的人物，我愿意成为这个象征的人物：即代表众多的反对武装侵略和毁坏越南和其他印度支那国家的美国人。我在那里接受的，是向终于终结了马修·李奇微将军预言的“悲剧性重大错误”的美国反战者的致敬吗？是的，我接受的就是那样的致敬，但不仅仅是那样的致敬……

外国的报纸曾谣传，毛的手麻痹了，所以始终把手掩在袖子里，但是我注意到了，他握手时像以前一样有力。他比1965年我上一次见到他时消瘦了一些，看起来更健康了。我现在才知道，那时，他作为革命领袖，正在作出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和最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清洗他的由党选定的接班人、党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党内其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的一切走狗），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在我们观看精巧的彩车和活报车游行时，毛向我简要地谈了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游行组织得太好了！服饰的色彩和样式与工人和知识分子平时所穿衣服的单调形成鲜明的对照。游行队伍里有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身影，中国大约有47个少数民族，他们讲的语言超过20种，他们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或6%——中国目前的人口在7.5亿到8亿之间。今天的主题是生产和战备，蓝色和灰色的制服随处可见，但是，除了持枪的年轻民兵（有男孩也有梳马尾辫的女孩）之外，没有其他什么武器。

按次序行进的彩车装点的，是人们在公社、工厂、文化和军事生活中遵从的毛主席著作、语录和指示。最壮观的彩车上展示的是：火车模型奔驰在布满隧道和桥梁的崇山峻岭之中，它象征着最遥远的新疆和南部的中越边境已经完全贯通。全身和半身塑像比比皆是，其中不乏巨大的塑像，塑造的就是站在我身边的这个顶天立地的人物。他就是第二次解放，或者说是文化解放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这个运动的目标是保持革命的纯洁性，是使空前广泛的群众投身于其中。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城楼下人们齐声呼喊口号，许多人，不仅仅是年轻人，热泪盈眶。

“您怎么看这个游行？”我一边向满怀崇敬之意的游行者们挥手，一边忍不住问道。“它给人怎样的感受？”

毛面露嗔色，摇了摇头，说：情况有所好转，但他并不满意。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们的谈话就被后面的游行队伍打断了。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在一次长谈中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在那次长谈中，他相当坦率地谈到了个人崇拜的“讨嫌”。但我发现他在10月1日那天想的，不是人们用来拼组毛主席语录的场面、彩旗和鲜花。他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剧变期间丧失的生产节奏的问题，是促进越南战争结束和扩大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的问题。他还考虑了同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的可能性的问题了吗？

他问我，美国是否也有造反的情况。他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深刻（他在5月20日的声明中赞许了美国的反战运动），他希望对美国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做更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们很快会再次会面。

---

---

## 2. 周总理的暗示

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时间里，我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sup>①</sup> 1960年我终于能够重返中国，1964—1965年我再次来到中国。而这次来华是在1970年。我的妻子洛伊丝·惠勒是个演员，她以前从未到过中国，尽管她获得了与我同行的签证。但是前几次来华，美国国务院都以“不符合国家利益”为由，拒绝她访华，护照不“生效”。这次来华，她没有等待华盛顿的许可。

1960年和1965年，我两次访华的护照，也是在我的出版商对华盛顿高层施加压力之后，才得以“生效”的。我随后提交的报告当然也就被华盛顿的高层置诸一边。这10年间，我没能用些许有用的信息影响傲慢的决策集团，约翰·肯尼迪也很快忘记了他在1963年就职演说中说过的话，他没能在总统任期内把握“同中国开展新关系”的机遇，反而使我们身陷越南的丛林。这10年间的故事我已另文叙述。<sup>②</sup>

洛伊丝是为数不多的进入过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女性中的一员，此时此刻，她就站在我的身边，用她那机敏的双眼弥补我

---

① 作为记者，见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57; Vintage Books, 1972)。

② 见 *Red China Today: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2; Vintage Books, 1971)。

观察的不足。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8月上旬，适逢北京人所说的秋老虎季节，但大片的树阴和周边地区的造林工程，多少缓解了一些炎热。

自从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包括以前就住在北京的外国同情者，曾经获准到北京以外的地区旅行。<sup>①</sup>以前的例行旅游胜地（长城、十三陵、西山，甚至北京大型的博物馆和宫殿）已不再向游人开放。我和洛伊丝在这些地方的旧地重游，燃起了北京的外交官和外国居民的希望：“最紧张的时期”即将结束，他们的希望是正确的。

在我所熟悉的两所大学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一所是我曾经执教过的燕京大学；一所是燕京大学附近的清华大学，那是一所著名的工科大学。我们在那里听取了对几年来文化斗争和大学巨大变动的介绍，听取了关于红卫兵的故事和后来发生的故事。我们参观了现代化的农村医院，参观了一座机车车辆厂、一座钢铁厂，听取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其他方面的情况。其后，我们乘飞机飞往地处西北的陕西省，从省会西安前往著名的战时游击之都延安。我们继续西行到保安（今志丹）县——我们是1945年以来第一批到那里的外国人——深入到1936年我第一次会见毛泽东的群山之中。那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被通缉的“赤匪”<sup>②</sup>。我们参观了一座由军队和政治改造学校共同管理的国营农场，西安市的一位前市委书记带领我们

---

①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是一个例外。他是我在北京最年长的外国朋友，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走过的地方最多的人。他不久将要出版一部记述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旅行的著作。

② 见 *Red Star Over China*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37; rev. Ed., Grove Press, New York, 1968, 1971)。

参观了现在由他负责管理的养猪场。其后，返回西安，再返回北京，看了多场演出，多次与老朋友聚餐晤谈，然后飞跃长城，去了东北。在参观了多所企业、一座由军队针灸医生管理的聋哑学校和巨大的鞍山钢铁公司之后，我们南下广州参观了广州商品交易会。然后，我们再次北上，去了东部沿海的茶叶产区浙江，去了上海和长江下游地区，参观了许多人民公社，看到许多友好的人。

在我2月离开中国之前的6个月里，我一共参观了11个人民公社，这使我在过去的10年里参观的公社总数达到33个，这些公社遍及中国各地，而我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现在，到处是碧绿的农田、平整的梯田、茂密的树木，与毛泽东多年前的花园国家的愿望更加接近了。我们是多年来首次造访的西方人，所到之处，每每引来大批围观者惊愕的目光。当然，那还是乒乓外交开展前几个月的事情。

周总理欢迎我回到中国的第一项活动，观看乒乓球比赛。

那是1970年8月18日。我们接到观看北朝鲜与中国乒乓球队比赛的邀请，但由于事先已有晚餐约会，我们谢绝了邀请。晚餐吃到一半时，我的朋友姚伟（此前，我和他有诸多共事的经历<sup>①</sup>）打来电话，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准备出门”。我猜测要见我的人可能是总理，结果不出所料。我们在乒乓球馆（一座有18000个座位的漂亮新建筑）见到了他，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年逾80的（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迷人的妻子、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理李先念，以及其他的著名人士。

---

<sup>①</sup> 见 *Red China Today*, op. cit.

我们到达后不久，周总理离座而去，没过多会儿，有人把我们带到了一间会客室，总理正在那里等候我们。周穿着短袖运动衫、灰色的裤子，脚下是白短袜和凉鞋，他已 72 岁，银发也依稀可见，但仍然像以往一样机敏。他亲切地向我问好，同我讨论我的旅行计划，话题很快转入政治问题。（通讯员不断地向他报告比赛的比分，这样，在比赛结束时他就可以出现在赛场，那时就是比赛的高潮，中国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客人要走进赛场，向运动员握手祝贺并与他们照相留念。）

总理问了很多关于美国的问题，这使我想，他是不是认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在亚洲发起新的重大军事行动”。他把这个问题推回来，让我自己回答，但他提醒我说，中国的第二个威胁在北方——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

“如果中国谋求缓和，”我问道，“与俄国谈判还是与美国谈判可能会更好？”

“这是我一直问自己的问题。”他回答说。

这时，乒乓球比赛已接近尾声，总理说我们下次见面再谈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喝完了咖啡，我们就起身去同比赛的双方握手去了。

10月1日，我与总理有过短暂的会面，那时他说，美国人曾提出重开中美会谈，但中国不感兴趣。后来我把一些问题留给他。11月5日，也就是我回到北京以后，他给了我四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谈到了各种各样的话题。像以往一样，总理总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但他最引人注目的话题，是在北京举行中美会谈的可能性。

中国的条件仍然是要求美国从台湾岛<sup>①</sup> 撤出它的军队和军舰。1960年，毛主席与我谈过话，他允许我直接引述的是这样几句话：“我们希望维持世界和平，我们不希望战争。我们认为，不应把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手段。但是，不仅中国有维持和平的责任，美国也有维持和平的责任”。他还说，“台湾是中国的事情，我们坚持这一点。”

周在1960和1965年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现在，他对我重复了他说过的话。“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国的武装侵略是另外的问题，是国际问题，我们准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他回忆了尼克松总统1969年就职时曾宣称，他愿意缓和紧张关系，希望同中国谈判。此外，尼克松曾知会北京，如果华沙不是适当的地方，会谈可以在北京举行。北京的回答是，很好，尼克松可以自己来，也可以派特使来，讨论台湾的问题。

但是，尼克松没有回应。接着发生了1970年3月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中国的结论是，尼克松说话不当真。

“门还敞开着吗？”我问道。

“门是开着的，但要看美国是否认真对待台湾问题。”他补充说，所有其他问题，都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枝节问题”。

---

① 甲午战争后日本攫取的中国领土。1943年开罗会议和1945年承诺归还中国。1949年，台湾省成为蒋介石逃离大陆后的避难地。1950年，杜鲁门对台湾周围实施海上封锁，阻止了中国的统一。1955年，艾森豪威尔与蒋正式结盟（美国承认蒋的国民党政府对全中国享有主权，并对蒋介石政府提供援助，使之占据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直至1971年），使台湾成为美国事实上的保护对象。

那次谈话到那儿就结束了。我从其他评论中明显感到，中国人把尼克松的“和平协议”看作是诡计。他们密切注视着尼克松在东南亚的行动，注视着他为了使日本接管美国在东亚前沿的“防卫阵地”而扶植其军事力量的举动，也注视着他与俄国达成牺牲中国的交易的可能性。

总理的谈话无拘无束，始终搞不清采访在哪里结束，当时不能发表的谈话内容从哪里开始。我送交校样是根据自己的笔记整理成的一篇长篇报道。一个星期后，清样才被送回来。官方的文本删掉了上文所有加重的文字。就是在那一个星期，叶海亚·汉总统从巴基斯坦来到了北京。现在事情已大白于天下，他带来了尼克松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尼克松总统在信中正式提出他访问北京的问题，并将先期授权一位特使（亨利·基辛格先生）“讨论台湾问题”。

几个星期之后，我从毛主席那里获悉，尼克松的特使很快就会起程。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能得到获知这个消息的信任。我记得，1936年我秘密进入和离开中国西北部的红色根据地时，我得到的消息是，蒋介石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已经与红军达成了秘密合作的协议，以迫使他的总司令结束内战，组成抗日统一战线。那个时候我也有获知那个消息的充分理由吧。

---

### 3.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我已经谈到，毛主席专注于重建党和国家的上层建筑的问题。它们为什么需要重建呢？这个问题说来话长，留待后文回答，不过现在谈一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无裨益。“文化大革命”即使没有使政府解体，也暂时使中国共产党解体了。

毛领导的大规模清洗，开始于1966年中，一直持续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这届中央委员会的核心，是幸存的原中央委员和新当选的“新鲜血液”。1970年11月，周恩来告诉我，大约95%的党员<sup>①</sup>已经恢复了组织生活。但是，恢复组织生活并不一定会重新分配工作；许多人要等到完成“斗一批一改”这三个改造阶段之后才能“解放”。

毛的目标之一，是“精简机构”。我发现省和市两级的精简幅度相当大，而首都的中央政府的精简尤其剧烈。例如，1971年初，周总理告诉我，他只有两位副总理协助工作，而以前他的助手是七位。

“过去，中央政府的直属部门有90个，”他说，“现在只有

---

<sup>①</sup> 1966年初党员人数据说为2100万，其中的80%是1949年以后入党的党员。

26个。这些部门现在都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在每一个革命委员会里都有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以前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人。”

被撤了职的干部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中的大约80%从北京被送到了农村，进了因毛的1968年5月7日的一个指示而得名的“五七干校”。<sup>①</sup>在“五七干校”里，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再教育要与在通常是新开垦的土地上进行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相结合。“下放”到干校被看作是党内不断进行的再教育，而不仅仅是处罚。将来，除了最高级的干部以外，所有的干部都将定期“下放”经受思想检验，这将是一种例行的政治治疗。

“年富力强的干部将到各地方去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周说。“以前中央各部所属而现在移交地方的企业和院校，需要很多人帮助管理。其余的许多人已年过六旬，准备退休了。有些人选择和他们在干校的家人在一起生活。”这样，所有的人都会有工作。

这种向地方下放权力的政策，也反映出强化各地区和地方自给自足的目标，不仅仅限于粮食的自给自足，而且包括在一定程度上以农村地区电力发展为基础的工业化。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也就是城市知识青年和新就业的年轻人迁移到内地的县城和公社，一直没有中断。仅仅上海一地，自1965年以来迁出的人口就将近一百万。据估计，包括文化革命初期的红卫兵在内，迁移人口的总数达数百万之众。

但是这样的机构改革，只是全国混乱状况的一个方面。毛

---

<sup>①</sup> 见第17章，“爱丽丝在南泥湾”。

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使党的思想无产阶级化，此外，是推动无产阶级为自己真正取得权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创立一种摆脱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遗产支配的新文化。

正是为了这一目标，毛审慎地冒了使这个由他而不是别人建立的党遭受严重破坏的风险。毛最初的意图，是剥夺“一小撮人”的权力。清洗的对象逐渐涉及到许多高级领导人和毛的最老的同志。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人中有 1959 年接替毛成为名义上的国家首脑的刘少奇。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毛自 1935 年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自 1943 年正式成为党的主席，而刘在 1956 年成为毛的第一副主席。但是，到了 1964 年，毛失去了对他的“接班人”建立的大部分党组织和国家行政机构的有效控制。1965 年，毛无法在北京的党报上发表一篇意在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传攻势的重要文章——他在 1970 年就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不得不在上海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单行本。这篇“重要文章”就是批判吴晗的题为《海瑞罢官》<sup>①</sup> 的剧本的那篇长文，那个剧本影射了毛泽东在 1959 年举行的党中央全会上撤消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职务，并用林彪取而代之。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都反对发表那篇文章。

在毛的名义下管理国家领导机构、工会、党校、青年团和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官员的，正是刘少奇和他在中央委员会里的盟友。大部分干部可能认为自己是忠诚的毛主义者。而刘和有着与他相同想法的同志，尤其是在 1959—1961 年的经济危

---

<sup>①</sup> 见第 12 章，“宣传的阴谋”。

机之后，似乎在理论上容忍了对毛的崇拜，而在行动上则轻视毛的思想。他们把经济置于高于人的地位，主张物质刺激先于人的热情，抓生产而不管阶级斗争，依靠“专家”提高技术，为了服务技术而用经济统帅政治，偏爱城市轻视农村。他们希望扩大国家信贷（和国债），不想要大跃进，不相信通过艰苦的集体劳动积累资金。

产生“文化大革命”的理由，就是上面这些说法。

毛与刘之间的危机，甚至早在1959年以林彪取代彭德怀的斗争中就已经萌生了。毛预见到了随着以刘为首的有城市工作背景的干部的不断壮大，他与这些人之间要有一场斗争，以林彪取代彭德怀就是毛在这场斗争中的第一个公开举动。林彪是毛的最忠实的追随者，是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而毛自1935年以后一直是党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尽管刘可以成为国家的首脑，可以控制非军队系统的干部，但毛仍然是党的主席，人民解放军是决定胜负的王牌。以林彪出任统帅，那张王牌似乎就稳稳地握在毛的手中。但是，毛要用事件来决定结果，显然他最终放弃争取刘，而发动对自己追随者的清洗的时间要大大晚于许多人的猜测。

“您是什么时候最终作出刘必须下台的决定的？”我在1970年12月与毛的一次谈话中问道。

他回答说，决定是在1965年1月作出的。当时，毛向政治局提交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sup>①</sup>的产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在林彪的领导下在军队展开，继而扩大到农村的人民公社，最后才逐渐在城市展

---

<sup>①</sup> 见第78—79页。

开。社会主义教育纲领的第一条明确地谴责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要求撤消他们的职务。这一条现在成了新运动，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条。毛说刘在那次会议上当场反对那个第一条。

“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在1965年1月，也就是我上次见到您时作出的了？”

主席说，是1965年10月批判《海瑞罢官》之后决定的，后来就迅速展开了。

政治局在早些时候（1964年）已经成立了彭真任组长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彭真是北京市市长，还是权力很大的党的市委书记和吴晗的保护人。1966年2月，彭试图保护发表影射毛和毛主义作品的吴晗等人。彭试图只就他们作品的“学术”错误而不是政治错误进行批判。彭既没有同毛商量，也没有同其他市委委员商量。1966年5月16日，彭明确地受到了批判。

毛说，那一天，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11次全会，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sup>①</sup>和随后的清洗。

“刘少奇反对十六条决定吗？”我问道。

毛说，他在会上对十六条的态度非常含糊，但实际上是根本反对的。那时，毛已经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sup>②</sup>。刘已陷入惊恐的境地。

---

① 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② 人们尤其是学生写在大开纸张上的标语或其他文字，它们被张贴在墙上、树上或其他引人注目的地方，它们后来成为红卫兵和其他人攻击党的领导人和攻击拒绝发表他们文章的报刊，并沟通消息的重要手段。

“您的大字报是‘炮打司令部’吗？”“刘知道他是司令吗？”

是的，那时候党的权力，宣传工作的权力，各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甚至北京市委的权力，都脱离了毛的控制。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在1965年1月对我<sup>①</sup>）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个人崇拜”，但需要有人崇拜。

毛直率地诉诸自己巨大的个人魅力和声望，以之作为他争取全面恢复指引革命航向的权力的重要武器。

他说，现在，也就是1970年，没有这种必要了，“个人崇拜”要降温。他的理由是，必须用延安时期（1937—1943年）的活力和理想激励全国人民。在那段时期里，毛撰写了多部重要著作，在他的领导下革命者已经做好了夺取最后胜利的准备。

现在，必须要“政治挂帅”（毛的教导）；要解救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双重战争威胁下的民族危机，就不能允许异端的存在和党的分裂；这意味着要依靠“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下的自力更生。这也意味着要向地方下放更多的权力；要激发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让城市里的人向农民学习，让农民向城市里的人学习；优先考虑占人口总数70%—80%的农民的需求；用劳动和农民自己的集体投资创造资金；以有“人民的大学校”之称的解放军为榜样，清除一切资产阶级的流毒。

简言之，毛的要求就是，无产阶级权力的接班人要重新体验老一代人的革命生活经历，并得出这种经历必然会得出的结

<sup>①</sup> 访谈全文见附录《山南海北》。

论。

毛深信无疑，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产生一个新的阶级，一个手握重权的高层官僚集团，一个脱离了劳动和人民的官僚集团。还有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刘提出在中苏关系的僵局中寻求妥协。毛主席对我说，这个提议得到了彭真等人的支持。

1965年，美国对越南的轰炸逼近了中国边界，中国受到了入侵的威胁。刘希望派一个代表团参加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以重新启动中苏联盟。毛坚决反对使中国陷入像在朝鲜那样的从属和可能受骗的境地。他坚决主张，采取完全依靠自己的人民防卫战的姿态（继续研制原子弹），大力支持越南，但并不介入越南。

如果在中国应对外国侵略威胁的传统战略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毛的路线似乎极不正统。以夷制夷是中国古老的基本原则，可以同罗马及其后继者奉为圣典的分而制之原则相比肩。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国人和精通中国历史的西方中国通都认为毛失去理智了。是弱者采取了使自己的敌人联合起来和引发“两面作战”的政策吗？是“把祸水引向他们两家屋里”的国际宣传攻势吗？但是，毛知道他正在干什么。更大的威胁来自国内，而不是外部。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方的妥协，当时只会造成国内阵线的分裂。坚定地独立和统一的中国能够承受任何风暴。中国如果被一个谋求从中苏结盟中获益的派别从内部分裂，就不能承受风暴。

还有许多矛盾的次要问题和具体政策，但上面的两个问题是基本的问题。现在有人说，毛和刘从他们1921年成为共产党员的那一天起，就一直代表着“两条路线”。“两条路线”无

疑在那时就存在着。用毛的惯用说法，那也是他们担任党的领导的45年间，“非对抗性矛盾（逐渐）转化成对抗性矛盾”的事例。是个人的权力斗争？不能把主观因素完全同客观现实隔离开来，但是毫无疑问，毛刘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对影响伟大的中国革命命运的方法和目的不可调和的不同看法之间的斗争，当然也包括个人崇拜的作用。

大量的文献记录了1966年8月决定之后发生的事件：解散党委和共青团、工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学校停课（许多学校此前已经停课），放任大批非党青年成立红卫兵组织和打倒党的高层领导，争取成为新领导的自由夺权斗争，最后是军队的介入。这个简要的提示已经足以表明，毛（在军队的帮助下）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所以党的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林彪能够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林在这次会议上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思想的下述目标到1970年已经遍及全国：加速消灭城乡差别；缩小工人、农民、士兵、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在物质、文化和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在每一个人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中，把书本知识与劳动实践结合起来；清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尤其要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在知识分子和官员中的余毒；通过使学生与工人相结合和使书本知识与劳动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高等教育无产阶级化；把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送到农村群众的手中；使每个人都接受军事训练，都向解放军学习；培养出一代多才多艺、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使他们怀有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理想，鄙视个人财富，准备献身于使人们最终摆脱饥饿、贪婪、无知、战争和资本主义的“世界

观”。

就是这些吗？是的，但远不止这些。我对文化大革命过去和现在含义的解说，只是转述了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内容，与我谈话的人不仅有官员、毛主义积极分子<sup>①</sup>，也有受过毛思想“锻炼”的人。

啊，道路是漫长和艰难的，必须一步一步地走。今后还要进行文化革命。如毛所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必须在品尝了每一口之后才能品尝下一口。

那么，在党的“九大”上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两年之后，非党人口，也就是绝大多数的成年人，他们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

---

<sup>①</sup> 积极分子是得到自己组织认可的，既学习和了解毛的思想，也在生活中运用毛思想的人。

---

---

## 4. 局外的公民王某

公民王某，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一位男子，1965年以来，他头上没有长角，也没有光环。一个工厂幼儿园的孩子们给我唱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个工厂有自己的防空设施，这是一种新生事物。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说，他们热爱毛，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说的话。不过，除了每一个人胸前戴的毛的像章，公民们的外表仍然与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所见非常相像。

人们的服饰更加单调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蓝色或灰色的上衣和裤子，冬天则在衣裤里絮上棉花，还有人穿着绿色的陆军或蓝色的海军军装。要是不戴红色帽徽和领章，简直区分不出谁是军人谁是老百姓。不少女人在家里穿的衣服颜色更鲜亮质地更好，几乎所有人都在家里备有一两套丝绸或毛料衣服，以备特殊场合穿用，但是街上的服饰现在是无产阶级化的。

“过不了多久，”我的一位老朋友说，“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服饰。你看那边的妇女，他们带的围巾样式都是新的，颜色也更鲜亮。这就表明宽松的时期就要来了。”在一位专业人士的家中做客时，我注意到家中的媳妇们品评摊在桌子上的印花布料。他们正在专心地看时装书，真想不到，那是一本日本出版的时装书。

在城市里，现在要把知识分子与工人和农民区分开来更困难了。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意气，并被精心地融入了芸芸众生。由于现在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所以五年来识字的人更多了。在中国的城市里，很难找到 50 岁以下的“睁眼瞎”（中国把文盲叫作“睁眼瞎”）。人们举止坦诚庄重，彼此礼貌相待，没有等级观念。我发现，新建的工厂中的工人几乎都是中学（高中）毕业生。

20 年来的植树造林，美化了城市和乡村，全面的土地改造，像刚刚刷洗过一样，使古老的大地焕发出了光彩。中国明显地比过去更加富裕了，但那不是私人财产的富裕。公民王某现在衣食富足，身体健康，每个星期工作六天，他参加劳动，参加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还学习技术。在休息日（通常是星期日，但常常不是星期日，休息日交错安排是为了缓解拥挤），他与家人一起消闲娱乐，有时打打乒乓球，夏天到游泳池或江河湖海去游泳，游泳在中国仍然是一项新的运动。冬天，他和别人一道去农村远足。他也可以自愿与医生或教师一起去防空设施挖洞制砖。

与每一个人一样，王也属于一个单位。在城市里，他通过居民委员会接受党的培训。居委会负责的事务包括：照看孩子、打扫卫生和控制污染、调节纠纷、福利、保健、扶助老年人和残疾人。在人民公社里，这些工作是由村里和生产队分担的。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洞察公民王某的内心，但是，如果说王某有担心的事的话，那么他担心的事显然不是食品价格、医药费用或税收的上涨。十年来，价格稳中有降，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黑市。王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的收入取自剩余劳

动价值，收取的方式是在国营市场上实行价格管制，这种管制可以使消费保持在计划供应的必需品的范围之内。公民王某的生活费为数非常有限，但没有银行抵押和债务，也不用害怕困扰过他父辈的饥饿和贫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逛公园、去运动场锻炼、参观博物馆、听讲座、听音乐会、听收音机、看电视、看戏等等，门票价格不高，甚至根本不收费。1970年，他读书的范围，除了毛的著作就是教科书。他可以有一部长波收音机，也可以买零件组装一部短波收音机。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他可以拥有电视机。与国外相比，电视机要昂贵一些，而且通常是由单位集体所有。与戏剧一样，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充斥着政治宣传。看戏和看体育比赛的门票供不应求，实际上（尽管售票处也出售少量门票）只有通过单位才能得到。电影有很多，票价也便宜，但新片不多。

我们的朋友看到的墙上的标语，写的都是毛的指示或规戒；张贴在公共阅报栏上的报纸，只刊载党的系统的消息；外国的消息不多，经过了仔细的筛选；人们看到的内容都不会使人们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但中国的所有事务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王先生也不会为另一些事情烦恼，比如：谋杀、市场波动、色情、种族骚乱、离婚丑闻、吸毒、赌博、卖淫、虐待和受虐，以及对富人的嫉妒。根本就没有富人。也几乎没有腐败的官员、小偷或寄生虫。尽管阶级敌人仍然存在，但那也主要是由于有国外的邪恶势力。

简言之，就像某位头脑清醒的人对我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道德深入人心的国家。

以上所述是旧话重提，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工资方面的变

化也不大，只是低、中工资的水平略有提高，高工资有所减少。例如，高级军官最近自愿减少了30%的工资，我在杭州遇到的一位将军就是这样告诉我的。高级官员的工资也有相应地减少（据报道，毛泽东的工资减少了20%）。在工厂，学徒工以上的工资标准，是每人每月20—5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8—122元<sup>①</sup>），视年龄、级别和经验而定。少数资深专家与资历较浅的将军，工资大致相当，约为100美元。高级干部或资深将军的工资，约为每月150美元，但是如果没有被赡养人，工资中有相当部分会返还国家。农民的收入差别很大，现金收入远少于城市工人的工资，但是，实物收入和副业收入，使公社社员的收入比以往更接近城市工人的同等水平。

在我访问过的十余个城市和许多农村的乡镇和人民公社里，我看到消费必需品的供应有所改善，价格略低于1965年，但质量提高了。举几个实际的例证，以半公斤（1.1磅）重量计：各种供应充足的时令蔬菜，1—2美分；优质大米，8或9美分；面粉，5—6美分；土豆和甘薯，2美分；羊肉、猪肉和牛肉，20—40美分；蜜饯和糖果，30—80美分。

以前，中国人很少吃鱼；现在，即使是在内地，出售的鱼类随处可见，售价是每半公斤20—40美分。牛奶每夸脱10美分；啤酒每瓶20美分；甜饮料5—10美分；冰激淋和冰棒每支2—4美分；（干白和红）葡萄酒每瓶50美分；杜松子酒55美分；鸡蛋每打30美分。在专供外国人购物的商店里，可以用略高的价格买到专供食品，上好的黑鱼子酱，价格约为每磅

---

<sup>①</sup> 官方汇率是人民币2.44元兑1美元，出于统计的目的一般计作人民币1元等于0.44美元。

2.5 美元。

街上餐馆的特供套餐，馒头、泡菜、红肠和汤，每份 4—6 美分。工厂食堂的一顿饭要花 10—15 美分。大部分中国人穿的毡底布鞋，价格是 1—3 美元；皮鞋的价格从 6 美元到 10 美元不等，合成革的鞋售价为 2—3 美元。棉布衬衫 2—3 美元；婴儿成衣每套 2—4 美元；皮毛帽子售价 5 美元；镶有羊皮、皮革或布料衬里的大衣售价 20—40 美元；免熨的便装衣裤 6—10 美元。

粮食制品、食用油和棉花制品仍然定量供应。粮食定量依工种而定，约为每人每月 30—45 磅；由于现在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人们可以饱腹有余。中国的棉布产量居世界领先地位，<sup>①</sup> 棉布在中国的外贸和外汇收入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而在中国内部，棉布是定量供应的，定额约为每人（包括婴儿）18 英尺。合成纤维和毛织品没有定额，需求量很大。食用油的定量高于家庭的平均需求。除了这些定量供应的商品外，消费品的供应都是没有定量的。中国没有私人汽车，但城市中和城市之间的公共交通服务已有所改善，尽管公交车仍然拥挤。中国的火车可以进入世界最佳之列。公共交通的费用是低廉的。

我们在街上（或是村路上）遇到的人，可能每个人的家里至少都有一辆自行车，其售价为 35—45 美元。人们的房租（维修费用）每个房间每月 1—2 美元。住房条件差别很大，但普遍得到了改善。在农村，农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而且不用纳税。与人民公社的情况一样，产业工人的医疗费用是由单位支

---

<sup>①</sup> 见第 149 页。

付的。医疗费用只相当于西方国家医疗费用的很小部分。避孕药是通过单位免费发放的。

除此而外，要全面了解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要深入地研究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给工厂、初等和高等教育、农村人民公社、医疗服务、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国防力量，带来了极其深刻的组织和政治的变化。到陆军、海军和空军中服役，是青年人最青睐的经历，但能被选中的人并不多。毛的年轻的接班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即符合“忘我：为人民服务”格言的要求，这种新的态度在把医疗和对人的关心从城市延伸到农村的过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 第二编

# 医疗保健与人口控制



---

## 5. 针刺麻醉堕胎

我们在医院的一个小房间里观看了一种新的针刺疗法。带领我们观看的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林巧稚医生。一位面带笑容的患者正在接受堕胎手术。患者是 28 岁的工人，没有实施麻醉，只是在耳垂上扎了两根消除痛感的针。

林医生是第一位毕业于英国的中国女性妇科医生；后来，她在芝加哥做过实习医生。林医生是中国现代医疗事业的先驱，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一直从事培养妇科和产科医生的工作。她是虔诚的基督徒，笃信上帝，这是她与她的朋友周恩来不时争辩的一个话题。她的英语流利而且动听。她说自己的英语已经“生锈了”，并为此而向我们道歉。

“我最初是儿科医生，”她说，“但是，我不能忍受看着婴儿死亡，所以我转行做了接生。”

林医生已将近 69 岁，过了退休的年龄。她身材瘦小，性格坚强，依然像以往一样朝气蓬勃。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现职人员，是一所医学院的教师，她每天要在前北京协和医院她所属的部门工作 4—6 个小时。协和医院是半个多世纪前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兴建的，它曾是中国最先进的医院和医学院。文化大革命期间，协和医院被改名为反帝医院，现在的名称是首都医院。医院的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中，有 60% 是女性。产科和妇科，女性能占到 90%。医学院的学生大约是

男生和女生各占一半。

患者友好地笑着告诉我，她允许我在手术进行时拍照。她怀孕 10 个星期了。附着在 8 号扩张器上的一小段不锈钢管被接到一段软管上，软管通向一个容器，并与空气压缩机和电泵相连。与一辆自行车的拉力大致相当的负压，就能产生适于堕胎的真空：在农村地区，这种装置可以用脚踏动力带动。这种堕胎的方法现在已被农村人民公社的医院普遍采用。

“这种方法简单，实际上无痛感，不出血，也没有严重的副作用。”林医生解释说。

术中，患者告诉我，她有两个孩子，不想再要了。国家提倡一对夫妇生两个或三个孩子。城市里的正确婚龄，是女性 26 岁，男性 28 岁，而且越晚越好。“提倡”和“正确”仍然远未普遍实行，但是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现在对违反者是表示反对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年轻人年龄不大就结婚了，农村人常常在 20—25 岁就结婚，但他们并没有像外国人说的那样，受到“处罚”，或者是被强迫分居。

“你疼吗？”我用中国话问。她笑了笑，摇摇头。她说她运用了毛泽东思想，大概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吧。不到 10 分钟，她就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我并没有完全信服，几天后我又观看了另一例堕胎手术。患者是一位 29 岁的年轻妇女，在电器工厂工作，已经有一个 6 岁的男孩。她说，她一直使用避孕环避孕，不过现在要改用避孕药了。这次手术还是用的针刺麻醉。与上一例手术一样，她很轻松，好像没有任何感觉，就被告之手术已经做完，真是令人惊讶。她坐起身来，与我说了一会儿话。

“现在我有两个星期的带薪休假，”她说，“但是，今天下

午我就要回厂工作。我感觉很好。厂里需要我，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才能提前完成定额。”林医生告诉她，卧床休息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了。

堕胎手术是免费的，只需母亲一方提出要求，但最好征得家人的同意。避孕药的实验开始于1964年。此后，中国研制了一种服用22天的避孕药，并逐渐取代了避孕环和其他避孕器具。这种避孕药从月经后的第五天开始服用。巡回医疗队、军队和人民公社的医疗队等所有的医疗组织，都免费发放计划生育宣传品和避孕药。目前，避孕药品供不应求。

显然，中国并不鼓励把堕胎作为避孕的替代措施。堕胎通常是补救已有一个以上孩子的母亲未采取避孕措施或避孕失败的最后的手段。因为中国没有私生子是非法的说法，父母双方都有照顾孩子的责任，所以，堕胎通常不是避免出现未婚母亲现象的手段。也有一些怀第一胎的母亲想要堕胎，但除非怀孕会危及母亲的健康，一般都会受到劝阻。

林医生告诉我，用针刺麻醉实施堕胎手术开始于1968年，现在已广泛应用，针刺麻醉还用于分娩（在中国，约90%的分娩是顺产，但在难产的情况下，要用针刺或其他方法实施麻醉）。但是，这种已被认为是成功的方法（在专业麻醉师稀缺的农村地区，这种方法尤其重要），并没有予以公布。令我感到懊恼的是，反帝医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要求我不要发表我拍摄的照片，也不要报道我看到的手术。一段时间以后，周恩来总理向我问起我采访的情况。他说，关于针刺麻醉的新闻报道，送到他的办公桌上等待审批，已经有几个星期了。他说，他对我的医院采访感到满意，并亲自批准发表我的报道。我不能设想，尼克松总统或柯西金总理会花时间处理这么琐碎的事

务。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周简直就是一个有三头六臂的人物。

---

---

## 6. 针刺疗法是什么？

革命胜利前我曾经在中国居住过，可我从来没有认真地了解过针刺和艾灸。与大多数外国人一样，我认为中医大多是庸医。1960年第一次重访中国时，我发现中医值得付诸更多的关注。我知道，从1958年起，中国要求学西医的医生至少要花6个月的时间学习中医。中医有着2200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关于中医的著述、处方、疾病症状和疗法的记载卷帙浩繁。

我与许多中国和外国的医生谈论过针灸，但我认为，我曾引用过的威廉·Y·陈博士1961年的一篇报告<sup>①</sup>，仍然是对针灸所做的最简洁的说明。陈是美国公共卫生署的资深外科医生，他在全面的研究过程中，根据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对近期访华的外国医生收集的资料的考察，以及对中国（25份“重点”）专业医学刊物研究的分析，就针刺作出了这样的评论：

中医是一种以4000年实践经验为基础的经验性医术。它的关于健康和疾病的简单概念，是身体功能上阴和阳两种力量的调和或失调。中医对解剖学和心理学没有实际的贡献；但

---

<sup>①</sup> 见《今日红色中国》（*Red China Today*）第299—300、305—306、308页。本节的某些材料取自该书和该书的最初版本《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 New York, 1962）。

是，有大量记载基于对疾病观察的关于草药、药剂和疗法的典籍。这些药剂以及针刺、艾灸、按摩和气功疗法等运用的结果，无疑有其经验的价值……

针刺……是把热针和冷针刺入身体的特定部位。针可细可粗，可长可短（从3厘米到4厘米不等）……针以不同深度刺入和刺激不同的组织或器官，就会引起生理反应，从而产生疗效。

现在，针灸师必须学习无菌技术和基础解剖学，学习“助理医生”的必修课程。针灸师都隶属于医院，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有针灸师。许多针灸师都使用低压电针。针刺疗法有时还与放射疗法结合起来使用。陈博士说：

针刺疗法的假设是，针刺产生的刺激，从未梢神经传导到大脑皮层，并抑制大脑中的异常刺激。这种解释，似乎符合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

针刺疗法在实践上广泛运用于从阑尾炎等外科疾病到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各种疾病。人们认为，它对神经系统的疾病或源于神经系统的疾病疗效最佳。据报道，针刺疗法治疗面瘫、关节炎和湿疹有良好的疗效。一位长期患关节炎的俄罗斯医生报告说，针刺疗法极大地缓解了他的病痛。一位在1958年赴中国学习针刺疗法的印度医生，最初对针刺疗法的价值抱有疑虑，但他后来认为，中医和西医的结合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他的急性鼻窦炎就是用针刺疗法成功治愈的<sup>①</sup>。

---

① 引自“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China Quarterly*, No. 6, April - June, 1961.

我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遇到过接受中医治疗的患者，他们所患的疾病包括：阑尾炎、湿疹、风湿病、鼻窦炎、结核病、周期性偏头痛、头疼、支气管炎和各种神经衰弱。我在汉口见到一个病人，到医院时已失去知觉，西医的诊断是阑尾炎。经过中药和针刺治疗，他已痊愈出院。

中草药和针刺疗法是共同产生作用的，草药医生往往也是针灸师。翻译中医术语是很困难的，不过最基本的就是阴一阳“相生相克”的概念。中医认为，身体是有机的整体；疾病是由不同的脏器及其子脏的失衡引发的，而治疗就是恢复平衡与和谐。要恢复平衡，就要平复阴一阳，表—里，寒—热，虚—实这八种要素的紧张“对抗”。

针刺指南是根据那些原则和平衡原则之间的“生命力”而绘制成的人体图。通常，平衡状态下，“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如果出现了“失调”（疾病），就是有一个脏器或一套功能，或是过度劳累，或是受到过度刺激，或是受到损害，或者是受到其他侵扰。医生的任务，就是消除产生矛盾或充血的原因。

“疾病有内因和外因，”我以前访问反帝医院（当时叫北京协和医院）时，医院的副院长徐医生对我说，“大脑的高级神经系统当然会影响整体的生理状况。怒气冲冠<sup>①</sup>会造成器官的疼痛或损伤。患者就诊时自诉的疼痛，西医可能诊断为血压过高所致，而中医则会采用药物和针刺结合的疗法。”

“西医常常只了解病症和病史。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整体，要受内部和外部紧张的影响。中医要了解患者的家庭、患者与

---

① 大意，不是确切的翻译。

父母的关系、他是否喜欢自己的妻子、他的工作情况、他有什么怨愤、他的生活中有什么不和谐的地方、他是不是城里人、他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诊断要考虑的问题。”

“南方还是北方？那也有差别吗？”

“有差别，某些药物北方人服用是‘热性’的，南方人服用会产生‘寒性’反应。”

“我想，这种问诊也要问患者的政治思想了？”

“当然——各种冲突都要考虑。”

这次和随后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中医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分析师和精神病医师，针刺疗法常常被用做体克疗法。我不知道，当代中国因无法解决的压力或焦虑引发的疾病，是否比嫉妒竞争体制下的美国更多。前文引述过的陈博士的报告认为，中美两国的高血压和心脏病（无论这证明了什么）的发病率大致相同<sup>①</sup>。我没有关于中国神经衰弱疾病的统计数字，但我在医院和疗养院见到的病人似乎非常多。共产党人力图建立的体制带来的社会压力，显然会引发严重的内心紧张，在几乎没有发泄渠道的情况下，大批患者去看中医，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共产党人正雄心勃勃地通过把中医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方式创造一种新的医学，他们能否成功，时间会给出答案，”陈博士在文章的结尾说，“不管结果如何，它的发展值得我们不断的关注。”<sup>②</sup>

---

<sup>①</sup> 中国的医学文献认为，中国的发病率肯定更少。

<sup>②</sup> 引自“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China Quarterly*, No. 6, April - June, 1961.

笃信针刺疗法的英国已故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早在1957年就报道过“国际针灸大会正在举行，”数百位欧洲医生正致力于“把西医学和西医技术与古老的中国针灸学和针灸技术结合起来”。他说：

在膝下小腿的表皮刺入一根针（在其他地方针可以刺得更深；他们技法熟练，不会引起出血），会影响肝脏的功能，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认为）在健康的机体里，能量通常是不断循环的……针刺可以改变能量的流向并使能量循环趋于正常。

按照中国针灸医生的说法，四肢、躯干和头部分布着看不见的“经络”，以某种方式联系着身体的各个器官。赫胥黎承认，那是“一种经验的事实”。他说：

经络上有特别敏感的点。针刺入其中的一个点，将会影响与这个点所在经络相关器官的功能。技法熟练的针灸师，在审慎选定的若干点上扎针，可以使能量的循环恢复正常，从而使患者恢复健康。

这里，我们又想耸耸肩说，这没有道理。但是，看看最近举行的国际针灸大会的文献汇编，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验者用精密的电子测量仪器，已经能够测到中国人说的经络，而且把针刺入一个穴位，可以记录下电流状态的较大变化。<sup>①</sup>

<sup>①</sup> 见 *The Observer*, London, October 22, 1961。

赫胥黎认为，“古老的中医疗法非常有效”的病症，“都是各种令人不快的精神状态（例如，某些沮丧和焦虑），它们或许与器官的功能失调相关，只要能量循环恢复正常，症状就会消失。某些病例，精神分析师医治数年没有产生的结果，扎两三根银针就会产生疗效。”

推崇针刺和草药疗法的疗效要有限度，因为严格地说，中医文献提供的知识，几乎没有涉及细菌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流行病学、内分泌学、性病学等基本学科的知识，而无菌技术也只有原始的概念。中医对天花、斑疹伤寒、结核病、鼠疫、痢疾、霍乱、破伤风、黑热病、疟疾、丝虫病、梅毒，以及某些其他的疾病，实际上防治作用不大。让一个外行断言，中国的那些继续反对中西医疗法相结合政策的人的某些质疑是合理的，即使在 1971 年仍然为时过早。

直到 1960 年代中期，我仍然感到，我在医院见到的有些医生对推崇中医感到困扰。许多人一定对强制学习中医感到不满，这种情况就像要求所有的西医师都要学习正骨术一样。在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所强化的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影响下，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医生，都对群众关于疗法有效和无效的看法持有了一种更谦卑的态度。到了 1970 年代，针刺疗法及其在应用中发展的新技术，已经使它更为普及，并使它的疗效有了更为广泛的影响。<sup>①</sup>

在讨论运用新的针刺麻醉法做切除腹部巨型肿瘤、胸部手

---

<sup>①</sup> 1971 年访问中国的美国医生，带回了关于目前针刺疗法应用的令人感兴趣的新材料。例如，见 Dr. E. Grey Dimond's "Acupuncture Anesthe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Vol. 218, No. 10, December 6, 1971。

术甚至开胸手术时，林巧稚医生说，“现在还没有对针刺疗法作出解剖学理论上的全面说明”。她最后说道，“数以千计的科学工作者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期望尽早有所‘突破’。”

---

---

## 7. 性与人口统计

一所医院的一间病房可以透视医疗服务的一个重大变化：不断推广和运用一切实用的计划生育手段。但是，在防治子宫癌为分娩创造条件的工作中，在参与经文化大革命普及到全国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运动中，林医生和她的同事花在把孩子接到世上来的时间，要远远超过阻止孩子们降临人世的时间。

广而言之，要遵循的原则有四条，也就是毛泽东给医疗工作者规定的准则：（1）预防为主；（2）满足工农兵的需求；（3）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把农村和城市的公共卫生措施结合起来；（4）使中医医生与西医医生团结起来。

“预防为主”的含义，要远远超过计划生育，但是，计划生育现在是非常基本的工作，所以，在说明这个术语的其他用法之前，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的避孕药效如何？按照林医生和其他专家的说法，她们每月服用22天的避孕药完全没有副作用。如果按日服用，有效率为100%，但是（有意或无意）忘记服用的情况“仍然非常多”。与此同时，一个月服用一次的理想的避孕药，现在正在深入研究。林医生说，实验从1969年就在全国展开，仅在北京一地就有5000人，包括医疗工作者、工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参加了计划生育的实验。

中国也关注着世界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成果，尤其是日本的利用前列腺素诱发月经的阴道丸。林医生说：“我们的实验小组，我们把她叫做计划生育战斗组，正在研制一种长效口服避孕药。我们坚信，我们能够研制出药效一年左右的避孕药或疫苗。”可供男性和女性避孕的中草药的实验也正在进行。（但是，现在还没有人发现用针灸避孕的方法！）男性（有两个孩子以后）绝育，是受鼓励的避孕方式，可以免费实施，但并不受欢迎。

避孕药品的供应和运用的广泛程度又怎样呢？据报道，在我访问过的各个省份里，甚至在偏僻的陕西省，避孕药已普遍应用。但林医生说，避孕药品还是供不应求。中国目前的育龄妇女约有 7 000 万—8 000 万人，这意味着每年需要生产大约 170 亿丸每月服用 22 天的避孕药丸。男性避孕措施有助于弥补目前的差距。

中国也需要数以亿计的预防各种传染病和流行病的疫苗，而且，中国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最大生产国。我们访问了北京的一座“超现代”的制药厂（一位荷兰的访问医生 J. A. 德哈斯告诉我，这家制药厂的规模大于欧洲的任何一家制药厂），它每年生产的疫苗达 8 000 万支。我的老朋友，美国出生的马海德医生<sup>①</sup>告诉我，他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见过十余座同样规模的制药厂。

我从官方了解到的情况是，北京约 70% 的育龄妇女采取了避孕措施，其中 2/3 的人服用避孕药。在北京周边 10 个县

---

<sup>①</sup> 他被称作是“扫除了中国性病的人”，关于他的非凡经历，见《今日红色中国》第 261—277 页。

的农村人民公社，大约 40% 的育龄妇女服用避孕药。

全国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已有十余年未予公布，我得到的各地的数字差别极大。例如，北京地区人口增长率，1969 年官方公布的数字 1.6%；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我被告之，人口增长率刚好是 1%；在西安，官方的估计数字是 3%。

人口增长率过高，无论如何不能让毛主席感到满意。在与他谈到普遍的进步的情况时，我说，我高兴地发现，最近避孕措施的使用更加广泛了。“至少，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他说我上当了。在农村，如果一个女人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她会想要一个男孩。如果第二个孩子是女孩，她还会想生一个男孩。第三个又是女孩，她仍然会想生男孩。很快，她生了 9 个孩子，都是女孩，那时她已经 45 岁了，所以她只好放弃了！

“是的，可是现在反对的人不多了，我的意思是，年轻人不反对节育了……”

毛说，他们仍然重男轻女。他认为，美国的情况大概也是一样的。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但是，改变已经定型的思想需要时间。

毛不相信“没有儿子”的家庭会节育，对人口普查报告也持有疑虑，这使我回想起我与陈永贵的第一次会面。陈永贵是山西省一个山区公社大寨大队的领导，大寨大队受人称颂，陈永贵也尽人皆知。陈曾带领他的 360 名社员（其中 178 人为壮劳力），用手工工具开山劈石，用辛勤的劳动开辟出了新的肥田沃土。他们引水灌溉，修筑梯田，他们自力更生与恶劣的自然条件做斗争，他们取得了胜利。在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使粮

食的产量增加到每英亩三吨，创造了贫瘠土地上的记录。陈是土生土长的领导，他精力充沛，富于理智，是一个十足的农民。我向他询问他的公社里“计划生育”的情况。他好像对这个术语很陌生。我告诉他，我的意思是“少生孩子”。

“哦，那件事呀。”他笑着说道，“不，我们不需要那样，我们需要壮劳力。”

我问陈永贵，他的大队 1964 年登记了多少个新生婴儿。“8 个”，他马上作出回答。有多少人死亡？“我们没有损失一个人，”他说。连一个老爷爷也没有死吗？他搔了搔头。他记起了一个老地主死去了。“如果你说那就是死亡的话，”他说，“他好多年以前就不是壮劳力了！”

三四十岁的农民，无论男女，（现在会多少感到惭愧地）承认自己有五个、六个或更多的孩子，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年龄大一些的孩子通常都是女孩。为了让一个孩子活下去，就必须生养更多的孩子，这种旧时的宿命观也是难以摆脱的（我见到过许多老年人，他们的经历都是这样）。尚未摆脱旧习惯的农家婆婆和祖父母，仍然会要求年轻人多生孩子。

1964 年，周总理曾对我说，他的政府希望在 1970 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 2% 以下。这次我问到这方面的情况，他说，人口增长率在 1966 年确实降到了 2% 以下。他补充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进行“长征”，男女自由结合，人口数目重又激增。大量的早婚现象助长了出生率的提高。随着红卫兵的解散（返回学校或正常的工作）和纪律的恢复，那段偏离正轨的时期过去了。总理认为，随着使用方便的新型避孕药的广泛应用，人口增长率会再次下降。

在普遍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性关系的人们中，尤其是在年轻

人中，避孕药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自然是外国人感到好奇的事情。（中国人也会感到好奇！）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的中国，未婚女子如果被人看见单独与一个男人一道走在村路上，那么尽管她是清白的，她也会嫁不出去（或许有人会向她扔石头，或许会受到人们的骚扰）。那个时候，穷苦的人家会把女孩卖给人家，或是做妾，或是做妓女，或是做奴隶。现在，所有这一切都不见了，以前供单身汉和对婚姻生活不满的人寻欢作乐的“消遣场所”都被关闭了，勾引妇女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强奸则是重罪。

现在的学校普遍是男女合校，而且年轻的男女许多工作是一起做的，但不是在床上。一两次同骑一辆自行车，就足以认定这对年轻人已经订婚了。解除这种婚约是一件在人前丢脸的事，对男人而言，尤其是丢人的事。甚而至于，一个女孩与同在公社工作的男孩在树下一道吃午饭，也会损害她的名声。这是我从在朋友家与一位十几岁的前红卫兵数小时的交谈中得知的事。

芳心暗许的情侣会发生性关系吗？“婚前发生性关系的事确实不多，”一位医生朋友回答说。“至于实际上的非正常性关系，会被看作是一种需要社会惩戒的越轨行为，如果屡教不改，就要监禁改造。婚外性关系并不多见，但比婚前性关系更为常见。”

向中国人提出这种问题，很容易使他们感到不安，但是，我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时，得到了真实的情况。那是1965年，我向北京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了解婚前禁欲的情况（在中国，理想的婚龄是，女性26岁，男性28岁；而农村地区，建议的婚龄是，女性23岁，男性25岁）。我说，外国人很难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普遍保持贞洁。

她说，妇女现在都有生产工作要做，他们有与男人同样的机会；过去，女孩20岁还不出嫁，是很丢人的事，而现在的看法恰恰相反；而且，年轻人都受过为社会工作的政治信念和理想的教育。他们活着不仅仅是为了享乐。

“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没有西方随处可见的各种商业化的性刺激。那么，难道一个未婚女子就没有至少熟悉她可能嫁给他的那个男人的自由吗？”

“没有，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有时候，男人和女人是可以相互了解和熟悉的。我们不否认，有时会发生婚前性关系，有时会出现怀孕的情况，尽管非常罕见。过去，出现了这样的事，女性要自己堕胎或想办法堕胎，但是现在，由于采用了避孕措施，而且了解可以免费堕胎，这种事就很少发生了。

未婚母亲堕胎的情况非常少。相对于我国众多的人口，其数目少到不足以构成严重的问题。遇有怀头胎的妇女要求堕胎，医生总是会劝阻，如果是未婚母亲，而且（因为男方已婚，或者是政治或其他方面不相匹配）结婚无望，不会有人坚持让她把孩子生下来。这样就会实施堕胎手术。”

以上所述，在我与马海德医生的谈话中基本上得到了证实。马海德的妻子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女性，她为马海德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以马海德的儿子为例，他与女朋友“保持稳定的关系”达6年之久，在婚前相恋的6年中，他们从不曾发生过“肉体关系”。马海德就是这样认为的。总之，最近到了适婚的年龄，他们就结婚了，不久后他们就会给马海德夫妇生养孙子了。

“这就是我了解的年轻人的婚恋方式，”每天要接诊不少患

者的马海德医生说。“我不能说避孕药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这里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但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性取向可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

总之，无论性取向是否会更加自由，免费的避孕药和堕胎，（在多年的计划生育宣传打破了农民的守旧心理和大男子主义之后）可能不久就会带来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但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平均主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进步的好处必须由所有的人分享，生活标准的相应提高，必须惠及人口的绝大部分。

那么，中国现在的人口有多少？多年来，外国人口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推测，是远远不准确的。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一直认为北京根据1953年“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公布的数字，是确凿无疑的数字。当时公布的人口总数是5.83亿；1957年“抽样调查”的数字是6.46亿。1960年，我见到的所有中国官员都使用6.5亿这个数字。一个例外的情况是，政治局委员、上海市长柯庆施说，“中国的人口有6.85亿”。

五年后，我问毛主席，他是否能告诉我一年前进行的“抽样调查”的结果。他回答说，他确实不知道——有人说是6.8亿—6.9亿，但他不相信这个数字。怎么会有那么多那！

“能不能只根据布票估算出一个大概的数字呢？”我问道。

毛回答说，农民有时会把事情搞乱。解放前，他们生了儿子要藏起来，特别是不能去登记，以免被蒋介石抓了壮丁。解放后，他们会多报人口少报土地，而且在夸大灾害影响的同时，尽量少报收成。现在，生了孩子会马上报告，但有人死亡，几个月都不会提起。毫无疑问，出生率确实是下降了，但死亡率的下降可能更大。他说，人们的平均寿命已经从大约

30岁提高到了将近50岁。

毛主席的回答的含义是，有些农村人民公社可能认为，不做死亡登记更方便，这样就可以继续使用死者的布票，就可以少报收成多留家用。某些西方的人口学家认为，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8亿，毛对过去和目前人口研究的质疑，会使他们感到非常困窘。

如果按主席的最低估计数6.8亿（周总理告诉我的，可能被低估的）和1965年1月以来6年间的2%的最低年增长率估算，那么，今天中国的人口总数约为7.8亿。1971年1月，我问周总理，可不可以说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8亿。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才回答：“不，还没有那么多”。

在北京愿意公布更明确的数字之前，似乎可以有把握地估计，中国的人口连同台湾（约为1400万）在内到1972年将超过8亿。从现在起，即使按1%的出生率计算，中国的人口到2000年将超过10亿。如果按假设的2%计，那么到2000年，还要再增加2.5亿。

现在，粮食供应额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这是令人感到宽慰的事。1971年1月，周总理告诉我，1970年的收成是，粮食总产量为2.4亿吨，还有4000万吨国家储备粮。这个产量比1959—1962年“困难时期”增加了70%—80%。不过，如果把人口增长率降到1%或不到1%，中国的计划人员会感到更高兴。他们的目标是，在下一个10年继续推动国民储蓄率的迅速增长，继续努力增加工业生产。

---

---

## 8. 例外的情况

毫无疑问，造成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增长率上升的原因，不仅仅是红卫兵和人们的谈情说爱，整个医务界受到严重冲击和既存的计划生育服务的中断，也是重要的因素。大学停课将近三年，中学停课两年，医学预科和大学的教育中断了，医务人员流失了，医院管理系统中的党领导，或者被推翻，或者被解散，直到1968年，新的公共卫生组织才在军队的指导下慢慢形成。

对任何官方的介绍都要持谨慎的态度，以免“上当”，因为官方的介绍，大都忽略了革命的变革期间公共卫生工作丧失的时间所付出的代价。不要天真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把大批医务工作者送去“学农”，去从事更适合别人去做的体力劳动之后，必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针灸和传统的治疗方法。这个问题不会有令人满意的回答，而且让一个局外人断定新的方式的利是否能完全超过弊，也是不可能的。

尖端科学的工作，显然没有受到文化革命的很大冲击，除了核工业的发展，其他几个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965年9月，中国的生物化学家成功地用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方式制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项工作的国家。断肢治疗也不断取得进展，到1970年，中国在这方面似乎已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现在，断指、断趾、断

手、断脚、断臂以及断腿的再植技术已经广泛传授，以致相对简陋的农村医院常常也能做这类手术。

1964年，在上海的一座市立大医院里，我曾与一位工人握过手，他的手在一次事故中完全断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断手才从车间送到医院，然后被接到伤者的手腕上。他的手几乎完全恢复了正常的功能。1970年，我在广东省的一所公社的小医院里见到了一位患者，在接受了四个手指的再植手术后，他的手也几乎完全恢复了功能。

中国取得的另一项西方无法匹敌的成果，是治疗严重烧伤的技术。大量引证的康复病历，都是烧伤面积达60%的三度烧伤。我曾亲眼见到过一位严重烧伤的病人，大量关于病人可怕的烧伤情况的细节，1969年离开中国前在中国执教和行医十余年的英国外伤专家洪若诗医生，有过令人难忘的记录<sup>①</sup>。

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工业的事故率是否高于正常水平。我看到的统计资料表明，各地工厂的事故率似乎并不很高，但与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自1960年以来，关于这方面的全国统计数字就不再公布了。在短暂的“百花齐放”自由批评时期（1957年），曾对预防措施的不当提出过许多责难。<sup>②</sup>在我重访的几个工厂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安全生产的条件已经得到了改善。把高小以上的课堂教育同工厂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好处之一，就是教会每一个人尊重和爱护机器，以及如何使用机器。

在北京时，我们与林巧稚医生一道参观了一间女子病房，

<sup>①</sup> Dr. Joshua Horn, *Away with All Pests!* (London, 1969; New York, 1970).

<sup>②</sup>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Hundred Flowers* (London, New York, 1960).

患者都是正在康复的患有特殊的子宫绒毛膜癌的病人。这种致命的细胞侵袭滋养层，并迅速向肝脏转移。“以前，这种病被认为是不能手术的，”林医生说。“人们常常说，‘如果你说你治愈了绒毛膜癌，那么，你的病人得的就不是绒毛膜癌。’现在，我们采用的是，包括化疗在内的综合疗法。即使癌症发生转移，并扩散到胸部，我们也能救治大约 61% 的患者。其中大约 40% 的患者可以把子宫保留下来。”

林医生停下来，向我们介绍了她的一位同事戴玉华，戴是外科医生，她所患的绒毛膜癌就是用化疗治愈的。她的子宫保留下来了，她还生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当林医生说到，她所以会康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她相信能够治愈——她相信毛泽东，泪水涌上了戴医生的双眼。戴医生的孩子取名为“强章”。那名字的含义是健康吗？完全不是。孩子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党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后来，我在陕西遇到了一位农妇，在知道她的两个小孩分别取名为“反帝”和“反修”时，我自然就不感到惊讶了。不要问我为什么：那就是中国——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林医生在长江以南的湖南省的一个公社里工作了半年，最近刚刚返回北京，她是自愿去农村开展医疗工作的。她是去那里帮助培养接生员和“赤脚医生”，所以叫“赤脚医生”，是因为他们与其他农民一道在田间劳作。大批城里的医务人员已经深入到内地，在农村的人民公社开展医疗工作，向年轻的“赤脚医生”传授有经验的护士应该掌握的医疗知识。他们的培训费用（有些人被送到县医院或市医院），是由他们的生产队或大队支付的，他们仍然是公社的社员。

林医生接着说：“农民喜欢赤脚医生，他们就在身边，不

归医院管。当然，我们需要赤脚医生，也需要医院，不过小病小伤赤脚医生就可以看了。他们还是避孕药的主要发放者和计划生育的主要宣传员。”

---

---

## 9. “把重点放到农村去”

换一个场景。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另一座综合医院。医院大约有 800 张病床，13 个部门，251 位西医医生，9 位中医医生，251 位护士，11 个病室。医院是苏联援建的，医务人员也是苏联派来的，当时的名称是中苏友谊医院。文化革命期间被改名为反修医院，现在的名字是友谊医院。

在参观病房之前，我们先会见了北京市卫生局革命委员会的代表王广久；同时在座的还有医院军宣队的两位“负责人”（即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我的另一位老朋友、著名儿科医生张维逊，他是医院的前副院长，现在是一个遥远的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大队的体力劳动者，他是请了短假来参加会见的；此外，还有另外 10 位医务人员和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 5 位是女性。

在听取革委会委员讲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变化之前，最好回顾一下人民共和国 20 年前接收下来的巨大的医疗问题。我要再次引用美国公共卫生署威廉·Y·陈博士向美国医师大会提交的报告。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前……”他写道，“医疗和公共卫生组织尚处于初建期，远低于现代的水平。贫困和疾病是普遍的现象。”每年 400 万人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6000 万人需要“日常的医疗设施”。陈博士估计，按照他认为的“最低标准”，

中国的需求是，每 1 500 人一位医生，每 1 000 人 5 张病床。

“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的总数（1949 年），估计仅有 12 000 人；中国每年只能为大约 500 座医院培养出 500 名医科大学的毕业生……”而且，只有 71 000 张病床。

“由于占总人口 84% 的农村人无力支付私营医疗费用，所以及早解决这种悲剧的惟一方式，就是采用国家（或社会化）的医药体制。”中国最出色的医生早在 1937 年就持有这种看法。“当时，县卫生中心的想法，基本上就是由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医生规划和实施的；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仍然生活在中国，实际上，他们就是中国医疗卫生组织的骨干。”

符合西方条件的病床和医生，在第一个 10 年里，增加了 4—5 倍。这远低于陈博士的“最低标准”，但是，他在报告中说，“在卫生、医疗教育和预防（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大幅度的改善……斑疹伤寒、回归热和其他‘应报’或‘必报’的传染病，已经得到控制。主要的寄生虫病的控制也有了极大的改善……数以百万计的疟疾患者得到了治疗，疟疾的发病率也明显地降到了不到 3% 的水平……”而且治愈了 3 600 万患者的钩虫病。<sup>①</sup>

一位在革命胜利仅仅 7 年后访问人民共和国的英国医生带回的报告，是一篇关于“成功地控制了苍蝇、清洁的街道和极为干净的住家”的报告，也是一篇令“中国通”们大感惊诧的报告。利物浦热带医学院院长布赖恩·梅格雷思教授认为，村卫生委员会和街道卫生机构的群众工作，“对肠胃传染病的传播有深刻的影响”。下面这段文字会引起了解过去中国农村肮

---

<sup>①</sup> Dr. William Y. Chen, *op. cit.*

脏状况的人的特别注意：

一种进一步控制血吸虫寄主（疫螺）的方法的不断实施，可以说明已经取得的合作的普遍程度。在人造肥料能够以足够大的规模生产之前，人类的排泄物仍然是最便宜和最有价值的肥料。幸运的是，危险的血吸虫的卵，如果留在粪便里而不同水接触，寿命并不长。因此，贮存就可以使肥料失去传染性。由于做了精密的宣传，这种基本的保存粪便的方法，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和社会事实。现在，每一户人家都有自己的厕所，即一个色彩鲜艳的便携式马桶。每天早晨，把马桶中的粪便倒入大型陶制公共储粪罐，储粪罐装满后密封保存。经过充分发酵就可以杀死血吸虫卵。经过这样处理的粪便就可以放心地用于农田。保证家庭粪便收集的方式，是按一定比例（根据不同年龄，按每人每天计）向各户付款。渔民也用这种方法控制水的污染。现在，每一条渔船都有自己收集粪便的马桶。这种做法被看作是一项收入来源。<sup>①</sup>

感到惊诧的不仅仅是“中国通”。1960年，我问虔诚的基督徒林巧稚医生，她最感到意外的革命成果是什么。她大声地说：“苍蝇！我从来没有想到人们能够清除苍蝇！”

截至1970年，所有的流行病和传染病，包括血吸虫病和麻风病在内，或是被彻底消灭，或是得到了控制，减少了发病率。因为性病（无论相信与否）在26个省（市、区）已经绝迹（即使在西藏也得到了控制），所以，北京的皮肤性病研究

---

<sup>①</sup> *New Scientist*, London, December 31, 1957.

所的性病科被解散了，而作为临床医生的马海德医生当然也就可以进入半退休状态了。小儿麻痹症、麻疹、伤寒和斑疹伤寒，也可以用疫苗和卫生措施加以预防。1969年，反修医院接诊的90万病人中只有两位病人患有痢疾。目前，两个主要的致死原因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

现在再来谈谈卫生局的王广久医生。他的职责范围在北京，这个“特别行政区”包括10个郊区县的280个人民公社，有600万人口。北京共有17家市级医院，30家区（县）级医院，病床总数为29万张，公社和工厂卫生所的病床不包括在内。北京地区大学医科毕业生有8600人——自1969年以来增加了59%，还有大约2000名中医师。<sup>①</sup>

王广久向我们讲述了一些当前发生的“革命变化”：

“1965年，毛主席说：‘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必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像在政治上一样，人必须不断经受锻炼）现在，我们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指示。在过去的3年里，我们北京的3600名医疗卫生工作者下到了农村。我们把6000名医疗卫生工作者组织成430个流动医疗队深入到四川、云南和内蒙古。我们的医生、护士和干部轮流参加这项工作。

北京地区一共有13000名赤脚医生，有男性也有女性，平均年龄是20岁。他们在医学院或医院的学校接受3个月的培训（西医和针灸相结合），然后返回公社，在当地医院的监

---

<sup>①</sup> 关于全国医生的情况，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最接近的估计数字是，大学医科（六年制）毕业生约为15万人，受过2—4年医科教育的“助理医生”约为40万人。

督下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返回学校接受3个月的培训。小病，他们可以在患者家里或大队卫生所治疗；较严重的病人就送到公社的卫生院。现在，只有重病才到市级医院就诊。

除了培训赤脚医生之外，所有的医院还培训隶属于居民委员会或工厂的红医工，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医疗工作者。北京市共有2164名部队的医疗工作者，分别在市内的335个急救站‘为人民服务’。反修医院目前正在对41名这样的年轻人进行培训。医院还派出了8名医务人员参加了在几内亚工作的50人的医疗队。

去年，这所医院有96人扎根农村。我们的员工分成3批，轮流到农村去工作。流动医疗队的任务是：以‘预防为主’，直接为群众提供预防和治疗服务；为当地培训基层医疗人员；促进计划生育；提高现有服务和公共卫生水平；使西医与中医相结合；通过与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及共同学习和一道批判资产阶级的方式，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用自己的（社员的劳动所得建立的）福利基金为社员提供医疗保险。在城市里，医院与工厂和其他的单位订立医疗保险合同，费用由各单位的福利基金和国家共同支付。工人住院期间，除伙食费外，不用支付其他一切费用。

再来谈谈张维逊。他身材消瘦，皮肤晒的黑黑的，两鬓斑白，刚刚从乡下回来。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北京）大学任教时，就与他相识了。那时，他是医学院的学生。他曾在美国学医，毕业后返回中国工作。我们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他的英语仍然非常流利。

“老张，”我说，“是什么原因使你离开北京？”

“我是我们医院扎根农村的 96 名医务工作者之一。我现在在大兴县采育人民公社一个生产队工作。我们生产队有 800 人。”

“谁让你去那里的？”

“没人让我去。我自己要求去的，去同农民相结合，改造我的思想。下乡前，我是医院的副院长和儿科主任。文化大革命前，我不知道自己是反对革命的。参加了医疗队的工作后，我才第一次认识到，农民是多么需要医药和医生。我是下放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但是农民知道我是医生后，他们就来找我看病。

起初，他们叫我‘先生’，或‘老人’，把我当成知识分子。他们找我看病时都说‘请’。在播种和收获的时节，我与他们一道夜以继日地劳作。现在，他们叫我‘老张’，我们平等了。与他们在一起，我很愉快，我决定在那里度过我的后半生。过去，我脱离政治，脱离群众。我还不懂针灸和中医。现在我学会了针灸和中医，我发现它们对有些病疗效非常好。这样，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我不再留恋城市生活。我正在培养年轻的医务工作者，农村需要他们。农村有广阔的前景。”

他的家人呢？他们仍然住在北京。他每月回去看望他们一次。如果新的党组织需要，他也可能会被召回城里，那时他培养的年轻人就能承担他在生产队的工作了。或者，他的家人也可能迁到农村，与他一起生活。

以上是我同医生、赤脚医生、护士、患者和医务界革命委员会委员大量谈话的摘录，他们至少能传达出，在把关注从有特权的城市和自我中心的专家转向内地的田间地头的时代里，

中国医疗工作的观念和气氛。农村生活着大约占中国总人口70%—80%的农民——正是他们使中国共产党人执掌了政权。

“农民是全心全意拥护毛主席的”，老张说。在我们访问过的11个人民公社中，我没有听到任何相反的说法，但不应断定，农民都成为了模范的社会主义者。毛不会幻想，农民会在灵魂深处抛弃他所说的“自发的资产阶级欲望”。关于这一点和人民公社的其他问题，在后文叙述。

## 第三编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 10. 个人崇拜降温

在进一步讨论最近的内部斗争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之前，必须更深入地考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性质。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相当复杂，而后，对热战的歪曲宣传使情况更加复杂和混乱了，公众听到的宣传主要是胜利者的控诉。

这是一段令人感到迷惑的历史，即使要梳理这段历史目前可见的脉络，也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多年后我们也可能看不清所有的脉络，或者无法对发生的事做一个简单明了的说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有不少专著问世，我知道西方学者正在撰写另五部“权威性”著作。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著作能把这个题目说透，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然处在“发生”的过程中。在1969年党的九大恢复了团结的表象背后，矛盾仍然存在，并有可能再次公开爆发，用党的语言来说，就是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在1967年说：“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两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sup>①</sup>毛在另一次讲话中说，即使在“阶级消亡之后，思想斗争、政治斗争……还是会有，并且不可能消失……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不平衡是正常的、绝对

---

<sup>①</sup> 北京，《人民日报》，1967年5月7日。

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sup>①</sup>

了解1966年至今所发生的事件的关键，是了解对毛的个人崇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毛自己也坦率地承认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全部斗争是围绕对崇拜的控制展开的，也就是崇拜为谁所用和最为重要的用来崇拜“谁”。问题在于，是由党内的特权阶层独自操纵崇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使毛成为地位尊崇的傀儡；还是使崇拜为毛及其真诚的信奉者所用，普及毛的教导，使之成为“武装人民”的意识形态武器，并用以在政治上反对毛认为的由享有特权的、反动的，甚至不亚于一个“新阶级”的反革命集团领导的篡权者，并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回来。

把对个人和群体的忠诚相对立，以及把个人和民族的自尊与毛的个人魅力联系在一起的主观因素，与出现巨大分裂的客观现实，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得有些外国观察者断言，它不过是一场宫廷纠纷。

或许，它相当于一场中国的大选？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上层机构的冲击，在一个只能在一段时间里拥戴一位主席的国家里，引发了两位主席的相互对立。刘少奇是按照宪法的规定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国防委员会的首脑，是党组织的有力组织者，他是国家机构威望的化身。毛泽东则是英雄的

---

<sup>①</sup> 黑体是作者所加。引自一本红卫兵印行的《毛泽东著作选读》，该书被普遍认为可靠，收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毛于1958年1月31日提出的《工作方法60条（草案）》。First translated in “Current Background,”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Hongkong (No. 892, October 21, 1969), and later reissued by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The version here is from Jerome Chen, *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 (London, 1970), pp. 65—66.

形象，是意识形态的导师、党的领袖，而且由于他掌握着党的军事委员会而成为武装力量事实上的首领。人们认为，毛同那个上层的国家机构是融合为一体的，而实际上矛盾在不断加剧。

毛的进攻导致了内部斗争，使党的许多分支机构的工作陷于半停顿状态，并使国家的上层机构几近瓦解，这时，一场真正的革命显然已经发生了。在重建党和国家机构的过程中，必须要修改党的章程和国家的宪法，必须直率地取消设立独立的国家上层机构的提法（苏联的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宪法仍然坚持这些提法，而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以苏联宪法为蓝本制定的）以应对现实，尽管党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惟一代表，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党的全面专政。<sup>①</sup>

前文已述，毛主席把同刘少奇最后决裂的日子定在1965年的1月，但是，为此而做的准备则开始于1959年或更早一些。我第一次向主席提出中国的个人崇拜的问题，恰恰就在1965年的1月，我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也与此相关。

1964年秋和1965年初冬，五年来我首次重访中国，所到之处情况普遍好转，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59年，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裂隙已经扩大成为冲突，赫鲁晓夫在那一年毁弃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本”的承诺，并在1960年撤走了所有苏联专家，取消了数百项对中国工业化至关重要的合同。大跃进期间和人民公社初期（1958—1959年）的某些过头的做法，再加上浮夸，使大幅下滑的生产更趋严

---

<sup>①</sup> 见1969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至1972年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通过宪法草案。

重。空前恶劣的气候和歉收造成的饥荒态势一直持续到了1963年。

但是，到1964—1965年，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平衡。1959—1962年的“困难时期”已经成为过去，食品相对富足了，基本消费品和服务的种类更多了。工业已经开始弥补损失，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似乎也进展顺利。除了担心由于越南战争的蔓延而同美国开战之外，到处是一派祥和和乐观的景象。

由于毛泽东，这个国家似乎在政治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离开中国前不久，我单独与两位老朋友共进晚餐，席间我对他们说：“对事情的进展，只有一件事让我感到不解。我认为，对毛泽东的赞颂过分了。”现在，街上悬挂着他的巨幅画像，每一间会议室里都摆放着他的半身雕像，他的著作和照片随处可见，而其他人的照片则不见踪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历时四个小时表演，毛是惟一的英雄。在演出的高潮（招待来访的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的演出，共有2000名演员出演，出席作陪的主人是刘少奇），我看到一幅根据我1936年拍摄的照片复制的画像，被放大到大约30英尺高。它使我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感觉，既对拍摄的技巧感到骄傲，又因为回忆起与此相似的俄国战时对约瑟夫·斯大林的狂热崇拜而感到不安。

不过，那时在办公室和机关里，仍然可以看到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和其他政治局领导的画像，刘少奇的著作也可以在各地出售。对一个人的崇拜尚未成为普遍的现象，但这种趋势是确定无疑的。

我的东道主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龚澎<sup>①</sup>和她的丈夫乔冠华，他们两人当时都是外交部的副部长。我接着说：“我只是对一件事感到不解，毛主席的著作和画像随处可见，是不是说毛主席有敌人。每一个人肯定都知道他是革命的主要创始者。他个人肯定不需要这种过分的夸赞。个人崇拜真的有必要吗？”

龚澎会心地笑了笑。“我知道，许多外国人都有一种感觉，”她说。“我来给你讲个故事。革命的早年间，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农民来参加十月革命庆典，许多人走过检阅台的时候，都要向毛主席‘磕头’。我们不得不设置卫兵，以阻止他们跪拜。让人们理解毛主席不是皇帝，不是神，只是希望农民像真正的人一样站起来，这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故事是不是能帮助你理解，有些人的做法确实过分，而允许人们尊敬毛主席又非常得体呢？”

谢谢她的故事，它的确使人想起中国三千年来对皇帝的崇拜。不过，我见到毛主席的时候，还是向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sup>②</sup>：“苏联批评中国鼓励个人崇拜。这种批评有根据吗？”

毛回答说，可能有根据。据说斯大林搞过个人崇拜，赫鲁晓夫不搞个人崇拜。批评者说，中国人也有一些（这种感觉和做法）。有一些（更多？）个人崇拜可能是有道理的。他的结论是，赫鲁晓夫先生之所以垮台，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搞个人崇拜。

这段话的含义非常清楚：毛确实有一些敌人。但是他说，95%的人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反对他的人只有5%。谁是那

---

① 她是一位真正的“高人”，于1970年去世。见第178页。

② 见附录，“山南海北”。

5%呢？我不知道（大部分中国人也不知道），这5%的领导人就是那个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的人，还有大约一半的政治局委员。知道内情的人，可以看出某些迹象，但在局外人看来，政治局仍然在一如既往地维护团结，防止分裂。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1970年10月1日观看游行时，毛主席对我说过的几段话。

他说有人批判我写的一些东西，但他看过摘要，认为里面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他们不应指望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问题上都与他们意见一致，我坚持独立的观点没有错。至于说我写的所谓个人崇拜，确有其事，为什么不能写呢？

12月28日，主席邀请我共进早餐，他再次谈到这个话题。他赞成（对社会现象）做科学的探究，他说：例如达尔文、康德和美国的一些科学家，特别是刘易斯·亨利·摩尔根，他对原始社会做了探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喜欢他的著作。毛说，摩尔根对以洛魁印第安人、部落宗教和“对崇拜的需要”的研究，为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提供了支持。从早些时候与毛主席的谈话中，我已经知道，他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上帝或类似上帝的东西的笃信，（除了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的无神论之外）并从这样的研究中引出自己的教训。

后来，他再次提到他在1965年对我说过的话，个人崇拜是有一些，但需要更多一些的个人崇拜。那时，党的权力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他说，它（个人崇拜）做过头了，搞了很多的形式主义。例如所谓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迟早要

统统去掉。只保留一个“导师”，也就是教员。他过去一直是教员，现在仍然是教员。其余的称号将被拒绝。

---

---

## 11. 文 化

这位导师要教导但尚未传达到群众中的东西是什么呢？已经脱离了主席控制的，或许是“伪善”的党的宣传部门到处摆放毛的半身雕像和画像，这种形式的背后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呢？

四大卷《毛泽东选集》，另一卷在党内传阅但尚未正式发行的《选集》，以及各种数不清的声明和报告，都是教导的基本内容。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伊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8日给出了最简明的答案，这就是《十六条》的最后一条：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必须更加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概括导师的教导（它包括对党和革命的历史的概述），是

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国防部长林彪完成了这项任务。他编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也就是尽人皆知的“小红书”。从1962年开始，林彪每天在《解放军报》（仍然是完全受毛控制的报纸）上刊登一条毛的语录。1964年，他把最有说服力的语录（有些是大段摘录，有些甚至是全文引用），制成便于每一个士兵携带的袖珍本，并使所有的人牢记这些语录——首先贯彻到全军，继之渗透到广大的农民，最后于1966年在城市全面铺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本小红书的印数数以亿计，并被翻译成世界上每一种重要的语言。

这本书中的《老三篇》，是毛的教导的范本，它以最简单的形式概括了毛想要向每一个中国人灌输的教导。

《为人民服务》是一篇关于一个普通战士的文章。这个战士“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毛在他的追悼会（1944年）上发表了赞颂的文章，并在追悼会上要求，为每一个死去的同志举行追悼会要成为一种惯例，“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都要开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服务）

另一篇文章是《纪念白求恩》。白求恩是为中国革命而殉职的加拿大医生。毛在文章中颂扬了白求恩“专门利人”的精神，并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相互支持的光辉榜样。（国际主义精神）

第三篇文章是根据中国的一则神话撰写的《愚公移山》。这则神话讲述的，是一个农民试图去做不可能完成的事；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一道，挖掉挡住他家出路的两座大山。他不顾智叟的嘲讽，坚持挖山不止，他说，只要他的不会穷尽的子孙把他们开

始的工作坚持下去,他们最终会获得成功。就这样,他们在神的帮助下,获得了成功。毛把两座大山比作压在中国头上的两个恶魔(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把神比作“人民大众”,他们“共同挖山不止”,就会使中国摆脱这种双重的压迫。

写于1945年的《愚公移山》包含有严肃的政治性教导,其中包括人们至今仍然熟知的告诫:为美帝国主义扶植蒋介石做好准备,但要把美国人民同美国政府“区别开来”。(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

这种质朴的范本,很有对天真的童子军进行美德说教的意味,在与(中国和国外的资产阶级)把家庭和个人置于集体之前的“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和旧文化”做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总是带有这样的特点。此外,通过刻苦学习毛的最重要的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著作,例如《矛盾论》、《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以普及一种客观推理的标准教条方法,即用有规则和统一的方式去分析和“概括”具体的问题。

我的话题似乎偏离了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只对文化大革命做逐年的简要叙述,而不对毛的领导想要灌输的“思想”的“性质”做些许探讨,就不能把握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那么,刘少奇是不是反对上述三篇文章引证的美德和教导呢?当然不是。毛与刘摊牌的原因是,在刘的领导下,党所奉行的是实用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一种有名无实的政策,没能把毛的思想同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刘保护和加强自己的组织,以尽管是单调、缺乏创见和官僚主义但却是系统的方式,使自己的组织在贯彻行政任务时免受干预,他努力使毛感到满意,只是为了维护团结。

刘与毛的工作风格和性格迥然不同。刘比毛小七岁，与毛一样也生于湖南省；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师范学校学习过，也都做过这所学校的教员，但他们的教育概念相去甚远。他们两人都出身于富裕的农民家庭，但毛反感自己的父亲，而刘则不然。他们都在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但刘是在莫斯科人的党（共产国际吸收的中国党员），而毛则成为在上海成立的本土党的创建者。

刘早年在苏联的生活对他有影响但是他并不亲苏，而是从毛组织农民游击队中学会革命的。刘不关心农民的生活；更愿意在城市里从事地下的秘密工作，他是一位熟练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组织者。刘不喜欢凭热情和劝戒工作，宁愿相信专业化的人力机器，也就是协调一致的工作队伍。

毛不喜欢城市生活，对城市生活抱有疑虑，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他看不起没有打过仗和种过田的“专家”和知识分子，他尊重成为他的最优秀的战士的穷苦农民，他倡导主要从农村无产者吸收“新型的工人”，并保护他们免遭城市的腐蚀，在武装斗争中提拔他们。就像他用辉煌的历史、人征服自然的典故和把人比附“神”作为他的诗词的主题一样，他用自信、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吸引年轻的追随者。

在中国从以农业为主导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社会过渡时期里，他们两人似乎是可以完美互补的恰当的领导人。实际上，毛1958年（据说）为了把全部时间用于党的事务，辞去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提名刘担任主席，那时他们仍然是恰当的领导人。那一年，毛给党留下了一份著名的文献——《工作方法60条》，他在这份文献中说，“（关于规章制度的）重要条

文，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sup>①</sup>。

首先，关于同苏联分裂的时间安排和方式，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从1959年就开始打破毛—刘两驾马车前进的节奏了。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裂隙；1959年6月，赫鲁晓夫毁弃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本的承诺，并访问了戴维营，此后，中苏破裂就成为尽人皆知的事了。9月，也就是赫鲁晓夫造访艾森豪威尔（这是毛感到疑虑重重的一次访问）的那个月，彭德怀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

接下来，在庐山召开了决定性的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会上，彭公开向毛提出挑战，毛不得不用自己的全部威望鼓励辩论，以赢得对彭不信任的投票。

彭德怀是谁？彭德怀与彭真（他的工作经历在城市）没有关系，他是农民出身的赳赳武夫，只上过两年学。他生于1899年，与毛一样是湖南省湘潭县人，他很小就从专制的农家出走，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十来岁就当兵。1928年，他率领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并带着他的部队加入了毛泽东的游击队。从此以后，他成为毛的支持者，而毛则成为他的政治导师。彭在战斗中和思想上犯过许多错误（而且一再承认错误），但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战术家，毛信任他，也喜欢他。彭认为，他在军队中的升迁能迅速超过别人，主要是由于毛对他的信任。

在朝鲜战争中，除了林彪在开始阶段担任过短期领导外，彭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领导。他本人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

<sup>①</sup> Jerome Ch' en, *Mao Papers*, op. cit., p. 57.

并被晋升为元帅、国防部长和人民解放军的司令员。在朝鲜与苏联人一道密切工作的过程中，苏联的后勤和旨在使中国军事工业现代化的援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他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做了一次长途访问，其间，就在“严重”的戴维营之行之前，他会晤了赫鲁晓夫。在后来的批判宣传中，他被指责向赫鲁晓夫先生递交了一封批评毛的领导的信件，不过，这是一封尚未写成的信。

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他回到中国出席了庐山会议，他在会上莽撞地攻击党在毛的领导下的失败，并把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和与苏联的分裂造成的严重损失归咎于毛。他还认真地对大炼钢铁运动提出质疑，他断言，这项实验给中国造成了10亿美元的损失。彭德怀的同情者有，他的总参谋长黄克诚，毛的老对手、党的前总书记张闻天。

我与彭德怀第一次见面是在1936年，那时他是红一方面军的副总司令。他直率、坚强，有着无穷的精力和革命热情，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在智力上，他远不能同毛相匹敌；1959年，他很轻易地在智力上败下阵来，他谦恭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道了歉。毛认为，彭的主要优点是勇敢和忠于自己首长的军事和政治的战略战术，他对彭的背叛必定感到非常失望。彭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仍然是中央委员。他说他要退休去“种田”。

但是，据说彭德怀在刘少奇的鼓励下坚持自己的错误，并根据1960—1961年在各地视察的情况撰写了五篇进一步反对毛的领导的“实地调查报告”。这些报告传阅范围是中央委员。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彭德怀提交了一份万言书，再次提出了他的批评，并扩大了批评的范围。这一次他

可能得到了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他们谋求为彭“翻案和复职”。

必须牢记在心的，还有两个已经有所暗示的事实。军队中暗中支持彭的人（有时被称为“专家”），赞成至少同苏联达成暂时的妥协。他们想要得到苏联的帮助（包括了解原子弹在内），以完成军队的技术现代化。要得到苏联的帮助，就只能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居于联盟中的小兄弟的地位（与华沙条约的卫星国一样），毛对此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这就是第二个重要的事实。

苏联继续提供军事援助，意味着中苏两国在军事行动方面继续保持军界高层的密切联系。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出现一个“专家派系”或集团，这个集团能够利用对苏联的依赖来对抗和限制主要由毛行使的最高权力。他们要按苏联的模式建立一支不参与非军事生产、不承担军一民之间群众任务，而与职业官僚具有密切联系的职业军官队伍。他们要打破毛对军队的掌控，用他们对毛的“独立性”，约束或控制个人崇拜，决定军事政策。

显而易见，彭在党的宣传机构拥有支持者。1950年代，有一部很流行的电影《怒潮》和一部同样很流行的小说《保卫延安》，他们对彭的赞扬几乎不加掩饰，而且相应地减少了对毛的颂扬。文化大革命开始“炮打（刘少奇的）司令部”后，这部电影和这部小说都被挖了出来，后来与《海瑞罢官》等文学作品一道受到了批判。下面谈谈争论中刘少奇一方的情况。

1962年以前，刘少奇个人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毛。在庐山会议上，刘不情愿地接受了用林彪取代彭德怀的选择。在1959—1960年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刘坚定地捍卫毛的至高无

上的领导,他赞扬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但是,在1960年12月,也就是毛决定与赫鲁晓夫决裂的几个个月后,刘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发表的一篇讲话却出现了不合时宜的奇怪论调。公开报道的他访苏期间的十篇讲话,除一篇外,均没有颂扬毛的领导。当时,他引证毛的话,是令人不解地要说明毛希望“走俄国人的路”。他还补充说:“我个人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从1961—1966年,刘在国内,以及出访朝鲜、巴基斯坦、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只有一次象征性地提到了毛主席。

与此同时,也就是1960和1961年,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作出暂时从社会主义道路退却的决定,这种退却与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有几分相似。“发展农业”优先于重工业,土地归公社的村庄(合作化)所有,保障农民住房和小块自留地为农户家庭所有,允许存在有限的自由市场,同时在工业领域引入奖金制度和其他物质刺激。这一时期奉行的是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和利伯曼主义(在中国叫作“经济主义”),新富起来的农民则尽力争取达到富足的地位。

毛的“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62年在党的会议上遭到了刘的批评,当然,这些会议的报告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不会公开发表的。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公开事件,这次事件的意义再一次被大批外国的“中国观察家”完全忽视了。由政治局委员陆定一领导的党的宣传部命令,大量重印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sup>①</sup>。

---

① 广泛用于共青团团员和高级干部教育的课本;其英文版为 *How to Be a Good Communist*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eking, 1951)。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的另一部著作《论党内斗争》和《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也是各级党校的教科书。

---

---

## 12. 宣传的阴谋

1939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出版时，共产党员在人民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正在争取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由他们领导的抗日爱国战争。《修养》尽可能地不提阶级斗争，而强调的是纪律和自我批评，它的含义是，共产党员的思想境界是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修养》的思想根源是孔子的学说，而且寓有“阶级调和”是共产党人的理想的含义。

《修养》是适应统一战线时期需要的著作，但在196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占有优势，而且中国正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它肯定有不合时宜的内容。刘少奇做了一些增补和删改，但是重点和主要内容仍然没变。<sup>①</sup> 错在哪里呢？例如，刘在引证列宁的一段重要的话中，令人无法解释地删掉了一句话：“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更令人费解的是，1962年版的《修养》还遗漏了下面句子中的黑体字：“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经过

---

<sup>①</sup>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 1958—1967*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eking).

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基本上是关于追求个人道德完美的高贵品格说教的著作。刘没有把自己的话与毛关于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的教导，以及关于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基本手段的教导，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他完全忽视了毛泽东在战时和战后撰写的重要著作，例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修养》，前面谈到的问题都是后来批判刘少奇的重点，但他在书中还写下了另外一些文字，影射对彭德怀的支持和反对毛的领导，他说，在党内：

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我们的党员也果然抛弃了他们，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全相信地说，在我们党内就从此不会再有这种人了呢？我们还不能这样说。……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作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

刘批评的原意，显然是针对毛以前的对手，王明和李立三等党内的强人，这些人已经声明狼藉，都被打倒了。这部书里还有许多可能是语含双关的文字。刘为什么恰恰在1962年8月，也就是在知道彭散布他的万言书批评的时候，重印这部书（当时他删去了其他不合时宜的材料）？

与此同时，刘在《人民日报》和《红旗》（党的理论刊物）上再次发表了《修养》（50 000字），并被广为引用。为什

么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在他的上级林彪力求以广泛学习毛泽东思想入门书的方式统一意识形态的时候，他要把刘的著作用作军队的教育材料呢？如果不是毛自己的话难道是党，使刘取代毛的教导和毛本人的吗？刘似乎确实在建立一个进行对立宣传的修正主义派别。总之，在1967年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声浪中，刘的这些做法成为批判的主要目标。

再谈一点关于人和政治的启示。1961年以后，毛和刘常常不在一起，毛长期不在北京（这是他的习惯），或是下乡或是下部队。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工作会议”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没有同毛商量就付诸实施了。毛后来对党的总书记和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的邓小平表示了不满，他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sup>①</sup>

邓小平没有向毛汇报的重要事项之一，是“三自一包”的政策。“三自一包”是中文的简称，其含义为：“扩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增加自负盈亏的小企业，包产到户”。这意味着采纳“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直接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对抗，并最终阻止“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的开展。

1964年，经济恢复了，新的实用主义干部谋求维持和扩大物质刺激。他们的这种做法遭到了毛的反对。毛在军队的支持下，以在军队和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反击。社会

---

<sup>①</sup> According to Red Guard literature: *Chairman Mao's Selected Writings*, "Speech at C. C. Political Work Report Meeting (24 Oct., 1966)" (Joint Publishing Research Service, 49826, Feb. 12, 1970, Washington, D. C.), p. 12.

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后来愈发激进，并最终成为1966年8月发布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基础。与此同时，林彪通过总政治部（人民解放军的党的领导部门），建立了一支数以百万计的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队伍。他们成为打击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主要力量。由于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摒弃了农民机会主义者的发家致富思想，农村的修正主义倾向得到了抑制。现在要转向城市了。

为什么要叫做“文化”革命？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最初冲击的，是党的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据说他们走的是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道路”，损害的是毛泽东思想。1960年代初期，影射攻击毛的领导的艺术作品和新闻已经开始出现，而且这种对毛的影射批评越来越公开化。

1965年底，吴晗成了最早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吴晗是北京市六位副市长之一，是市长彭真的好友。彭真是刘少奇从事工人运动的追随者，是华北地区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局委员。吴晗是历史学家，更具体地说，是著作颇丰的明史专家。我与吴晗结识时，他还是一个开明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一直没有成为中共党员，但是，他支持共产党人，反对蒋介石。他钟爱明代敢于批评皇帝和受过不公平处罚的清官海瑞，写了许多赞颂这个历史人物的文章。吴晗的第一个剧本是《海瑞骂皇帝》，1961年他又完成了该剧的续篇《海瑞罢官》。

在高层权势人物的支持下，吴（一个“驯服工具”）还与另两位作家一道，以《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sup>①</sup>为名，

---

① 他们的文章以农民与知识分子对话的形式，用神话和历史逸事，间接地攻击“三面红旗”和毛的社会主义总路线。

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在报刊上发表长期连载文章。吴的两个亲密的合作者是邓拓和廖沫沙，前者是彭真的助手，后者是彭真属下的统战工作专家。他们三个人的写作合用一个笔名。如果没有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委员陆定一和同样是中央委员的陆的副手周扬的默许，他们的文章是不可能发表的。

吴晗、邓拓和廖沫沙的经过精心掩饰的文章，对毛和“三面红旗”加以讽刺和丑化，但在局外人看来，他们讲述的是表面上无害的历史逸事和寓言，并没有包藏党内的怀疑情绪。但是后来，对他们的文章就是做了这样的认定，尽管当时没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包括华裔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内，能够看出这种比附。为什么在这些流言纷纷出笼的1961—1963年，毛并未加以制止呢？

无论吴晗是否真的要同毛进行一场堂吉柯德式的决斗，某些党的领导人这样看待《海瑞罢官》，是毫无疑问的。他们认为，这就是彭真暗中领导下的针对毛的权力的一场消耗战。刘少奇完全支持彭真吗？他后来否定了这一点。毛在1967年写道，“‘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sup>①</sup>但毛在1967年才说了那样的话；毛并未在1965年亲自发动赤裸裸的攻击。那么由谁来替他做这项工作呢？

毛认为，打倒某些党的高层领导人，必须使全国人民坚定地支持他的革命路线（他认为这是惟一的路线），这无异于一场二次革命，这个事实使他确信，他无法在北方找到适当的党内人选，也无法找到恰当的知识分子去揭露吴晗。他不得不在

---

<sup>①</sup> 彭德怀后来在自我批评中承认，他想做海瑞。

上海找到自己的人选：姚文元。姚文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作家，他在1957年与文艺和新闻界资产阶级分子的论战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受到了毛的赏识。更确切地说，与姚文元进行磋商的，是他的一位老朋友，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江青倡导具有无产阶级内容的新型戏剧、歌剧和芭蕾舞，意在使它们真正体现毛的“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但这遭到了北京的文化宣传机构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上海党内的亲刘派的反对。1965年，江青积极地投入了批判吴晗和上海党内亲刘派的斗争。

批判海瑞和吴晗的文章是由姚文元执笔的。文章修改了11次，并经过江青和毛的审阅，最后于11月在上海发表，其中的原因如前所述，毛最初无法让北京的党报刊载这篇文章。

姚的文章指责吴晗犯有严重的思想错误，诸如美化封建时代的人物，无视主要是由群众反对皇帝、官僚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海瑞的“改革”要求，只限于把高官抢占土地的一半退还土地的原主，以保证“体制”的稳定。很快，其他文章的冲击对象越来越明确，渐次涉及到宣传机构的负责人，但当时除吴晗外，这些人还没有受到点名批判。

这时，处在严重压力下的彭真，试图替吴晗开脱，因为吴晗的困境已经成为他自己的困境。如果吴和其他的密切盟友被宣布为思想上的敌人，也就是反革命，他是要承担责任的。彭真是1965年10月中央委员会秘密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sup>\*</sup>的成员。1966年2月，彭真以该小组的名义向全党的所有支部转发了一封电报，试图以“学术”错误来最大限度地减

---

<sup>\*</sup> 应为1964年7月——译注。

轻吴晗的罪责。与此同时，彭在报告中，避而不谈毛已经明确规定的，文化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而要求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批评的范围内。

毛指责说，彭的报告没有给五人小组的其他成员看过，也没有给毛本人看过。被激怒的主席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彻底抛弃了彭的报告。那是1966年的5月16日。中央委员会的《5·16通知》，毫不留情地把彭真打成了最大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通知》最后警告说：

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sup>①</sup>

从那时起，一场相当于“没有枪声的战争”开始了！

---

<sup>①</sup> Jerome Ch' en, *op. cit.*, pp. 112—113.

---

---

## 13. 公开的战争

毛从 1965 年秋天起就没有在公共场合出现，1966 年 5 月 16 日的会议和公报也没有披露他的行踪；这次会议和会议的公报一直到第二年始终是党的秘密。显然，毛的动向，只有已经取代了彭的“五人小组”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知道。当时广泛流传的说法是，毛或是病了，或是正在康复。

或许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促成了那种说法。1965 年 1 月，主席在同我谈话时，似乎不如往日那样强健。他两次不可思议地说到，他“快要去见上帝了”，<sup>①</sup>他还说了其他一些话，暗示着准备向他的“接班人”交班，这几乎不能成为准备进行一场巨大斗争的预兆。后来，我在北京被告之，对我说的这些话，可能是要误导敌人——在安排进攻战略的同时，促使敌人进一步暴露自己。不过，这仅仅是猜测。

事实上，毛在 11 月秘密地去了上海，并同年轻的和即将成为文化革命先锋的党内造反派谈了话，例如姚文元和张春桥，他们不久后就组织和领导了打倒掌管着党、工会和文化机关的刘的亲信的造反活动。毛没有病，他正忙于穿行在南方，发布指示。在北方，中央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则正在准备给彭真和尚未公开点名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sup>①</sup> 见附录，“山南海北”。

致命的一击。1962年，毛曾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是发表在上海的一家非官方的报纸上的，<sup>①</sup>那时，上海和北京的党的官方报刊，除解放军的机关报之外，都不在毛的控制之中。1966年6月，北京的军队报社接管了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理论刊物《红旗》<sup>②</sup>。它宣布，要发动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以清除“反党的黑线”，以及在教育、文学、新闻、戏剧和其他文化活动中发扬无产阶级的思想。

6月3日，《人民日报》刊出了一项向报社前编辑部开火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项决定宣布，对中共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由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决定没有提到彭真的名字，但此后他的党政职务均被解除了。与彭一起被打倒的，还有吴晗和彭的所有“学术”盟友。另一项重要的决定，是撤消了陆平和彭佩云的北京大学的领导职务。以他们为领导的党委会，由北京的新市委选派新的“工作组”加以改组。

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是怎样作出来的，确切地说是谁出席了5月16日的秘密会议，并没有予以公布。这次会议的与会者，是精心选定的，还是用候补委员加以“充实”的？或者

---

① 《文汇报》。

② 中央系指中央委员会，尤其是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它是党内的权威执行机构。

\* 李雪峰是在8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时任公安部长的是谢富治，李雪峰没有担任过公安部长——译注。

是毛在中央委员会得不到达到合法选出的国家主席的必要多数，或者是毛宁愿采取那种方式，他转向了非党的群众，为了清除把持着政治和学术领导权的主要的反毛官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他动员并教导了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军队得到的指示是“支持左派”）。

6月，为了给在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做准备，各地展开了贯彻执行《5·16通知》的革命。学校停课了，红卫兵开始了争夺文化机构控制权的战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开始席卷全国，对“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控诉和揭发也大规模地展开。

随着风暴的不断加剧，毛于7月16日引人注目地在华中大工业城市武汉再次出现。他在5000名“革命造反派”的陪伴下横渡了长江。报刊和电视对此做了大量的报道。“我们心中惟一的红太阳”（这就是标语牌上写的标语），看起来非常健康，充满了战斗的精神，已经完全把握住了方向。之后，他满怀喜悦地返回了北京。

刘少奇似乎并没有认真地采取任何有计划的行动，以应对毛的全面挑战，或者说，他在8月以前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就是头号的目标。显而易见，刘的目标是，一方面以减少个人崇拜的方式削弱毛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把党的权力交给遵守规则的人行使。那么党的章程没有明确地规定要用集体领导来防止个人崇拜吗？

我们的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

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sup>①</sup>

刘是组织的人，是党的领导机构的首脑，他信守党的规章，坚定地相信党的章程，他此时可能在本质上无法相信毛的胆量到底有多大。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打碎党的机器（对刘来说，那就是党的生命），运用个人崇拜来进行革命吗？刘关于毛的历次整风运动的全部经验，没能使他对如此剧烈的变化做出任何准备。

谁能预见到红卫兵呢？《5·16通知》里有批准他们的文字吗？当然没有。刘认为，他们是非法的。谁能想到，党的缔造者会号召群众（不仅仅包括组织精良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他们守纪律，是刘的党员教育方案培养出来的“驯服工具”，还有难以控制的非党群众），去造党的权力机构的反？1956年的党章，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总书记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严格按照苏联党章的样式）制定的，但实际上，造反派违反了党章的几乎所有规定。他们能违反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采取非法的行动，反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主席吗？所有这些都是毛认可的吗？怎么会是这样呢？

刘少奇并未无所事事。从5月起，他主要致力于维护党的组织，使之免遭毛的破坏，党的组织是他与邓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才建立起来的。各地造反派向我讲述的情况如出一辙。老干

---

<sup>①</sup> 见《中国共产党章程》和邓小平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北京外文出版社，1956年版。

部为了应对冲击，及时地向学校、工厂和机关派出大批干部组成的“工作队”，以把革命“导入”无害的轨道，防止党的核心机构和基层组织发生分裂，以及使“闹事者”名誉扫地。

但是，毛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也在用自己的干部开展工作；起初，他们人数不多，但非常坚决。为了使课程革命化，中央委员会已经命令所有的学校全部停课。辩论和自由地攻击领导，已然蔚成风气，造反有理，用大字报攻击权威当然也有理。

‘红卫兵最早出现在北京大学，那是在5月下旬，但随即被刘的“工作队”确定为“反党”，遭到了镇压。到底谁是红卫兵的发起者，现在已无从所知。在杭州与我会过面的那位将军，非常了解毛在文化革命期间的这个战略，他告诉我，红卫兵的出现既不是有计划的，也不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很快看到了红卫兵的潜在能力。受到鼓励的红卫兵，再次在北京大学兴起，并蔓延到其他学校。他们再次被压下去，斗争几经反复。其后，毛在6月的一声“红卫兵好”，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范围爆发了。

后来被认为是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可能并不可信，它只谈尊严，而没有深刻的检讨，其中的许多说法可能是似是而非的。其说法之一是，在6月1日以后和毛回到北京之前的“最初的50天里”，为了落实他所理解的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刘通过工作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只是在对工作的回顾中，他才认识到，试图孤立造反派和“反对驱逐干部的斗争”，是破坏了革命。

“自我批评”说，“我怕乱、怕大民主……怕反革命上台。”但是，即使在毛回到北京以后，刘仍在亲自指导干部和工作

队，他说，这是因为“在8月5日之前”，仍然“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和方向错误”，而且“常常是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的造反精神……”

那么8月5日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一天刚好是决定性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前一个星期，那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16条》，并把刘少奇从第二把手的位置上贬到了第八位。就在8月5日那一天，毛写了他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内容（“炮打司令部”）立即传遍了全国。不久之后，毛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公开加入了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列。从那时到11月间，他在天安门检阅了不少于1100万中国各地参与打倒旧权力机构的年轻人。

8月5日，刘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毛的下述文字，他终于承认，他就是这样“司令部”：

####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

刘写道，“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就是刘对自己在那个多事的“50天”中的所作所为的认识。在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知道，他应该做的事就是罢免他自己和他领导的党的机构呢？他只能做一件事，就像他过去一直做的那样，或如毛可能预料的那样，保护干部，并因此而落入精心设置的陷阱。7月中旬，毛主席露面了，畅游了长江，此时，刘少奇可能比

全国人民更感到惊愕。

战斗对刘而言即将结束（用毛的话说，如果是刘开战的话），但是，直到第二年，报纸上才把他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直到1968年的秋天，他才被逐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党籍。

在那一段时间里，年轻人铲平了旧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则领导他们从各级领导手中夺权和建立新的机构，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了另一个阶段。毛曾设想，这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但结果却花费了三年多的时间。毛领导人民对他缔造的党的当权派进行造反，令人大出意外，而这个庞大的机器对如此大规模的冲击的顽强抵抗，也同样令人大出意外：这艘船建造的比许多人的设想要坚固得多——一艘新船是不可能一天建成的。

正如已经预见的那样，前面只是对历史的概述，它远不能令人满意。它是不完全的。我们实际上没有听到失败者的话。这会遗漏许多重要和正在改变的事实：诸如对老革命生活的影响，在包括军队在内的社会各个角落出现的不同派别之间的切实而有限的内战中产生的忠诚的老干部的分裂，等等令人感到痛切的事件。例如，把周恩来安排到什么样的位置上——在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震撼中国的时候，他几乎以一人之身承担了生产和行政两方面的主要工作。

这个问题，像其他许多问题一样，要想得到更恰当的答案（如果有一点点可能的话），就要把叙述从过去转到现在，也就是在风暴相对平静之后再回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四编  
军队、党和人民



---

## 14. 军事专政

全中国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军队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我们大家都同军队有关系，”周恩来总理说，而且他可能会再补充一句：“军队同我们大家也都有关系”。

周总理耐心地向我解释了，为什么在重建后的党和政府部门中把个人区分为“军人”和“非军人”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是“军人”吗？他是军队的缔造者，他与朱德一道组织了这支军队，并从一开始就领导着这支军队，他也是党的终生领导。在担任共和国主席的时候（至1958年止），毛把党—军队—国家三者集于一身；他是党的军事委员会的终生主席，从1935年起，他就一直是事实上的总司令。

1936年，我在中国的老红军中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他就是指挥陕西东部前线部队的将军，那时，红军还没有改名为人民解放军。1965年取消军衔前，林彪佩带的就是元帅军衔。

在早期阶段是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党。但是，“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毛说，“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而且也不会有党。它们共同成长，相互依赖，就像中国人所说的是“唇齿相依”。

中国内战期间，我第一次进入西北地区的老红军根据地，那时，我这个局外人常常无法把党的政工人员与战斗人员区别开来。所有的人都穿着同样的棉制服，或是蓝色或是灰色（只是褪色的程度不同），除了衣领上的红领章之外（就像今天再

次看到的情况一样)，没有任何表示军阶的标志。他们的住房是相同的或是相似的，他们吃的食物与农民的食物大致相同，他们在几乎没有物质刺激的情况下面对相同的危险和艰难。政治委员常常兼任指挥员，指挥员也常常兼任政治委员，他们互相学习。在整个抗日战争和随后再次爆发的内战中，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变化。

1949年胜利之后，毛泽东说：“军队就是一个学校，210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

这所革命的“学校”是经过22年不间断的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新录用的人员必须汲取那样的经验。那时，城市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在政治上是薄弱的，而且持有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打过仗的共产党员大都出身于农民，主要是由他们组织和教育了无产阶级的干部，改变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期。

在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里，共产党人接管了国家政权之后，迅速建立起了庞大的非军队的党员队伍。到1956年，也就是人民共和国仅仅七岁的那一年，党员的人数就达到了1 000万，其中约80%是在革命胜利后入党的。1960年，党员人数为1 700万，其中的70%是朝鲜战争之后入的党。到1965年，据说党员人数已接近1 800万，还有大约3 000万共青团员。在全部党员中，仍有2/3出身于农民，但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有许多资产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除高层之外，打过仗的党员只占少数，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减少。

但是，军队仍然是“大学校”和思想教育的阵地。军队以及民兵中的党员老干部的密集程度，远远高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

复杂的历史情况，在老干部中造成的鸿沟，要远远大于代沟，尽管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一些参加过长征或有延安时期背景的老干部是一条“战线”，而后来者则形成另一条“战线”。在中国西北地区相对安全和部分实现“社会化”的革命圣地，毛完成了他的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情况的思想转变，而这里处理地主和资产阶级影响的经验，与华东地区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华东地区录用的干部，是在日军兵力薄弱的后方游击区接受培训的。但他们面对的，是在人口稠密而且绵延至海边的广大平原和谷地，在上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处理更为复杂的阶级问题。

1949年，“两条战线”合而为一，但他们之间的鸿沟一直没有完全弥合。刘少奇曾是华东平原的政治局委员，是城市地下工作的领导。胜利以后，他成为党的负责组织管理和新干部培训的最高领导人。刘最后成了城市党的化身，与此相联系的是，某些多少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著名知识分子、后来参与苏联技术援建项目的干部，还有一部分受到小资产阶级传统影响的工人。毛则是深深植根于广大农村的完全本土化的革命经验的化身，它代表着在武装力量中实现的平均主义传统及其与农民的密切联系。

上述说法，并不是一个能够“解释一切事物”的简单“公式”（任何公式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是指出多面体的一个被忽视的重要侧面。要理解军队在当今中国生活中支配地位的限度，记住这一点特别有用。

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毛泽东曾希冀弥合这种“鸿沟”，完全抹平上面提到的差别，使“两条战线”团结起来，于是他在1956年接受了党的选择，让刘少奇做了他的第一副主席，

而且在1958年他再次让贤，让刘承担了最高行政领导的职责。早在1959年，毛就认识到，鸿沟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正在扩大，他也认识到选择刘可能是一个错误。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种种事件是怎样发展成为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了。

对刘和盘踞着政府机关的堕落分子（毛就是这样看待他们的）而言，革命的首要目标不只是清洗，而是彻底摧毁他们的国家权力的大厦。建设阶段的任务（即把权力“交给谁”<sup>①</sup>的问题）甚至更为困难。1966年8月公告中的指示“开启”了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数以百万计“身份较低的”干部、学生、工人以及非党群众迅速起来，把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的对某些党的领导的不满发泄出来。在毛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煽动下，党的分支机构和党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工会、党校），实际上都被“革命造反派”解散了。

由红卫兵、工代会和党内的造反派领导的新的群众组织，在地方上夺了权。“旧秩序”的领导人进行反扑，以期取代“造反派”，恢复控制。临时性的委员会一个接一个地建立，又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新的领导上台了，旋即又下台了。上海是第一个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实现了“三结合”的城市——建立了由党内可以信赖的干部、新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这一切在其他城市和省份也慢慢但激烈地展开。

各级造反派没能就选择新的组织形式和领导人达成一致；他们分裂成为相互争斗的不同派别，一时间使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军队奉“中央”之命，“支持左派”（即真正的造反派，

---

<sup>①</sup>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的支持者经常使用他的这个说法。

而不是“旧秩序”的傀儡)，保护国家财产，但不得使用武力。在有些地方，红卫兵从民兵手中夺取武器，并建立了指挥所，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内战的萌芽很快蔓延开来。

解放军的总政治部，是惟一没有受到冲击的机关，它是富有经验的党的组织。到1967年，毛不得不指派它去结束混乱，去“支工、支农、支持广大的左派群众，实行军管和军训”，而且，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器。

周总理告诉我，在使用武力解除极端分子的武装、终止派别武斗和引导所有派别组成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部队的伤亡人数达“几十万人”。为完成这项任务，从军队抽调了200万“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革命委员会逐渐成为一个纯洁的和“接班人”的党，以及一个重新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模型。

这样，文化大革命使军队变得非常重要，而且在将来会更加重要。比党还重要吗？归根到底，每一种制度，无论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要生存就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不能独立于支持它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毛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成分”；但是，毛又说，“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注意，指挥军队的是党<sup>①</sup>。如最近的事态再次表明，而且为新党章所明确认定的那样，党还要指挥国家的领导机构。在

---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只有在阶级斗争结束和国家“消亡”后，军队才会消失。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就是以党的主席的身份向“党的军队”发出指示的，这种做法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即“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党是核心，应该对它的所有组成部分拥有支配权，军队也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党的核心出现了分裂，当然也会表现为军队领导的分裂。

中国的“人民军队”为党所用，受党指挥，也是党联系群众生活的主要纽带，有了军队，就可以把组织、宣传、生产和行政等各方面的任务完全结合起来。

“全民皆兵”的口号（可以回溯到党的早期历史），已经部分地实现了。所有体格健全的成年人，无论男性和女性，都以参加民兵的方式，成为军队的一部分。训练几亿民兵预备役人员做什么用呢？他们学习使用武器，学习运用战术和地形；他们向老战士学习革命的战例；他们还要了解领导原则，了解生产与国防的关系，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和武装自己的思想，最终使军队和人民融为一体——不使军队成为一个脱离人民、不参加生产，只花费纳税人钱财的职业集团。

毛在1928年说过，“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全国人民都“建在连上”了。

不仅民兵是军事性的，整个社会在作风和组织上都是“军事性的”。从幼儿园起，学生就被编成班、排、连。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员工和公社的社员，也是按班、排、连来编制的。城市里每一个街道的居民委员会也是按同样的方式建立的。我们参观了一个大型机车车辆厂的附属车间，其工作人员都是家庭妇女和工人的家属，负责人是一位中年妇女，我听到人们把她称为“连长”，可她正在干的工作却是洗衣服、补裤子和修

鞋。

这支军队的首要任务，是“为人民服务”。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宣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幸运的是，毛泽东思想没有关于种族主义、对外征服或者说是武装输出革命的说教。它的确倡导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但不赞成用武装侵略的方式来支持。在国内，它教导人们通过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来求得解放（包括对错误领导“造反有理”），教导人们实行备战。

这就是中国的军事化达到的程度，其严密的程度，确实会令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人感到吃惊。中国运用军队的方式（“为人民服务”），成就了中国军队的魅力，使它成为了一支独一无二的军队。

---

---

## 15. “为人民服务”

中国的东北曾被西方人称为满洲，辽宁省就坐落在东北，在辽宁的省会沈阳，我们参观了一所“聋哑”学校。负责管理学校的，是由5位解放军针灸专家组成的医疗宣传队。学校的孩子们，听不到声音，也不会说话，不过他们不是先天的聋儿。他们是由于麻疹、脑膜炎和各种高热等疾病而失聪的。

学校军宣队的队长李仲山告诉我们，这所学校设立于文化大革命以前。以前，教学生们用手语交流。1966年，毛接见了几百万红卫兵，我们学校也派出了一队学生，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

“学生们看到毛主席的时候，高兴得热泪盈眶，”李说，“但他们不能与别人一起欢呼，只能跺脚。知道了这种情况后，我们的首长指示我们，要注意毛主席‘中医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它要为人民服务的指示。”我们的医疗人员试着用针灸治疗聋哑。开始时，我们在自己身上做了大量的试验，我们把针扎在自己身上，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把针深深地扎入以前的‘禁区’。

1968年11月，我们被派到这所学校，负责孩子的健康，培训针灸人才。我们向学校的员工传授技术，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在不长的时间里，许多学生恢复了听力，并能开口说话了。他们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两年来，我

们对 582 名学生做了治疗，其中 98% 以上的人恢复了听力，80% 的人能背诵简短的毛主席语录，能唱‘东方红’。学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你看不到手语了，但你能听到朗朗的歌声和读书声。”

天真吗？人们都会看到孩子们洋溢着感染力的脸庞，听到他们努力发出的尖尖的童声。他们的年龄从 9 岁到 20 岁：健康、衣着整洁温暖、目光炯炯，注视着军宣队的李队长，似乎他就是一尊神。我们观摩了他们每天的针灸治疗：把针深深地扎入洗净的耳后。一个孩子忍住泪水喊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另一个孩子则大声地说，“《愚公移山》记心上！”

我们参观了教室，高年级的学生在大声地背诵和朗读。他们学习的课程，可以使他们达到中学的水平。我们为他们鼓掌，对他们的表现予以鼓励。他们听外国“叔叔”和“阿姨”讲话，脸上带着信任和希望的微笑，那微笑的动人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他们牵着我们的手，走过走廊。然后，在一所邻近学校的乐队的伴奏下，他们为我们表演了歌舞节目。他们一直把我们送到街上，微笑一直洋溢在脸上，掌声一直不断。

离开学校的时候，他们努力喊出的告别声，一直回响在耳畔，“我们的美国朋友，再见”。

中国的许多城镇现在都设有这样的学校。回到北京后，我见到了一位荷兰医生和他的妻子，他们曾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所聋哑学校工作多年，用欧洲的先进技术医治聋哑。我问他们怎样看待中国治疗聋哑的情况。他们摇摇头，说：“与卢尔德一样，是信仰疗法”。

针刺疗法可能仍然无法用解剖学理论解释，但是，它比卢尔德的疗法更为有效，这是越来越多的西方针灸医生现在可以

证明的。

在河北北部一个公社的村庄里，一座石头搭建的农舍吸引我停下脚步去拍照。走进屋里，我发现里面没有家具，只有一个臂部和面部扎着针的秀丽的年轻妇女和她身旁的一位穿军装的年轻男子，她是一位赤脚医生，正在接受解放军医疗工作者的针刺疗法的培训。炕上堆放着大堆草叶、散发着香味的草本植物、经过干燥的块茎和各种其他的中药配料。这些都是姑娘们从山上采集来的。炕上还放着现代医学的红十字药箱，里面放着避孕药。这种场面在数以千计的中国村庄里都可以看到。

我们在长城附近的沙石峪大队一户农民的家里住了一夜。那是一座有三个房间的石头房子，与村里其他人家的房子一样，整洁、牢固，屋顶下的大梁裸露着，屋前是整齐的园子，种着绿油油的蔬菜，还有一个石头围成的私家猪圈（圈里有两头猪）。家里的母亲是一个寡妇，三个已经成年的儿子，都不到30岁；两个在家的孩子还没有结婚，他们家没有需要赡养的人口，所以收入高于平均水平。屋里的箱柜中存放着被褥和衣服，家里还有挂钟、收音机、热水瓶、电灯、自行车和一张大幅的毛主席画像。

没有儿子当兵吗？这个寡妇仍然参加田间的劳动，她身体强健，头发乌黑发亮，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涨红了脸。她的儿子健康，也很壮实，但视力达不到参军的要求。接下来，她变得快活起来；当然，她的儿子都是民兵。她让我看了那个不在家的儿子的照片。他正和部队一起工作，是自愿的，她说，是修一座新的农村水电站——“为人民服务”。

在发生水灾、出现传染病威胁等紧急的情况，军队常常被用做冲在前面的突击队。军队也常常参加灌溉渠道的维修和扩

建工作，常常给学校的孩子们讲课。无数个英雄的战士，由于做出了出色成绩，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雷锋。雷锋怎样支配自己的津贴呢？自己花掉吗？不，他把自己的钱节省下来，借给需要用钱的人。他空闲时做什么？钓鱼？不，他为同志们缝扣子，他去照料病人。他为别人服务。“雷锋之歌”深受红卫兵的欢迎，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有效的军队宣传手段。

在沈阳城外，在靶场与数百名男女民兵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他们来自不同的工厂、学校，大部分人的年龄不到25岁。他们来靶场是演示他们的训练水平，他们演练了投弹，演练了对最远达300米的模拟固定和移动目标的步枪、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的射击。靶场一派节日或运动场的气氛：掌声和笑声此起彼伏。

解放军的负责军官告诉我们，民兵分为两类：1. “基干民兵”，年龄25岁以下，他们的武器由他们的工作单位存放和保养；2. “普通民兵”，年龄为25—50岁，或50岁以上，其中包括预备役人员和特种部队。所有的轻武器都在当地制造。

在一个逼真的村庄模型的一角，我们观看了一次“敌人的进攻”。村民们用游击战术轻易地歼灭了入侵者（掌声）。很难说入侵者是日本人、俄国人还是美国人，不过肯定是洋鬼子。接着一家徐姓的老少走了出来：祖父，60岁；他的妻子，58岁；还有他的儿子、儿媳和四个孙子。家里的成年人都在一个机车车辆厂工作。他们用冲锋枪和步枪，迅速消灭了100米外的目标。年龄最小的一位是个例外，他只有八岁，穿着红小兵的制服，有点卖弄，他匍匐在地上，花了很长时间，才用一支普通步枪，击中了三个靶子。

“他还没有枪高呢，”一位军官宽宏地笑着说。

“你们似乎在等待某些不受欢迎的来访者，”我说，“他们来自何方呢？”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不管他们从哪里来。”

靶子上写的字没有一点偏袒：“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倒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

---

## 16. 作为建设者的军队

中国西北陕西省的腹地，有一条狭长的谷地——南泥湾。它在西安以北约 200 公里，延安东南约 90 公里。延安曾有十余年（1937—1947 年）是中国共产党游击武装的总部，那时的游击武装叫八路军。几年前，延安和南泥湾之间只能步行，路上要花两天的时间，现在，有了一条不错的碎石路把两地相连。这条路要穿过荒芜人烟的峡谷，峡谷中灌木丛生，白桦树、松树、柏树和罗望子树相连成林，我们的汽车穿过林间的时候，不时会惊起野鸡、黄羊或山羊。

“好打猎呀，”我们的向导和主人说，他是对外友协延安分会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战士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除了猎物，没有别的肉食。”

我们去的那个谷地很狭窄，但有几公里长，那是一块已经开垦出来的谷地，周围是林木茂密的陡峭山地。1941 年，延安根据地南面和西面有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北面 and 东面有日本军队的封锁，南泥湾是响应毛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的示范工程，开始了由军队自己动手解决衣食的大生产运动。

毛说：“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

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sup>①</sup>”

作为开路先锋，八路军的359旅劈山开路，进入了荒芜人烟的南泥湾。359旅的军官大都是年轻但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每一个士兵都带着自己的武器，还有锄头、铲子和种子，以及足够食用一季的粮食。就像美国的拓荒者一样，他们开荒地，种粮食；为了度严冬，他们挖窑洞，盖房屋；他们请来一些没有地的农民帮助他们；他们自己动手制作木锄和木犁；他们在桦树皮上学习写字。他们有了第一次收获，又再一次播种，他们生产了足够的粮食后，把剩余的粮食卖出去，买来一些牲畜。他们制作木制的纺车，纺制自己的毛织品。他们还要为保持与国民党统治区秘密贸易的畅通而进行战斗。两个忍饥挨饿的冬天过后，南泥湾变成了一个林木茂密的地方。

向我们做介绍的，是一位有着在南泥湾参加大生产运动经历的男子。他叫朱少清，身材消瘦，是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英雄，他现在又回到了他曾经开过荒的南泥湾。朱1944年离开延安，打了不少仗。他今年53岁，是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第44团的团长。南泥湾现在成了国营农场，也就是“全民所有”的农场。大礼堂是一座瓦顶砖结构的单层建筑，牢固而简朴，朱团长在这里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南泥湾地区的发展过程。

在1949—1952年间，也就是土改、巩固胜利和肃反时期，南泥湾被改做劳改农场。<sup>②</sup>中国不承认有“政治犯”这个类别（这里的人只知道有“反革命分子”），但实际上，因政治原因

---

①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 - tung*, Vol. III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eking, 1953), p. 133.

② 见《今日红色中国》，第352—357页。

罹罪所受的处罚比非政治原因罹罪者要严厉得多，可以处以死刑。作为劳改农场，南泥湾属于罗瑞卿的职权范围。罗长期担任内务公安部队的领导，他也是文化大革命清洗期间最早倒台的高级官员之一。

1965年劳改农场解散，改为国营企业，许多以前的罪犯留了下来，在这里成了家。朱说，在当地也招收了一些年轻人。1966—1968年间，“刘少奇对这里有非常坏的影响。许多年轻人离开这里，参加了红卫兵的大串联。”

“刘少奇能影响到这么远的地方？”我打断他的话问道。

我被介绍给坐在团长旁边的一位老战士，我想他就是要做解释的那个人。他是农场一个大队的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他面容坚毅，高高的眉骨下面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他不时会笑一笑，笑的时候会露出几颗牙齿，他的名字叫王明德（译音）。他看起来像有100岁，但后来我看见他在田间穿行，像年轻人一样敏捷。他告诉我，他66岁了。原来，王和朱是在1933年的同一天参加的红军，而且是同一支部队的同一个班，从那以后实际上就一直在一起。

王身经百战，他的谈话漫不经心，似乎要把每一件事都讲得清清楚楚，在回忆南泥湾“过去的艰苦历程”时，更是滔滔不绝。他使我想起了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人民领袖》中的加利福尼亚人，就是那个开着车翻越落基山脉，而且只要谈到这件事就停不下嘴的人。

王的回忆滔滔不绝，令人着迷，不知不觉中时间就一点点地过去了；他讲了一个开荒时期用野草制作家纺毛线上色的“美丽的染料”的故事，故事讲了很长的时间，不知从什么地方就离开了我的那个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所以，我始终不知道

刘少奇是怎样影响这个遥远地方的局势的。

1966—1967年“无法无天的日子”过后，军队接管了农场，到现在，也就是1970年，生产状况已经大为改观。已经确定的目标，不久就会使南泥湾像大部分国营农场一样，进入高产的行列，使产量大大高于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的平均产量。

据朱团长说，南泥湾现在共有土地18 000公顷，种有谷物、果树和森林。他领导的员工有30 000人，劳动力的构成是：长期在这里居住的农户（包括以前的土地所有者和刑满释放的人员）、党的干部、学生、以前的红卫兵，以及一个团的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

农场的全部产出都属于国家。与其他国营企业一样，农场的运作以工资制为基础。住房免费，平均工资是每月40元（人民币），略低于工厂半熟练工的工资，但高于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现金收入。但是，南泥湾的工人必须支付自己的伙食费，平均费用是每月12元。成家的农户有自己的住房、厨房和自留地，实行工分制，但现金收入较少。

南泥湾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是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再教育的“五七干校”。关于“五七干校”我放到后面去谈，这里先谈几件平常见不到的军队的活动。

许多国营农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军队的管理之下，而地处边疆的农场可能全部都由军队管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军队管理的农场的数目，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我以前参观过一个国营农场，它位于佳木斯，距西伯利亚不远，它的机械化程度达到90%，实行完全的工资制，是真正意义上的工厂化农场。在农村的人民公社，机械化的程度不到15%，在

理论上以及很大程度在实践上，所有权和经济核算归于社员。最新的官方数字表明，国营农场的面积有 1 000 万英亩，或者说占全部可耕地的 4%。今天，它可能又增加了 50%。

每一个省和每一个边疆地区，都有由解放军和军队的党的领导管理的国营农场。“五七干校”新开垦的土地，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归“全民所有”。军队的生产建设兵团沿海岸和内陆河道开垦的边沿地块，也是国家的农业用地。

从土耳其斯坦到严寒的西伯利亚\*，军队沿边境修建了与防御体系结合在一起的新定居点，并驻扎在那里。据说，中国和苏联达成使两国军队沿 5 000 英里边界脱离接触的棘手问题之一，就是有许多地区，中国一方人口稠密，而苏联在漫长的西伯利亚和蒙古边界，除了军队，很少有人居住。对苏联而言，要维持 100 万边防军的供给，如果没有当地生产的大力支持，其开销要远远高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军队与国营农场结合在一起，能够基本做到自给自足。如果双方的军队后撤 10 公里，则苏联一方在某些地区会空无一人，而中国一方仍会有大批的居民（和民兵？）。这种情形是苏联当局不愿看到的。

除了战斗部队，什么人居民，也就是劳动力呢？党的干部只占其中的很小部分。在新的教育体制下，中学生毕业后要参加三年的体力劳动，然后才可以进入高等院校，如果能被自己的连队选中的话。多少学生上大学，多少学生参军、进工厂、下农场或去边疆，是由学校根据地方革命委员会制定的计划决定的。这些年轻人享受学徒工的待遇，国家只负责他们的衣食和几元钱的“零用钱”。生产建设兵团吸收了几十万来自

---

\* 即我国的新疆和东北地区——译注。

城市的年轻人（外国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并把他们训练成熟练或非熟练的劳动力。许多人就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永久定居了。

军队参与的工作包括：大规模造林、建造住房、修筑战略水坝和发电厂、开凿隧道，架桥筑路，等等。在控制污染方面，军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解放军的工程建设部队完成了铺设成都—昆明铁路的艰巨任务，现在这条铁路可以把越南和土耳其斯坦（新疆）连接起来。在北京，军队新建了地下铁道。军队管理着全中国的交通网络。大量的防空设施是在军队的指导下兴建的。我在上海造船厂观看远洋轮下水时，指挥官就是海军的军官。在农村的人民公社，军队是通过民兵体现的，可以向下延伸到大队和生产队。军事工业和核工业当然都是由军队管理的。

在有组织的文化生活中，军队的官员是掌控革命委员会的重要角色。在“三结合”（“党的可以信赖的干部”、群众组织的代表、“负责的军代表”）的革命委员会中，“负责的军代表”始终是少数，但我发现主任一职总是由他们担任。解放军的总政治部要负责大学和医院的思想教育。革命委员会也要负责思想教育，我们在西安访问的一家芭蕾舞团是这样，上海的另一家芭蕾舞团也是这样。

我只在一个地方看到不穿军装的革命委员会主任，那个地方就是南泥湾的“五七干校”。

---

---

## 17. 爱丽丝在南泥湾

在中国之外写“五七干校”，会使人感到它一定是镜子里面发生的事。在中国，它似乎是合理的，甚至是一件好事，但怎样向外面的人解说呢？人们会记得红色王后给爱丽丝的忠告：“在考虑下一句该讲什么时，要行屈膝礼。这样会节省时间”。更好的忠告则是：“从起点开始，一直走到终点，然后停下来。”

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好得离奇：“五七干校”是改革者的改造学校。旧时的南泥湾农场，是劳改农场，它收住的都是不情愿进来的人：顽抗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和普通罪犯，为了把他们改造成为刚成立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好公民，他们在日复一日地劳动的同时，还要学习社会主义的课本。南泥湾“五七干校”是许多“五七干校”的缩影，来到这里的党的干部，有的是自愿来的，有的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来到这里要重新学习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他们以前“脱离生产和实际”，现在要努力“使自己同群众相结合”，“向农民和工人学习”。

只要我们在形成解决问题的政治手段的背景下理解历史的问题，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与任何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有它的道理的，而且是可以解释的，“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毛重复着马克思的说法。如果是这样的话，“五七干校”也不例外。

“五七干校”的设立，最初是为了落实毛主席在1968年5月7日发出的一项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去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已经在军代表领导下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在那一年的上半年，开始全面贯彻“广大干部”到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下放干部中，有些人是大单位（大学、工厂、农村和城市的领导机关）的行政领导，有些人是党校的教师，有些人是其他社会团体的领导。

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要让大学校长下放劳动呢？

据说，中国的整个知识生活，正在跌回受孟子的传统格言影响的旧有格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学和大学校长，正在用越来越难以应付的考试，清除农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学校的学制没有变得更短，更符合群众的实际需要，反而被延长到6年，大学的许多专业甚至延长到8年或更长。

美国学者约翰·加德纳向1971年召开的一次关于中国的研讨会——“知识青年与城乡不平等”提交的论文认为，“这种情况造成的社会后果，正如毛所认为的那样，不会使任何希望建立激进的新型社会秩序的人感到鼓舞，大学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大学正在培养的是怀有个人野心动机的精英。”

再次强调专业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大学生的数量减少了，而高级干部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的数量相应地增加了。……例如，北京大学工农家庭的学生数量，1958年为将近67%，到1962年下降到仅仅为38%，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则增加了一倍多。大学

里的许多教授轻视无产阶级学生，认为他们是“不可雕凿的朽木”，对这些学生通过（政治）“阶梯”进入大学感到忿忿不平。自然科学的8个系1958年录取的237名学生，如期毕业者只有45人，其他人或是退学或者是留级。

在北京工业学院，919名调干生和军队选派的学生，被淘汰者超过800人。清华大学被淘汰者有200人。北京商学院108名退学的学生中，约94%是工人阶级出身……韩素音，一位消息灵通和受欢迎的访华人士，在1967年写过这样一段话：“对城市中大学和高中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社会主义中国建立17年后，仍然有超过40%的学生出身于资产阶级、地主和资本家的家庭，而这些人只占总人口的5%。”<sup>①</sup>

教育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过这里只简略地谈一些它与解说“五七干校”相关的情况。南泥湾“五七干校”的人员构成，也有一些教员，但主要是经过锻炼的党的干部，他们也以不同的方式负责教育工作。

刘雨生自我介绍说，他是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是一位个子高高、腰板笔直、皮肤晒得黑黑的三十多岁的健壮男子。他是那种一望可知的“知识分子”。多年前，知识分子只意味着识字，但现在至少要中学毕业。干校成立于两年前的10月4日，刘也是在那时来的干校。干校成立时有467人，是从陕西省省会西安地区11个单位抽调来的。

他们不把自己叫作学员；他们是“五七战士”，刘先生解

---

<sup>①</sup> John Wilson Lewis, editor,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Palo Alto, Calif., 1971), pp. 266—267.

释说。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培训西安市的市级干部和附近各县的县级干部。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改造我们的世界观；让干部向工人和农民学习，使干部基本同工人和农民结合在一起；一面学习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一面参加体力劳动。

旧党校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生产与实际。我们的干校与过去的国营农场也不一样，过去的农场只从事生产。经过两年的锻炼，我们已经输送了414位革命干部。他们中的有些人回到了城里，但许多人在农村落了户。还有问题吗？”

刘先生是什么样的人？他是这所干校毕业留校的政工干部。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是“市里青年工作的领导”——可能是共青团的书记。他的旁边坐着一位相当漂亮的年轻女性，她叫徐秋凤（译音），她以前是西安市城东区东方红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现在是干校“水稻种植一连”的战士。她好像还负责管理厨房。这时，有人（原来坐在桌边的6个人）帮忙从厨房里端出装在大盘子里的新鲜猪肉、玉米饼、烤红薯、西葫芦、牛奶、炒鸡蛋、苹果，还有不少干校生产的其他美味食品。

干校有耕地920亩（153英亩）<sup>①</sup>，53头牛，300多头猪，还有若干鸡和鸭。800亩地种了稻子和别的粮食作物；去年的产量是17万斤（85吨）。40亩地种了蔬菜和果树，50亩地种了土豆，30亩地种了大麻。干校现有216名身体健壮的“五七战士”，其中1/4是女性，平均年龄是30—40岁，还有为数

---

<sup>①</sup> 一亩约等于1/6英亩。

不多的老年人，年龄最大的是 61 岁。他们当中有 7 位医生。干校现在基本做到了粮食、住房和燃料的自给自足（他们自己建了一座小水电站），但是生活水平仍然很低。

“战士们”新开垦了一些耕地；他们用伐来的木头建造房屋（做家具），所有的零杂活都（在请来的国营农场的农民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农闲时在军队负责人的领导下学习和讨论政治。经过半年或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可能获得“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称号。积极分子是什么？积极分子就是由连队选出来的人，他不仅是好学员，而且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在干校的时候，我了解到，干校的所有人员保留原来的工资，也就是以前按照他们的干部级别确定的工资，他们的家人与以前一样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

管理委员会共有 30 位成员，在简朴的宴会上，各个部门的领导都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宴会的食品新鲜、简单，远不如美食店的食品，但与生产这些食品的经过改造的改革者一道享用这些食品，的确令人感到非常高兴。

例如，宴会桌上有一位叫谭仲（译音）的人，他 48 岁，穿着紫红色的夹克衫，微笑时会露出洁白的牙齿。他以前是西安市革命委员会的高级干部，现在负责管理干校的养猪场，刚刚被“我们连的战士”选为积极分子。他先念了一段毛关于“到农村去”的语录，然后说，他抓住了“机会”。

“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很好。我身居领导岗位，但脱离实际，所以我要到这里来。他们安排我在养猪场工作，任务是起圈和学习养猪。我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与农民相结合，他们是我的好老师。我渐渐地接近了群众，改造了我的世界观。”最后一句

话的意思是“斗私”和成为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

再例如，李万春（译音），50多岁，以前是西安的市委书记。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他的革命经历可以回溯到延安时期，但是他（受到城市“糖衣炮弹”的毒害）脱离了农村。现在，他“种玉米和稻子”，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文献，但是，仍然“差得远”。

刘文元（译音），40多岁，1950年入党，1960年大学毕业，后来被提升为西安市第24中学的校长。过去，他根本不知道农民的劳动有多辛苦。他怎么能教学生呢？现在，他是五七战士，“在大田从事体力劳动”。他仍然处在“斗争”（使自己摆脱阶级背景的不良影响）和“自我批评”阶段，他希望把自己“改造”成具有“新的世界观”的同志。

坐在他旁边的是黄一平（译音），38岁，以前是西安市共青团市委的书记（现在正在重新恢复组织）。1948年时他在延安上学，后来，受党内修正主义特权分子贪图安逸生活的诱惑，走上了邪路。他忘记了过去的苦，成了一个官僚主义分子。毛说过，“官僚主义者与工人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抗的阶级。”官僚主义者“正在变成吸食工人血汗的资本主义的吸血鬼。他们怎么可能有充分的理解呢？”黄来干校两年了，还没有成为积极分子，但已经成为“干校水稻一连的连长”。那就是进步。

“刚开始，”刘主任说，“我们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转变’，‘经受了斗争的考验’。为什么要在远离西安800里（240英里）的森林里建立一所干校呢？有些学员‘害怕艰苦’。为了使他们变得坚强，我们订立了一个惯例，每一个学员入校，都要从这里步行到180里外的延安，再从延安步行返回这里。我们请

359旅的老战士来干校做报告，给我们讲南泥湾‘过去的艰苦岁月’。我们渐渐培养起了对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现在看来，选择南泥湾作为校址是个明智之举。

我们在这里重新体验革命的艰苦岁月。刚来时，这里的条件非常差，窑洞塌了，有些房子也塌了，地里野草丛生，没有工具。我们应该向西安伸手吗？大多数人说，不。我们发扬359旅自力更生的传统。自己砍树，做床，做家具，用同样的方法盖房子、制作工具和篮子，学习烧砖烧瓦。

我们修建了自己的发电站（为此，我们贷了款）。去年春天，我们遭遇了洪水，泥水漫过了溢洪道，冲毁了稻田。是《愚公移山》挽救了我们。我们用愚公的精神，清理了溢洪道，用双手搬走了500立方米的泥土，修复了稻田，及时进行了补种并获得了好收成。自力更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依靠一双手，无事不可为’成了我们的口号。”

就这样，我们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参观了农田，会见了不少“战士”和他们的农民同志，看到了整齐的农田和坚固的新建筑，最后仔细地参观了建在山坡上的整齐的养猪场。这里的人是好人，他们显然对像农民一样从事微贱的劳动感到满意。当时，他们那种令人钦佩的精神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心里，我甚至羡慕他们能从这种强大的集体改造中获益。就在我思考我在笔记上记下的资产阶级的环境的时候，我想起了白方王后。“我不能相信！”爱丽丝说。“你怎么不相信？”王后沮丧地说。“也许你不够努力。我小时候每天花一个小时来相信不可能的事。有时早餐前共相信6件这样的事。”

数以百万计的人有过“五七干校”的经历。据说，今后所有党员都要去干校。我的翻译姚伟曾在这样的干校劳动过一

年。他的妻子是一位俄语专家，现在仍然在干校劳动。我的朋友黄华，现在是中国常住联合国的代表，1969年曾经经历了这样的“锻炼”，他的妻子是一位党员领导干部，也经过了干校的“锻炼”。中国的外交官从国外的职位上奉召回国后，都曾去过农村的干校。

艺术家也要去干校吗？据说毛说过这样的话，“让我们把歌唱家、诗人、剧作家、文学家都请出城市，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分期分批地下放到农村和工厂。不要让他们整天待在办公室里；他们在办公室是写不出东西来的。”他们也去了干校，我在城里找他们时，许多人仍然在干校接受“锻炼”。

所有这些人都是真诚地接受“改造”吗？肯定不是所有的人。如果他们只是在无法抗拒的压力下被迫“下放”的，那么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发生转变。我的一位已经在烈日下劳动了几个月的老朋友向我解释说，制度的作用比那要微妙得多。

“事情是这样的，无论你在正常情况下干什么工作，你都属于一个连队中的一个班。你要参加每周两次或三次每次两小时的学习，要参加每周一次的与其他班一起召开的会议。你不能只是坐在那里默读毛主席的教导。你要就一个问题找一篇毛主席著作，大声地朗读这篇著作，然后要讨论这篇著作在实际运用中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要就自己的日常工作与现实的差距，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得非常激烈，经过这样的自我批评，这样的敞开灵魂，人们就会感到自己需要净化。这个时候他就会自愿地下放到农村去。”

像皈依宗教吗？

“如果有人没有这种感觉怎么办？”

“这个，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一段时间过后，别

人都去了，只有你不去，就会有种种说法，你会感到别人都在看着你，这回轮到你去了一—要知道，别人都是要帮助你。有时候，全班或全组人会申请一起下放。每个人都摆脱例行的事务，去体验体力劳动，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回来时，经验肯定更丰富了。”

如果是年轻人，下放是比较容易承受的事，那可能是一种乐趣。对老年人和专业人员来说，下放无异于浪费他们那剩下不多的时间。对于不能胜任体力劳动的人来说，下放可能是极其艰苦的工作，如果连队的领导“很坏”，那么情况会特别糟糕。我认识一些经过数月严酷磨难的人，他们弓腰屈膝在稻田里劳作，他们搬运沉重的货物，他们从事超过自己身体能力的工作。对知识分子来说，磨难更多的时候是精神上的，他们在内心里是不可能把自己等同于不能读书写字的农民和士兵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有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他们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中，是最看不起体力劳动的人。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对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异常新奇的事，他们甚至把在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也存在这种做法的新闻（尽管最近这种新闻不太常见了），看作是一件“不可能使人相信的事”。23岁以前，我曾在学校的假期和课余，做过印刷厂的学徒工、服务生、农场帮工和其他一些零工，后来也为当过水手而感到骄傲。通过那种方式，我学会了尊重劳动鄙视懒惰。但是，这样的劳动现在不再吸引我了，我认识到，为了挣钱或获取经验而劳动，与出于政治原因而劳动，是不一样的；当然，我并不是想把自己与农民或工人“等同”起来。“等同”是不会有精神内容的——这与现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显然不会有“等同”的想法如出一辙。

在离开这个话题之前，应该做一点说明。在中国，严重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受到的处理，与自愿成为“五七战士”的人相比，要严重得多。据红卫兵称，有些国民党特务和专门进行破坏的人被破获了。尽管毛一再强调，即使是“人民的敌人”，也决不能打骂，但大量的事例表明，他的话被当作了耳旁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抓捕的人，许多都是被诬告的。被捕者一经拘押，他的所有政治和家庭背景都要受到调查。在权力机关不断更迭的过程中，被一派人抓捕的人，可能被另一派人释放，指控对自己提出指控的人完全是为了报复。到军队介入和清除派性的时候，有几万宗历史的遗案需要复查。在所有这样的变迁中，总是有人滥用自己暂时获得的权力，对选定的受害人，或是进行殴打，或是逼迫他们“自杀”——这些受害者往往是重要和具有使用价值的革命者，他们充其量是在热心遵循“修养”规则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

毛泽东向我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两件事他不赞成。一件是说假话（公开宣战比说谎好）……

主席最不高兴的第二件事，是虐待“俘虏”（被捕的人员）。那不是红军或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年代采用的办法……

我们再引用一次刘易斯·卡罗尔的话，“我向你说过三次的事就是真事。”但是，没有人比毛主席知道得更清楚，尽管他说了三千次，但是在以他的名义要权的那些人中，总是有人置若罔闻。那么，那个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人究竟是谁呢？

---

---

## 18. 军队和人民

在中国,穿军装的人无处不在,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走在人民中间是不带武器的,他们的行为是公众的榜样,任何一个来访者都可以很快地发现,军队是深受爱戴的。小学校里,到处都是红小兵;几乎每一个我见过的家庭,都希望家里至少有一个男孩或女孩能够符合高标准的参军条件。国家的宪法规定,服兵役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和义务”。我在营房和其他地方见到的士兵,没有一个人想成为“(由于道德或宗教原因)拒服兵役者”(在我向他们解释了这个说法的含义之后),也没有人设想自己会在将来参加一场自己的国家是“错误一方”的战争<sup>①</sup>。

这是一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它有高度的纪律和民主,它具有崇高的威望,它在我已经谈到的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与大部分军队相比,它无疑是人民负担较少的军队。它是一支自我管理的军队。它消费的粮食,大部分由自己生产,它没有随军人员,它随时准备为出现危急情况的农村和工厂提供帮助。

1959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几乎完全恢复了延安时期的“工作作风”。肩章、特制的军装、大檐帽、勋章等军阶标志,以及按照苏联军队的样式仿制的其他表示军官等级的明显标

---

<sup>①</sup> 见《今日红色中国》,第287页。

志，在1960年代初期全都不见了。恢复了军官与士兵之间相互开展批评、军官定期下连当兵等做法。所有的指挥员都是从士兵中提拔起来的。与官兵差别的缩小一样，津贴和生活条件的差别也缩小了，尽管仍然远不及延安时期军队中的“平等”。

军队训练非常强调政治，政治则意味着与人民的关系。需要牢记（并会唱出来）的规则有，“八项注意”，基本上与红军刚刚建立时一样：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还有“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还有一个规则叫做“三八作风”，用中文表述就是三句话和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个人或连队做到“三八作风”好、政治思想好、军事训练好和日常行为好，就可以获得“四好”荣誉证书\*。

获得“四好”称号的人，可以在家里把荣誉证书挂在毛主席像的旁边。

总而言之，军事训练的原则是，必须按照毛的“政治挂帅”的教导，使军事训练服从思想政治工作。其指导原则是“四个第一”：在人和武器之间，人是第一位的；在政治和其他工作之间，政治工作是第一位的；在思想和日常政治工作之间，思想工作是第一位的；在人的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之间，

---

\* “四好”是连队的荣誉称号，个人的荣誉称号是“五好战士”；四好为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为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译注。

活的思想是第一位的。

这些基本原则，反映了毛的一种信念，即“人比武器更为重要”，把思想—政治因素置于首位，而武器的精良和数量是无足轻重的。这样的概念说明，毛很早就吸收了孙子的思想。孙子（约公元前 350—450 年）是中国古代的战略大师，他的《兵法》一书充满了富有创见的智慧。孙子认为，在战略上有 5 个基本要素，其首要者为“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sup>①</sup>

当然，“政治挂帅”并不意味着人民解放军轻视现代武器和熟练地使用现代武器。毛说，“政治与技术必须统一，这就是红与专的含义。”这里只是对中国的武器装备做一般意义上的估价，并没有与西方情报机构争锋的意思。中国人民解放军有 300 万常规部队，有数百万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和辅助兵员，它是无可争辩的亚洲最强大的地面武装。与它的高炮武器一样，它的步兵和炮兵武器，在越南战场上非常有效。解放军对这些武器和现代化的装甲武器，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中国从 1960 年代初期就可以仿照苏联“米格-19”型飞机自行生产喷气发动机，有报道说，1970 年中国已经可以生产自行设计的喷气式飞机，据说性能要优于苏联的“米格-21”型飞机。它现在也能生产数量有限的轻型和中型轰炸机。

中国的空中力量以及水上舰只和潜艇不及超级大国，但是，它的综合军事能力，完全能够阻止任何试图用常规武器考验它的巨大国防力量的侵略者。1971 年，中国拥有了规模不

<sup>①</sup> Sun Tzu, *The Art of War*, Translated by Samuel Griffith (New York, 1963), pp. 63—64. 见《孙子》卷上《计篇》。

大但足以令人认真对待的核武器，拥有了短程运载工具，这极大地缓解了以前面对核威胁时的无助感。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向中国发起核攻击而不遭到严厉的打击。尼克松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现实，并谋求在某种和平共处的理性体制下发展新型的两国间关系，关于中国已经初步掌握洲际导弹的传言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相信，所有这一切大多数“人民”都是理解的。理解者中包括兴高采烈的老农。中国曾经受了一个多世纪的屈辱，被西方和日本侵略者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在中国凭自己的力量强大起来以后，我曾听到他们骄傲地把自己称为使中国强大的参与者。他们认为，中国的军队是一种集体的成就——是他们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努力创造的成就，是一支宣传教育使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军队。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吗？毛也承认，5%的人仍然“反对社会主义”。对于这5%的人来说（是多还是少？），军队意味着什么？是防止他们夺回祖传土地的暴力？是防止他们“成为富人和高官”，或者成为道士、无拘无束的艺术家、“脱离实际”的作家的暴力？中国每个月都有数百人设法逃往香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怀着挣钱的梦想。但是出逃的人中，确实很难发现退伍的解放军战士。

毛不止一次说过，“军队是个大学校”。士兵在军队里可以学会鄙视自己的欲望。他们应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从事农业生产，办中小型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交换其他的等价产品……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工作就可以“兼起来……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sup>①</sup>

---

<sup>①</sup> Jerome Ch' en, *Mao Papers*, op. cit., p. 104.

中国有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我常常可以看到目不识丁的人被五花大绑强行征兵。军官们常常压榨士兵，不给他们发足粮饷，士兵抱怨还会遭到殴打。军官们还经商、做黑市买卖，他们关心的首先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自己的家庭，最后才会想到士兵（就像南越西贡政府的军官）。今天的解放军“战士”是有文化的人，他们能够学习毛关于怎样成为一个好指挥员的教导，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在“斗争会”和“批判会”上提出申诉。我没有听到关于军官贪污的案例，这样的情况甚至可能比婚前性关系更为少见。

就薪给和生活费用而言，人民为这支“精良”的军队的付出，少得令人难以置信。是多少呢？

1970年10月的一次晚宴，我坐在聂荣臻的旁边。我与他初次结识是在1936年，后来他成了元帅，现在是核科学发展委员会的领导\*。我没有了解关于原子弹的秘密，而是他对解放军做了详细的介绍。每年给每一个士兵发放3件衬衫，冬夏两季的鞋或山地鞋，冬夏两季的整套军装，士兵的粮食不定量。需要赡养父母的人，通常不能入伍；特殊的情况要发给家庭补助。新兵一般都未婚，入伍后可以得到免费的训练、教育、医疗和娱乐，而且不用支付伙食、住房或其他生活费。士兵的基本津贴是每月6元钱，聂荣臻认为，这么多零用钱完全够用了。

后来在浙江，我见到了周文长（译音）将军，他告诉我，津贴费已经提高到每月12—15元。周将军还告诉我，大多数

---

\* 应为国防科工委——译注。

军官最近自愿削减了 30% 的工资。按照 1960 年代我了解的工资级别<sup>①</sup>，这可能会使陆军上将的收入降为每月 350 元（我第一次见到聂荣臻时，红军的军官每月可以得到 5 元钱）。一位在宣传队工作的陆军中尉告诉我，他每月的工资为 70 元——减少了大约 40%。文化大革命没有拉平解放军的工资标准；中级军官的工资水平保持不变，低级军官的工资有所提高，高级军官的工资则有所减少。

与非军事组织一样，军队也遵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法则，同时也考虑年龄、服役年限、家庭负担和级别等因素。大部分军官和高级军官还可以享受特殊的住房和用车等许多额外的待遇。

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很不错，但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解体之后，由军队承担了权力的角色，中国对此就没有某种担心吗？过去，农民家庭渴望送孩子去上学，寄希望于孩子日后能成为富人和有权力的人。“为了当大官而当干部”是一种不断受到谴责的由来已久的思想，也是成立“五七干校”的原因之一。那么，“为了当大官而当兵”的思想呢？

我们还能记得，军队干部在以前的党员中毕竟不到 1/10。他们能够完全靠自己来管理这个巨大的国家吗（还要加上他们所有的生产和国防任务）？但是，过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也称为“一小撮”吗？怎样防止党内的高级将领集团继承过去的高级官僚集团的权力呢？

我已经部分引述了一个人给出的答案，这个人就是经验丰富且身居国家建设者高位的周恩来总理。1967 年以后，他承

---

<sup>①</sup> 见《今日红色中国》，第 285 页。

担起了重建被打碎的国家 and 党的领导机构的最繁重的职责。刘少奇的权力机构受到冲击后，周恩来总理继续享有革命委员会所有三方力量的广泛信任。他必须设法把革命委员会融合成一个统一的行政队伍。这项工作需要“解放”在清洗中靠边站的技术人员和富有经验的党员干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者是宁愿继续靠边站，或者是不愿承担新的职责。同样艰难的任务是，从（取代了工会的）工代会和农村人民公社中选拔工人和农民，为革命委员会注入足够的“新鲜血液”，以使国家更直接地向群众负责，即向非党非军的大多数人负责。

那么军队的高级将领集团呢？军队的官僚机构呢？周恩来的回答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无论你是在政府里、在党内，还是在军队里工作，我们在党内都是平等的。军队干部到政府机关工作，他们就是政府工作人员，就不再负责军队的工作。他们实际上是从军队调动出来的。这样，用不了几年，他们就会和我们一样了。”

“和我们一样”——是指与周恩来一样吗？周饱经风霜，有着 50 年的革命经验。在老一辈人离开之前，这个新的复合体能够尽快地产生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吗？在我又一次“下乡”时，我还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第五编  
人民公社



---

---

## 19. 起 点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1960年以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指导原则。在那个严重饥荒和总危机的年代，中国的领导人抛弃了过分强调重工业和对农业投资不足的做法。没有了苏联的援助，中国能够采取的做法，只能是那个口号“自力更生”。他们把从苏联借用来的那套做法置诸一边，让“工业为农业服务”，以城乡关系更加平衡为目标，完全用自己的力量，致力于内地的发展。

最为重要的是，毛想改变中国人的环境，并因此而改变人自身。农村地区必须发生明显的变化，必须实现现代化，那里是绝大多数人的家园。

到1971年，农村人民公社已占有全部可耕地的95%。除5%—7%的小块自留地仍为农民私有外，人民公社的所有耕地都是集体财产。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或国营农场占有的耕地不到5%。

中国幅员辽阔，大致相当于欧洲和苏联西部的总和，但全国面积的2/3是险峻的山地、荒地或沙漠。垦荒仍然基本上靠人力，全部耕地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大约13%，耕作区和人口聚居的地区仍然大部分在中国的东半部，在人口稠密的三角洲地区，人均可耕地不到700平方米。但由于大量施用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均为当地产品），并有灌溉、杂交良种和其他经过改进的耕作方法，普遍实现了一年两熟和三熟。

据周总理说，中国的 1800 个县分为大约 70 000 个农村人民公社，公社之下又分为 75 万个大队或村。一个大队由若干个生产队组成，生产队是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单位和基本核算单位。大队拥有大型的农具和小型的工业。它们的大小相当于乡或区。公社由若干大队组成，它是县以下的行政单位。

人民公社的人口约为 5.5 亿，他们要用大约一亿公顷土地上生产的粮食供养自己，还要卖余粮供养城市和县镇里的人。由于国家提供的帮助非常少，他们还要用 2000 万公顷土地种植棉花、茶叶、油料、烟草、苎麻等“经济作物”，以及植桑养蚕，发展畜牧，为他们自己和政府部门生产利益，而且为实现他们自己的现代化积累资金。

**中国的未来和社会主义的成败，取决于人民公社通过明智的管理和热情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的稳步增长。**

1960 年以来，我 3 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参观了 30 多个人民公社，最北端到了靠近西伯利亚的边境，最南端去了与越南接壤的云南。这次来中国，我参观了 11 个人民公社，其中的 3 个公社我曾于 1960 年参观过，经我要求后做了重访。再访这 3 个公社，我看到在耕作方法、水利工程、电气化、机械化、土地开垦、住房和小型工业方面都有了改进——比现金收入的增加更为明显。在农业持续增长 8 年之后，大多数农民现在相信，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实行“五保”（党的指示所承诺的）是真实的。所谓“五保”是指：保足够的粮食、住房和穿衣、燃料、医疗和适当的安葬（火葬）\*。

---

\*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五保”的规定是：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译注。

“足够吗？”按照西方拥有土地的农民的物质标准，中国的人民公社仍然非常贫困。革命（胜利）以前，大部分农民无田无地、终年过度劳作、忍饥挨饿、没有文化，而人民公社供应的生活是“足够的”，超过了农民以前的梦想。

---

---

## 20. 令人动情的旅程

1970年我见到的最贫困的一个公社的大队在保安县（现改名为志丹县），位于中国西北陕西省中部的腹地。这里的户均年总收入，不到80美元（与10年前相比，已增加了一倍多）。相比之下，马桥公社就是一个“富裕社”，马桥公社位于上海郊区，距上海大约一小时车程，全公社人口3.6万人。马桥公社地处粮棉产区，1970年的总产值约为每户720美元。

全社总收入中国家税收占3%—8%，包括在占总收入的40%—50%的管理费中。粮食的15%—20%做为国家的订购粮，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工业、畜牧业和“经济作物”的收入是纯收入。其中的10%—25%或更多，留作公积金，用于购买设备和改进设备、福利和贷款基金、医疗保险和老年人的照顾。这笔款项的80%—85%由大队保管，剩余部分用作公社的投资和管理费用。

1969年，马桥公社每个劳动力的净收入约为102美元，每户（4.6人）的平均纯收入约为274美元。从表面上看，保安县一个没有实现机械化的大队，税收只占总收入的3%左右，而每户的纯收入只有半机械化的马桥大队的1/3。在马桥公社，社办工业和队办工业（造船、建材、机械和变压器等）的产值可以达到生产总值的25%以上。这个比例非常之高，就全国而言这仍然是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但是现在许多人民公社

都有了满足自身实现现代化需要的机械厂、小型拖拉机厂、水泥厂和小化肥厂。

如果像我在本书做的那样，把人民币折算成美元（按官方的汇率 2.40 人民币元折合 1 美元计），会使人产生误解。在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中，农民的收入主要是粮食。他们按国家确定的市场价格出售余粮，也就是超过个人需要的粮食（相当于他们所分粮食的  $1/4$ — $1/2$ ）。他们的人民币现金收入，具有高于国外名义汇率的购买价值，我在前面引用过的价格可以说明这一点。

现在，许多人民公社都在新建的水库和水渠里养鱼，捕获的一部分鱼“免费分配”给社员家庭，蔬菜或自家种或购买，买菜的价格非常便宜，几乎可以不计入家庭的开支。“私人养猪”（在自留地里饲养）可以使许多家庭的收入每年增加少则 10 美元多则 60 美元。农户现在愿意多吃几次猪肉，少收入一些现金（在过去，农民一般每年只吃两三次肉）。社员家家都有自己的住房，无须付房租，但他们不能把自己的住房出售或出租。公社财富的最大部分是不动产——社员对农业改良的集体投资的节余资金和土地所有权所拥有的份额。

工资或集体收入的分配，现在通过各人自报本人工分的方式确定（一种信用制度），个人估算的工分值生产队可以认可，也可以做出或提高或降低的决定。由于高估工分值被邻居否决是一件丢脸的事，所以低估是普遍的做法。生产小组和生产队的领导由社员自己选举产生。大队的领导机构现在就是革命委员会，其大部分委员是农民，他们能够防止文化大革命以前屡见不鲜的党的干部的独断专行。大队和生产队在公社和国家的总体计划范围之内，实行半自主的管理和资金分配。从理论上

讲，妇女的劳动贡献并不亚于男子，应该有与她们的劳动贡献相应的发言权，但实际上，妇女的意愿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公社生活带给农民的好处，不能完全由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睡得好以及有热水瓶、自行车或些许现款来衡量。如果人民公社带给农民的好处不过如此，那么，在毛泽东和毛的“积极分子”看来，革命就会失败。用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私利的集体劳动，来改变古老中国大地的面貌，这本身就是一种足以产生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的激进观念和实践。

毛曾说过，“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克服私利和为人民服务”，重访保安县，我在陕北贫瘠的山区，看到了最能说明毛的这些格言的例证。1936年我第一次进入保安，那时，这里是长征结束后红军的根据地<sup>①</sup>。毛泽东在一个石窑洞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林彪将军任校长的抗日军政大学也设在窑洞里。内战仍在进行。亲红军的国民党人士带我通过无人地带，然后，我沿着崎岖的山路，翻山过沟，步行3天从延安来到保安。

1945年以后再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保安，1937年毛把他的“首都”迁到了延安，第一次国共内战结束，建立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此后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到过这里。保安位于延安西北120公里，现在已经通了汽车。那时我看到的保安，没有道路，到处是沟壑纵贯的荒山，不发洪水就会干旱，星星点点的土地上种的粮食，还有摇摇欲坠的窑洞。

---

<sup>①</sup> 见 *Red Star Over China*, op. cit.。

为数不多的农民衣衫褴褛，他们的孩子没有人管教，赤身裸体地跑来跑去。食盐、缝衣用的针和线还有火柴，都是非常稀罕的东西。年景好的时候，他们刚刚能够果腹，年景不好就要挨饿。把这里作为庇护地的游击队，不得不在战争的间隙开垦被弃耕的土地和荒地，自己种庄稼——这便是改变面貌的开端。

农村的潜力（种植谷物、小米、果树，饲养牲畜），总比人们最初的感观要大。这种潜力有一部分现在已被挖掘出来了。重新披上了绿装的荒山和峡谷，常常美丽得动人心魄。

这条公路，是为通行载重车、越野车和马车而修建的，是通往内蒙古的公路网的组成部分。我们乘坐的汽车经过之处，附近的人都会向我们招手致意，我们的汽车驶过时，宁静的群山会突然响起孩子们“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公路蜿蜒在黄土和不时出现的石头之间，忽而在深深的沟底，忽而冲上险峻的陡壁。不久前，雨水冲毁了多处路段。当地的生产队用有线广播迅速动员了修路的人员，他们只在黄土路基上挖下一两层土，然后用土来加固护路的边墙。

在谷地逐渐开阔时，我们看到开垦土地的成果：山顶被削平了，陡峭的山梁上排列着花园般的梯田，像巨大的台阶，蜿蜒的河道旁筑起新的拦河石坝，两岸栽植的排排杨柳牢牢地控制着河流，护住了新开垦的宝贵谷地。成群的山羊和肥壮的绵羊（有人告诉我，每户3头）在山上吃草。

幸运的是，这里的土地是值得付出辛勤努力的。多少个世纪以来从戈壁沙漠刮来的“黄土”非常肥沃，土层也很厚。在这种坡地上，推土机派不上用场，而且根本没有推土机；这里的一切都是用人们的双手完成的。我了解到，修筑这样一块占地1/3英亩可耕地的梯田，需要担20 000筐土。

我们到达保安大约用了两个小时。我发现这个山沟小城的人口，比1936年我在这一带几个月旅行中任何一个地方（部队除外）的人口都要多。当时，这座衰老县城的居民仅有百余人；现在的人口达到了3000人。当年红军曾用一座小小的祠堂召开群众大会。现在有了一座一千个座位的戏院，戏院的海报表明，正在上演的剧目是样板戏《红灯记》。过去这里根本没有工业；现在有了13个手工工场、一个机器修配厂和一个发电厂。1936年，全县只有一家商店。现在，一条主要街道上排满了小商店。在一家小百货店里，我们看到商品的种类与其他地方的商品一样多，墙上还有一块详细讲解防空知识的墙报。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世平（译音）在新落成的县政府大院欢迎我们，大院坐落在河边，院内建有一些规模不大但整洁的办公楼和招待所。欢迎宴会在露天举行，宴会的食品是，硕大的玉米棒子、可口的红薯、辣味鸡肉和猪肉、陕西风味的大米饭，以及当地各种甘美的水果。我们与干部们和生产这些食品的农民一起享受了这顿美餐。

---

---

## 21. 富人和穷人

保安的垦荒工作与大寨一样艰难。大寨是邻省山西的一个著名大队，现在被誉为全国的榜样。毛泽东说要“学大寨”。经过 25 年极其艰苦的劳作，大寨大队削平了山头，修建了长达数里的蓄水石坝。现在，大寨大队的粮食产量约为每公顷 8 吨。（陈永贵是大寨的农民领导者，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仍参加田间劳动。）

我参观的另一个富裕的大队是沙石峪大队，它位于保定东北 1 000 多公里，离海边不远，它的故事同样令人难忘。从前，这里住着几家缺衣少吃的穷人，他们每年冬天都要到天津或唐山去乞讨，讨够了就回沙石峪。解放后，靠国家提供的少量帮助（用 17 头毛驴起家），这里的 78 户人家，年复一年地挖走山上的沙石，填土造田，植树和耕种。他们在地下深处找到了水，然后顺着地势用石头砌成了蓄水池。

1970 年，沙石峪现在的 127 户农民，在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已成为果园和梯田上，收获了 225 吨粮食和 115 吨苹果、桃、梨、葡萄、枣和核桃。100 个人挑土造田，用了 10 天时间，才在一座山上开出一片 1/6 英亩的耕地。沙石峪用这样的办法现在已经有了 200 多英亩的半水浇地。沙石峪人用打井、挖蓄水池时挖出的各种各样的石板，来铺建整洁的石板路，建造坚固的住房，这些是中国农民的最好住房之一。

再举一个例子，在上海的人民公社里（上海市的辖区包括10个郊区县），我看到一些大队挖地3米，铺设与泵站相连的巨大的水泥管，用以替代地面的水渠。用这样的办法，他们可以增加大约8%的宝贵耕地。这项工程为期3年，利用的是农闲时间，所用的水泥管是大队自制的。他们说，它还可以用作应急的防空洞。

---

---

## 22. 回顾与展望

中国农村的集体化经过了长期有时是流血的斗争，对这个过程的回顾就可以写成一本书。简略地说，革命（胜利）后的发展过程大致为：没收土地并把土地分成不均等的小地块（1950年）；成立互助组（1950—1951年）；成立初级合作社，地契仍为私人持有（1951—1953年）；成立高级合作社，烧毁地契，土地和农具归村集体所有（1955—1957年）；1958年成立公社，公社把若干村庄组合成大队，大队可以兴建小单位无法承办的大型联合工程，如挖水渠、筑路、修水坝，以及开办工厂、学校和医院等。

在集体化发展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富裕的农民，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占农民大多数的贫农和中农的支持下得到抑制。旧时的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思想复活了；以前的地主企图复辟和破坏，遭到了制止，再次冒头，再次被不间断的宣传和有组织的灌输打退。但打退这种反动势力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个人均耕地不到半英亩的国家中，党的领导人能够向破产的农民阐明，要使所有的人不断地收益，只能坚持自力更生的集体劳动积累集体资金，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1959—1962年的“困难时期”，出现了信仰和实践的巨大危机。领导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党的干部，热情有余没有经验，草率行事。在做出调整之前，又遭遇空前恶劣的气候。比

自然灾害更糟糕的是，苏联在 1960 年突然撕毁了 300 多项大型工业和公共工程合同，撤走了全部苏联顾问，甚至带走了零件和工厂图纸，迫使中国自谋出路。

为了应对紧急的情况，党纠正了一些做法，对私人企业做了适度让步。公社领导机构的人员精简了，权力也缩减了，许多基本职责返还给了生产队。完成苏联人在建设过程中撒手不管的工业项目，以及弥补粮食产量的损失，花了 4 年的时间。到 1964 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才达到原定于 1958 年应达到的产量。部分党的干部尝试采用一种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奖励和鼓动副业产品自由买卖的制度，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允许开垦种植粮食和果树的土地归私人所有——这是农村的富裕有产阶级勾结城市特权阶层再次兴起的最后一次机会。

在毛泽东的眼中事情就是这样的。1960 年他作出的反应是，首先在军队，然后在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就是扭转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1966 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爆发时，人民公社里那些推行现在被称之为损公肥私的“刘少奇路线”的干部，基本上都被清洗了。当时，城市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坚定地建立平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斗争已经展开。

文化大革命对农业经济的影响要小于对工业的影响，为了消除城乡差别，大量富有才智、热情和愿意做出贡献的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这使农村社会因此而受益。直到 1970 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才达到 2.4 亿吨，这个数字比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年）确定的 1962 年的指标还低 1000 万吨。此外，中国声称有储备粮 4000 万吨，而这个数字只大致相当于 1960—1970 年的 10 年间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总量。1970 年的粮

食产量为 1950 年产量的两倍，或者说在 20 年间每年的增长约为 5%。1970 年中国粮食产量比 1950 年增加了一倍，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年增长率约为 2%）。

就全国而言，中国的粮食产量平均每公顷只有 2.4 吨，但是每公顷产量达到 8 吨或超过 8 吨的公社并不罕见。浙江和广东两省第一次实现了全省平均产量达每公顷 7.5 吨，远远超过了国外报道的“绿色奇迹”的产量。

今天，中国的粮食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今后的发展将会愈益侧重供出口的“经济作物”，以为农村的工业化和机械化提供资金。由于现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张医生在前文所说，“农村有着广阔的前景”。尽管前面有无数的困难，但这种“前景”已经清晰可见，随着乡村与城市的结合，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将会在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里联合起来，中国将会全力以赴地从事和平建设工作（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直到 2000 年。



## 第 六 编

# 与总理彻夜长谈



---

---

## 23. 周恩来与敞开大门

我与周恩来总理做过两次长谈，谈话中周总理和我讨论了中国某些对外和对内政策问题，以及中国取得的成就。他同意发表几年来对他的最详细的访谈。在一次谈话中，他谈到了中国工业和农业产量的具体数字，这是北京近 10 年来第一次公开的数字。

谈话在人民大会堂一间会客室里展开，拱型屋顶的会客室宽敞、安静。总理像往常一样，文雅、轻松、机敏。陌生人很难猜出，他已经 72 岁，担任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已经 21 年。在第二次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把国家的行政部门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是过去五年中的稳定中枢。

当前的中国扩大了国际外交和贸易的联系，而在取得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它走出了不协调的低谷，恢复了农业和工业的正常生产。考虑到眼下极其深刻的激进动荡，考虑到新的国家领导机构的重建尚未完成，听到总理说基础经济受到的损失并不很大，确实令人感到吃惊。他坦率地承认，“工厂里的斗争、交通中断和工作时间的损失，确实造成了 1967 年和 1968 年工业生产的下降。”他并没有低估过去的困难，他说：“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的所得（领导层的纯洁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所失。”

总理说，尽管 1967 和 1968 年的生产下降了。但是，

1966—1970年的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基本上达到了，有些指标甚至大大超过了。我请总理估计一下1970年的工业生产总产值。“大约900亿美元，”他回答说，“这个数字只包括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不包括商业和服务业。”

关于农业，总理说，“由于刘少奇的干扰”，在50年代后期犯了些错误，另外在1959—1962年的“困难时期”采取调整措施时也犯了一些错误。“现在，我们的农业持续发展已经有九年了。”

他继续说：“197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超过2.4亿吨。此外，中国现在已经积累了大约4000万吨国家储备粮。”西方经济学家把粮食产量看作是中国农业状况的指标。直到最近，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1957年是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当年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8亿吨。此后，1958年的“浮夸”极大地扭曲了中国统计数字的可信性。从那时起，很少有人敢于作出负责的估计。因此总理的说法是非常有意义的。

“既然有盈余，为什么中国还要从国外进口小麦呢？”

虽然中国1970年的粮食进口量已下降到不足其总产量的1%，总理还是解释了需要从国外进口数量有限的小麦的理由。在中国，进口小麦比大米便宜。中国把价格比较便宜的小麦用做国内消费或储备，而出口大米则要兼顾各方面的情况，例如向古巴和锡兰出口大米，可以换回糖和橡胶，大米也可用于对非洲的贸易。中国还要援助越南和其他国家，也要出口几百万吨大米。

周总理说，目前化肥的产量是大约1400吨，大大高于日本的产量。国内农业的需求量是3000—3500万吨，这也是中国新的五年计划中最后一年，即1975年的目标，“3000万吨

化肥可能大致够用了，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化肥，因为不仅粮食作物需要化肥，经济作物也需要肥料。我们的磷酸盐和尿素还不够；我们的化肥厂主要生产硫酸氨。小化肥厂的作用非常大。通过建造这种小型化肥厂，我们已经大步踏上了自给自足的道路。”

总理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棉花、棉纱和棉布最大的生产国家。1970年，中国生产的棉布达85亿米。

他说，1967和1968年的革命斗争也影响到了钢的产量。过去5年的平均钢产量为1000万—1800万吨之间。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正在提高和现代化，1971年可能会出现迅速的增长。

1970年，石油产量已经超过2000万吨，就中国的需求而言，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许多新油田已被发现。铁路里程和复线大大增加了。在中国西南地区，一个艰巨铁路工程已经竣工，这条新铺就的铁路把中越边界同中亚的新疆连接起来。

总理说，1970年的农业产值约为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总产值的25%。根据这一比例计算，中国1970年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的总产值约为1200亿美元。但是，由于没有可靠的指数，所以无法把中国的“产值”换算成西方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产值”概念不计或少计重要的“服务业产值”，如租金、农村地区的私有住房（现在增加的数目以百万计，都是相互帮工建成的），以及由军队和义务劳动修建的各种水利工程。还有遍布全国城乡的防空工程，它们基本上是由不付报酬的义务劳动建成的。如果在其他国家，这个防空工程需花费几十亿美元。最后，在过去的10年里，农民们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劳动，开垦出了3000万英亩可耕地，而

成本几乎就是农民们消耗的粮食，那么，怎样把这 3 000 万英亩边际土地的价值计入国民生产总值呢？

中国的产值数是按价值不变的人民币计算的。1953 年以来，它同美元的汇率固定在 2.40 人民币元合 1 美元。直到现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国内物价始终保持稳定，许多商品还降了价，低工资者购买力的提高超过了现金的增加。总理自豪地指出，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没有个人所得税，基本的必需消费品普遍比较便宜，食品的价格便宜得令人惊讶。现在中国的商品品种繁多，数量充足，这是任何访问中国的人都可以亲眼看见的。

如果考虑到这种种无法估量的因素，人们可以尝试着为中国估算出一个假设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个估算的数字与一般设想的数字相比，肯定更接近各西欧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是，一个无法质疑的事实是，就人均收入而言，中国仍然属于贫困的国家，中国的人口众多，虽然采取了大规模的节育措施，她的人口已经接近 8 亿。

谈话转向国内政治后，总理谈到了一些他认为是国外误传的情况。国外一度广为报道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共产党被解散了，但事实是党员只是暂时停止了活动。总理说，被开除的党员不到 1%。当然，高层领导的梯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例如，在 1969 年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绝大部分前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被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新干部所取代。不过按照周的说法，大多数未能再次当选的人并没有被开除出党，他们只是下放到农村去“锻炼自己”。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重建。农代会、工代会、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正在

选派出席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目的是制定一部新宪法，以确定新的国家的性质、今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形式，以及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sup>①</sup>。

总理说，农村人民公社连年丰收，工业得到恢复并在新技术方面取得进步，政府和党在文化革命期间没有解体和陷入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忠于毛泽东的教导和领导。新宪法对这个事实将有明确的认定。新宪法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新宪法还将“公开宣告”，无产阶级的国家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周说，宪法还将保障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创造的新形式：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总理补充说，宪法也要保障罢工的权利。

有一个问题总理希望人们能有清楚的了解。外国的报纸极大地曲解了军队的作用，说军队控制着党和政府。周总理说，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对那些想要分析党的领导权的人来说，这一点将来会更加清楚。

在与周总理和其他官员各次谈话的间隔中，我和妻子在长城南北，重访了一些旧地，考察了一些新的地方。我们会见了很多人，他们有的在农村公社工作，有的在地方工业中工作（城镇公社和重新办起来的街道工厂），有的在与学校挂勾合作的现代化的大工业企业工作，有的在正搞教学改革和招生办法试验的大学工作。我们参观了现代外科手术同针刺结合起来的医院，那儿正在训练叫做赤脚医生的农村医务人员。我们在一

---

① 到1972年上半年止，国家宪法的草案尚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个公社见到了一个正在进行全家打靶训练的家庭，最小的孩子只有6岁。我们见到了在稻田里劳动的教师、演员和高级官员，他们都说喜欢这种劳动。我们还观看了电工在22万伏高压线上表演高空带电作业，陪同观看的人中，有中国最大的钢铁厂的厂长，和一个拥有百万人口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我们发现，周总理对我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观感很感兴趣，也很想了解有关美国的最新消息。我是第一个为西方出版物重返中国收集材料的美国作家，这件事本身或许就赋予这些谈话以重要意义。近20年来，美国对台湾和岛上的被打败了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武装保护，仍然是重新打开中美人民之间被长期封闭的交往通道的主要障碍。

总理回顾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的新形势，这种新形势的特点，就是中国扩大了与外国的贸易和外交联系，自从加拿大和意大利承认中国以来，这种联系的扩大尤其明显。人民共和国内的人们不是感到意外而是相信，持续的外交突破，包括联合国关于中国席位问题投票情况的变化，将越来越使台湾政权陷于孤立，使美国和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在国际社会中日益陷于孤立的境地。总理说，现在“厌弃”正在成为普遍的现象，已遍及各大洲。即使在西欧，仍然与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国家，也剩不下几个了，加拿大和意大利承认中国，终结了关于“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等安排可行性的幻想。

“如果联合国的投票结果支持恢复人民共和国在安理会中的席位，中国会作出什么反应？”周总理回答说：“蒋介石集团完全被赶出联合国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当然会考虑这个问题。联合国的前途很难预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组织上）发生变化；另一种可能是重蹈国际联盟的命运。联合国第

二十五届大会清楚地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甚至某些大国，都反对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反对它们更经常采取的做法：绕过联合国玩弄强权政治，划分势力范围，甚至在公海和太空进行竞争。”

在世界的这一地区，中国仍然受到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周继续说，在北面和西面，大约有 100 万陆海空军以及火箭部队；在东面，有美国和它的正在军国主义化盟友日本，而台湾则是深入东南亚的跳板。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所以美国侵占台湾是中美分歧的关键；中美分歧已导致了印度支那战争，中国在那里现已张开了保护伞，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联合抗美。总理回顾了 1960 和 1964 年他曾向我谈过的解决台湾问题和中美建交的条件<sup>①</sup>。他说，这些条件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中国的要求是：第一，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第二，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中美两国仍应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只有中国人民有权解放台湾。美国在那个地区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对此进行谈判。”周总理说。“门是敞开着，但是这完全要看美国是否打算认真解决台湾问题。”他对美国人民表示了友好的感情。他表示愿意考虑“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中国的朋友”的访华要求。

---

<sup>①</sup> 关于 1964 年的谈话，见附录“与周恩来的谈话”；关于 1960 年的谈话见《今日红色中国》。

周恩来接着就一年多来的中苏边界谈判目前的症结所在阐明了中国方面的看法。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曾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即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双方应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一项协议。据周总理说，“有争议地区”就是根据9世纪中俄边界条约双方地图上所画的边界线互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说，这些地区，他们说是属于他们的，而我们说是属于我们的。这种争议只有就临时性措施达成一项协议才能解决，这样就可根据在平等的基础上互谅、互让和协商的原则加以调整。这实在是应该不难解决的。”

实际上，好像俄国人已经简单地拒绝了就从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达成协议，而这一地区两国边界线互相交错，就像两把叉子相互叉在一起那样。

我问总理，60年代初中国曾呼吁召开禁止制造和使用核武器和全部销毁核武器的首脑会议，现在他是否要重申中国的这一呼吁。

“让我先讲清楚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回答说，“首先，我们的核武器还在试验阶段，每次试验都是有限的，而且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我们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核讹诈，制止核战争。所以，每当我们进行一次试验时，我们都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决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同时又建议，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在一起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达成一个全面和全部销毁核武器的协定，而作为第一步，可以先达成一个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最近，我们在进行一次试验（1970年10月14日）之后，日本社会党表示支持我们的立场

和我们的建议。”

超级大国的“所谓限制核武器”的会谈，他说，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持它们的核垄断罢了。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想“限制”对方，以便保持自己的优势。美国和苏联的确都想“限制”一下维持它们的核垄断所需要的费用，但是尽管它们在进行谈判，这种费用却继续大量增加。至于它们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他说，“我们不是它们的参谋长！”“不要对这类裁军抱任何幻想。25年来，它们一直在扩军，从来就没有什么裁军。”

谈到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周总理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各个国家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他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新的世界大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总理说，毛主席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声明，预见到美国革命的前景。的确，只要你同中国一些负责的领导人进行深入的交谈，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瓦解的种种迹象深为关注。然而，毛主席显然不会期望美国的革命很早就发生。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寻求建立在这种推测之上。中国所要坚持的政策是更加有限制的。它不仅要求美军从亚洲和台湾撤走，而且要求所有外国军队“都从它们占领的地方撤回本国去。这样，各国人民就能享有在不受外来威胁和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利。”

我在中国访问将近6个月以后的个人印象是，恢复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在对外方面，中国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重建和扩大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中国并不想成为超级核大国，而是要发展可依靠的遏制力量，同时

与中小国家合作，寻求结束超级大国对世界事务的独霸、操纵。但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的奋战从来没有进行得像现在这样好，它准备通过履行它的支持河内和同北越结成联盟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义务，来挫败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和政治企图。

## 第七编

# 与主席共进早餐



---

---

## 24. 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毛泽东强调，他不喜欢接受采访，我们之间进行的是一次谈话。但是，我后来证实，他不反对在不直接引用原话的情况下发表他的某些看法。我们1970年12月10日的谈话，大部分时间由唐闻生记录，唐闻生出生在美国，是唐明照的女儿（唐先生1949年以前任纽约《美洲华侨日报》的编辑，此后在中国任职，是对外文化和政治关系方面的领导）。在座的还有另一个人——一位中国的女秘书。有意思的是，两位年轻的女性都没有佩带毛的像章：这是仅有的一次我会见官员却没有看到佩带毛的像章。

会见后我立即根据回忆把这次谈话记录下来，后来也得到了一份唐女士记录的副本。

毛主席在北京的住所，位于红墙环绕的老紫禁城外的西南角，距10月1日国庆节毛主席检阅游行队伍的天安门不远。黄色琉璃瓦顶的高墙背后，曾是旧时帝国政权官员的官邸。今天，政治局委员们也在这里居住和工作，他们的住所就在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住所附近。进毛的紫禁城走的是西门，门的两侧各有一个武装警卫。在空无一人的林荫道上绕行了一段路程，很快就来到了一座中等规模的中国式平房前。

两位没有佩带武器的军官迎候在门前，他们都没有佩带表示身份的标记。“他们是将军”，唐闻生说。她怎么知道的呢？

主席迎出书房门口的时候，他们就走开了。我对让毛主席等候表示了歉意。我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事先没有通知。

那是在清晨。我们一起吃的早餐，谈话则持续到中午一点左右。他感冒了，身体有点不舒服，他大声地说，不晓得医生有什么用：他们连感冒这样的小病都不能预防，这会损失很多时间。我提到莱纳斯·波林医生（主席知道这位医生），和他的用大剂量维生素 C 治疗感冒的主张。我提出给主席寄一点来。他说他会试试。如果有效，功劳是我的。如果他中了毒，也不会责备我。

毛的书房宽宽大大，四面摆满了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大量的中文书，也稀稀落落摆放着一些外文书。许多书中夹着写有注释的纸条，用来作为书签。大大的写字桌上高高地堆放着报刊和手稿。这是一间正在进行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透过宽大的窗户，可以看见庭院里的景致，据说主席在庭院里自己种菜，自己种粮。这个庭院不是“自留地”，它属于国家。主席可能也需要有所收获，因为据说他最近把自己维持生计的“工资”削减了 20%。

我们谈到了我对我们上一次谈话，也就是 1965 年 1 月谈话所做的报道<sup>①</sup>。在那篇报道中，我说过他承认中国确实有“个人崇拜”——而且还有点道理。有些人因为我做了这样的报道曾经批评过我。

他说，我写了中国有“个人崇拜”有什么要紧呢？有这样一回事嘛。为什么就不能写呢？它是事实嘛……那些反对我在 1967 年和 1968 年重访中国的官员，属于一个极左集团，他们

---

<sup>①</sup> 谈话全文，见附录“山南海北”。

曾一度夺了外交部的权，但是他们早就被全部清除了。毛继续说，1965年我们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尤其是北京市委的权）他都管不了了。这就是他那时说需要有点个人崇拜的原因，他的目的就是鼓动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内官僚机构。

当然个人崇拜搞过火了。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要人们克服3000年的崇拜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所谓的“四个伟大”（赞颂毛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

我说：“我有时不知道那些喊拥护毛的口号最响，挥舞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点了点头，说，这些人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喊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我说：“听说在你1949年进北京之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据说是根据您的建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他说，是的，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出现了其他形式的崇拜。搞那么多的标语、画像和石膏像。红卫兵坚持那样做，你不搞啊，就是反毛。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但是，他接着说，难道说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

吗？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总要有人受崇拜，也总要有人崇拜别人嘛。他问我，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对这种关于神与上帝的现象——人需要崇拜，也需要崇拜人，毛主席显然考虑过很多。在前几次访问中，他曾详细谈过这个问题。他现在 76 岁，一般而言健康良好，但他再一次说到，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这是必然的规律，每个人终归都得去见上帝。

“伏尔泰说过，如果没有上帝，人类就需要造一个，”我说。“在那个时代，如果他表明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就可能掉脑袋。”

毛同意说，许多人没有说这么多就掉了脑袋。

“从那以后，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我说。“人们已经能够在许多事情上改变上帝的观点了。其中的一件便是节制生育；在这个问题上，与 5 年或 10 年前相比，中国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

不，他说。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就想要个男孩子。头几个是女孩，她还想再生。……这种态度必须改变。但要有个时间才能改。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

“中国在这方面走在前面了”，我说。“不过，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在产生一些影响。美国妇女是最先获得选举权的，她们现在正在学习如何行使这个权利。”

谈到这里时，我们被送进房内的几杯茅台酒打断了，茅台酒是贵州省酿制的一种烈性酒。我们举杯祝酒。主席注意到我忘了向在座的女士们祝酒，这让我感到很是难堪。我怎么能这

样做呢，我仍然没有平等地对待妇女。

主席说，男女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但是，不分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和平等的。他说，他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

如果苏联不行（用手指了一下），他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工业生产已经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文化普及。他将乐于看见美国出现一个党来领导革命，尽管他并不期望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出现。

他同时还说，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人中的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该欢迎他来，毛解释说，因为目前中美两国的问题必须跟尼克松解决。毛将愿意他谈，他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

令人遗憾的是，他说，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你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吗？为什么还要这样僵持着？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尼克松什么事？这个问题是杜鲁门和艾奇逊搞的。

这里可以谈一点相关的情况（这不是我与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已经知道，某些中间人正在向中国政府传递华盛顿的信息。这样的一种沟通的用意，是想要中国领导人明了尼克松先生对亚洲的“新看法”。据说，尼克松坚定地决定，尽快从越南撤出，谋求通过谈判使东南亚的独立获得国际保障，通过使台湾问题明朗化来终止中美关系的僵局，使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有两位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位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位是戴高乐政府的总理莫里斯·顾

夫·德姆维尔。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今年访华做好了安排。我从权威方面获悉，尼克松先生谋求同中国真正缓和的意图，最早就是向戴高乐将军透露的。有些人曾预料，戴高乐访华将对促成中美认真会谈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的逝世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主席向戴高乐夫人发去了唁电，对戴高乐将军表示敬意，自罗斯福逝世以来，他对非共产党政治家的称颂，为人所知的这是仅有的一次。

与此同时，其他的外交官也在活动。一位曾经会晤过尼克松总统的欧洲某国驻北京使团的大使，去年12月再次前往华盛顿。他绕过国务院直接与白宫会谈，然后于1月返回中国。我在2月间离开北京前不久，曾从另一位绝对可靠的外交人士处获悉，白宫再次传递了一个信息，询问如果总统派一位私人代表与中国最高级领导人会谈，他在中国的首都将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大约在同时，一位中国高级外交官令人不解地告诉我：“尼克松正在从越南脱身”，以前他的看法可是恰恰相反。

我必须再次强调，上面所说的背景情况，都不是毛泽东向我提供的。

在谈话中，主席再次向我追述，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教会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正是由于他们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进行战斗，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

我提到几天前西哈努克亲王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最好的代理人。他越是轰炸柬埔寨，他造就的共产党人就越多。他是柬埔寨最好的军火输送者。”毛同意说，是的，他喜欢那样的帮助。

我提醒他说，两个月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游行时，他曾对我说，他“不满意目前的状况”。我请他解释他那番话的

意思。

他回答说，文化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毛说，这就是讲假话。后来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来用步枪、迫击炮。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主席不高兴的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虏”——即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解放军的老办法（释放俘虏，发路费回家，这使许多敌方兵士受到感化，自愿参加他们的队伍）常常被忽视了。虐待俘虏现在已经拖了党的重建和改造的后腿。

毛最后说，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俄国是不是怕中国？”我问。

有些人说怕，他回答说，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毛伸出他的小手指），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他伸出大拇指）。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他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一个小手指怎么能够对付两个大拇指呢？

“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听说是有点怕，他回答说。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但如果中国人钻进防空洞，他们怎么能够打别人呢？

至于意识形态问题，是谁打的第一枪呢？苏联人叫中国人教条主义，后来中国人叫苏联人修正主义。中国发表了苏联人的批评文章，但是苏联人不敢发表中国的批评文章。他们先后

请来古巴人和罗马尼亚人要求中国人停止公开论战。毛说不行，如果必要，要争论 10 000 年。后来柯西金亲自来了。毛在会谈后对他说，他将减少 1 000 年，但不能再减了。

他说，苏联人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他们不信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尽管中苏的意识形态分歧现在是不可调和的（如它们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的对立政策所表明的那样）但它们最终可以解决国家间的问题。

毛主席再次提到美国的时候说，中国要学美国的分权的发展办法，把责任和财富分到 50 个州去。中央政府不要包办。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统统抓在他手里是不行的（他把两手一摊）。

当他礼貌地送我出门时，他说他这个人不复杂，实际上简单得很。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四方的孤僧\*。

通过这次和其他几次非正式的谈话，我相信，在今后的中美会谈中，毛主席一定会坚持他们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指导着中国的对外政策，指导着中国的意识形态，指导着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和中国的地区政策。另一方面，我也相信，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中国将谋求与所有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中所有友好人士进行合作，他们欢迎中国充分参与世界事务。

\* 毛泽东的话是一句歇后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斯诺的理解似有误——译注。

## 第八编

# 尼克松要去紫禁城



---

---

## 25. 强势地位

关于尼克松总统为什么要谋求和接受去访问北京的邀请，许多人已经做了解说和推测，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作出回应呢？尼克松早年是靠政治迫害发家的，而且是在把中国出卖给苏联的“国务院姑息分子”支持下爬上参议员和副总统职位的，北京把这一切都忘记了吗？毛泽东知道美国在越南的冒险造成了一片片的废墟，深信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陷于了内外交困的境地，那么刚刚平安地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内部清洗的他，为什么要接受这支迟迟递过来的橄榄枝呢？如果尼克松去中国不仅仅是为了吃鱼翅，那么他的主人会给他准备什么样的小菜呢？他的主人期望的回报又是什么呢？

关于尼克松的问题，本书已在前文引用毛主席的谈话作了部分解答<sup>①</sup>。他告诉我，欢迎尼克松来，只是因为尼克松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必须跟他解决。按照他的辩证思想模式，毛经常说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坏人能够变成好人（通过经验和正确的教导）。他对我说，是的，他喜欢尼克松这种人，不喜欢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那些人说的是一回事，当权以后做的又是另一回事。

尼克松可能有欺骗性，他继续说，但比较的少一点。尼克

---

<sup>①</sup> 见第24章“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松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是的，尼克松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如果他愿意来，主席愿意和他谈。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尼克松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认为他不会跟尼克松吵架。但是，批评是要批评尼克松的。主人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他们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比如，他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

自1965年1月以来，发生了什么情况，让毛改变了想法呢？那时我曾问主席，有没有可以由我带给约翰逊总统的信息，他的回答是“没有”，就再未说什么了。即使这样，毛那时候说，越南冲突的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召开一次新的日内瓦会议，以结束战争和保证印度支那的独立<sup>①</sup>。这个信息传到了美国的国务院，但是约翰逊轰炸越南北方，这种“选择”几乎立即被排除了。

在1965年的那次会见中，毛说得非常清楚，他料到美国人在知道前景艰难，即他们无法用军事暴力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给革命的越南之前，是不会罢手的。

中国人认为，是越南给了美国以教训，而不是换了总统，使毛在1970年对尼克松有了不同的看法。“经验”使尼克松变得比较“好”了。使他们改变看法的，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变化：美国国内的反战抵抗运动；在北京单方支持下，河内、越共、柬埔寨和老挝的抵抗力量结成了联盟。中国自身的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其中就包括核导弹和运载能力的实实在在的发展。

---

<sup>①</sup> 那次谈话的全文，见附录“山南海北”。

中国人认为，在理论上，尼克松有多条路可以选择，而且确实在一段时间里把它们用做威胁的手段（如在柬埔寨和老挝）。但是，终点接近了。撤出越南的决定一旦做出，美国显然迫切需要与中国达成谅解。总统不仅要保卫自己的后方，防止可能出现的北越在北京支持下发动进攻造成的破坏，还要应对撤军在国内和世界产生的政治反响。

这就是1970年我在天安门上获知的总的看法，但是，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工作仍然在继续（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

1969年的夏季，尼克松政府曾经公开主张缓和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同一年的下半年，它停止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当然中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尼克松政府还建议，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和地点恢复被中止的华沙会谈。1970年1月，中美预备性会谈在华沙举行。入侵柬埔寨事件发生后，会谈被立即中止。但是尼克松在向前走，他逐步地取消了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解除了两国间旅行的禁令。早在当年的春天，总统领导下的一个委员会主张，联合国应该有中国大陆一个席位，并第一次把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的领导人仍然持怀疑的态度——特别是怀疑莫斯科和华盛顿玩弄欺骗的把戏。

1970年秋末，中国收到了几次以可靠的文件形式发出的紧急问讯，问讯的内容是，总统希望知道他或他的代表去北京是否会受到接待。周恩来11月与我的谈话，给出了一个间接的答案，当时他说，只有在美国人表明“认真”谈判的愿望时，中美对话才可以开始<sup>①</sup>。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认真”首先意味着以现实的态度制定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案。毛和周认

---

<sup>①</sup> 见第153页。

为，这是解决所有其他亚洲问题的关键。显然，充分的保证即将出现。1970年10月1日，在检阅国庆游行队伍的时候，周恩来把我的妻子和我带到毛的身边，并为我们拍了照片，从来没有一个美国人受到过这样的注意。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一件新事正在发生。随后，出现了乒乓姿态。12月，毛主席同我谈了话，乒乓姿态出现后，我也可以报道他欢迎尼克松先生或他的代表到北京去了。新的局面已然出现。

我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报道我与主席的谈话的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的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中广泛传阅。因此，他们不会对北京与华盛顿的联合公报感到惊讶。尽管报纸的报道只有几行文字，但毫无疑问，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情况都经过了慎重的讨论，并会向下传达到公社一级。让中国人感到惊讶的只有一件事：基辛格先生信守了他访华的秘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美国外交官交往的经验告诉中国的领导人，美国人是不能保守秘密的。

当然，中国人非常清楚，尼克松先生的计划，不仅会产生国际影响，还会在国内产生影响，并为他目前和将来的政治生涯带来额外的好处。在讨论尼克松访华可能性的时候，主席随口谈到，总统大选是不是在1972年？所以，他又说了一句，1972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

到1970年，中国度过了大清洗的磨难，丧失了大量国内建设的时间，为了结束中国的孤立地位，必须对国际关系做多方调整或重建。内部紧张的时期已经基本结束。现在，有了收复台湾的机会（毛的最后一个目标，即全国统一），有了使中国被接纳为平等一员的机会，有了使中国的巨大领土、成就和潜力得到承认的机会，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呢？毛的思想和

教导中，从来没有发动针对美国或征服外国战争的内容，毛的思想中根本没有原子弹的地位。制造原子弹和建设用于反击的发射井，确实是非常沉重的负担，而且可能是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中国一再呼吁彻底销毁核武器。

中国之所以关心中美和解，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改善她与苏联打交道的战略地位。美国撤出亚洲大陆，美苏勾结的危险就会消除，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北京的权力地位就会得到明显的加强。

那么，中国准备从强势地位而不是弱势地位进行会谈，基辛格先生理解吗？中国的领导人尊重基辛格。他们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和基辛格的作品对他有了了解。在北京的一天晚上，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周总理的一位亲密战友，与我谈到了基辛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坦率地表示，即将与这样一位可敬的对手举行谈判，让他感到很高兴。“基辛格？”他说，“他这个人懂得两个世界的语言——他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他是我们见过的担任他那种职位的第一个美国人。与他谈判应该谈得拢。”

周与基辛格在会谈中讨论的问题（以及总统的会谈议程），都是当时非常具体的问题，而且对双方来说，都不是新问题。中国人认为，解决方案要涉及对尼克松而言是转折性的决定：

1.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主权；
2. 美国从越南完全撤军，安排一次国际会议以保证印度支那的独立，谈判解决河内与西贡的和解问题，其中包括至少在10年内维持某些美国式政体的框架；
3. 中国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谈判草稿，必须送交尼克松，以使他能够接受周总理的邀请。

只要美国领导人愿意，中国一直准备随时就解决台湾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一再阐明，解决台湾问题需要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中国和美国共同宣布，中美两国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间的一切争端，包括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第二步，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武装力量。关于如何撤出和何时撤出的具体安排，是随后讨论的问题。

中国认为，中国与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争端是国际问题，中国与蒋介石之间中断的内战严格地说是内政的问题。只要美国原则上同意撤出台湾，许多条件就必须加以限定。北京可能会通情达理地处理美国撤出的程序问题和台湾本身的问题——如果蒋介石愿意终生统治台湾，甚至可能会给予他某种自治。

中国不会公开放弃在必要时采取武力收复台湾主权的权利。但是，现在存在着由中国人自己，也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制定非军事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中美开始举行认真的会谈，可能已经使台湾和北京重开寻求可能的统一条件的秘密会谈。毫无疑问，这是尼克松的希望之一。毛泽东曾告诉我，他的目标是和平统一台湾——他提醒我说，在中国内战时期，有几个省的解放就没有经过战斗。

但是，解决台湾问题，显然不能与在越南达成停火协议和从越南撤军分开，而且，也不能等到解决完台湾问题后再解决越南的问题。只有从越南撤出所有外国军队，才能使北京的河内盟友感到满意，因为河内已经向北京提出抗议，并警告北京不要向尼克松出卖越南。北京不能允许苏联利用这种本质上的分歧，而且，基辛格也清楚地知道，没有河内和越南南方民族

统一战线的充分支持，北京将无法促成任何日内瓦会议的解决方案。

these 问题是区域性问 题，但是要达成东亚和大太平洋地区的缓和，这些问 题是必须先行解决的问题。本书的主旨不是说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抱负，但是这些抱负中显然包括（为了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继续支持革命的斗争。

总统此次访问北京，将进入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的实际首脑并不担任行政职务。尼克松肯定会会见党的主席，但大部分谈判很有可能由周进行。

总统将会见的周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显然是世界上最富有谈判才能的人之一，他相貌俊美，浑身散发着非凡的魅力，他已经 73 岁了，但仍然不知疲倦。1967 年 8 月，周通过谈判度过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危险的时刻。尽管年轻人崇拜他，但他仍被 50 万名极左的红卫兵围困在他的设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达两天两夜。这些红卫兵的头头（其中的一些人后来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并予以逮捕）企图抢夺中央委员会和周本人的档案材料。毛和林彪都不在。通过不分昼夜的谈话，周逐渐说服群众（周与我谈话时，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散去了。也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林彪调集了数千军队进入北京，开始认真地解除红卫兵的武装和解散红卫兵的组织——付出了重大的伤亡。

据说，基辛格在北京的 49 个小时，有 20 个小时是同周总理会谈。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有一次我与他的谈话，从晚餐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的 6 点。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他看起来仍然精力充沛。我话语含混地说，“我必须让你睡会儿觉了。”

“我已经睡过了，”他仰起头笑着说，“现在我要去工作了。”晚餐前小睡一刻就是他晚上的休息了。

周告诉我，他10年间只休过一次假，那时，他生病了，休了一个星期的假。

总理热心于贯彻国家和革命政策的政策，总是小心地避免彰显个人的权力。他的举止和蔼可亲，但他的内心熔铸着坚强和灵活；他善于贯彻政策，有深入细节的无限能力。他处理的事务难以计数。他可以把难以调和的事必躬亲与行政效率结合在一起。他的甘愿埋没自己的献身精神，使他成为毛的不可或缺的战友。

描述他们两人关系的最恰当的词语可能是共生。他们的工作风格和个性迥然不同，但毛和周有着37年相互信任和依赖的经历，他们可以相互协调，就像拉着同一辆车的两匹马一样。周从来没有当过旧时的官吏，但他的祖父曾在前朝为官，他承认自己有封建的背景，尽管他曾在农村地区打过20年的游击。毛是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天才的知识分子，周已经习惯于听从毛对人民的理解，无论是直觉的还是得自于经验的。

毛是一位活动家，是始动者，是创始者，他是一位战略家，他张弛有度，常有令人意外之举。他不信任长期的稳定，从来不满足于变化的速度，但他又很实际，而且能够为逐步实现目标付出巨大的耐心。

周喜欢周密地落实计划（这是毛感到厌烦的事），问题越复杂越好。周能够迅速抓住事物的本质，抛弃不切实际的东西，必要时还可以视而不见，而且决不会冒险行事——如果没有十足把握的话。革命趋于稳定的时候，周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他不是诗人，而是一个建设者。

我与这两位中国的伟人谈话时，周总是细心地回答主要的问题，毛则总是在听的时候，不时加上几句告诫，或是对宽泛的辩证法观点做出解释和说明。周要出席数不清的大型宴会，显然他也乐于出席宴会。毛厌恶大型宴会，喜欢小规模的小聚会。周是美食家，但吃得很节俭，毛喜欢简单的辣味湖南菜。毛与周都不太喝酒，而且喝酒时也都非常有节制。在与尼克松总统谈判时，周善于与幕后的毛密切配合，承担实际的谈判工作。但是，最后的决定将由毛泽东作出。

无论中国人怎样看尼克松的动机，他能顾及毛泽东的威望和全体人民的自尊，折节往访，这已经使他获得了某种赞许。过去，属国的君主都是带着贡物去北京的，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脑以前却从未这样做过。这种姿态本身，就非常有帮助于缓解过去20年来积累起来的怨恨和愤懑。这种姿态有被误解为对美国不利的风险，但是，它更可能被欣然接受，更有可能增加双方和解的可能性。

太平盛世似乎还遥不可及，而眼下的问题是做出最艰难的调整和斗争。中国必须使朝鲜和越南感到满意，而美国则不能抛弃日本。危险在于，美国可能会设想，中国人正在放弃共产主义（以及毛的世界观），成为友善的促进农民利益的民主主义者。更为现实的世界确实已经抬眼可望。但是，如果人们幻想各种意识形态会出现令人满意的融合，幻想中国不再坚持对革命手段的信念，那么，它带给人们的只能是幻想破灭后更加深刻的失望。对于北京来说，一个不通过革命而变革的世界（也就是一个中国最亲密的朋友不再是革命国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一个国家之间保持相对和平的世界，对中国和美国都是必要的。过多的希望，结果将是失望。

---

## 附录一

# 山南海北

### 1965年1月9日与毛泽东主席的谈话

回到中国两个多月后，毛泽东邀请我去吃晚饭，时间定在1965年1月9日，那天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大约4个小时。我是惟一的外国客，有两位中国官员出席作陪，他们都是我在革命（胜利）前就认识的朋友：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我认识龚澎和她的姐姐龚普生时，她们还是基督教会办的燕京大学（现已并入清华大学）的学生。战前我住在北京，曾在燕京大学短期任教。后来，龚澎曾长期担任周恩来的私人秘书，现在是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她的丈夫是外交部副部长<sup>①</sup>。他们两人的英语知识都非常出色。

我没有提交书面问题，也没有做记录。我知道，与1960年我与毛主席的会面一样，谈话是不应该记录的。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后，立即把我能够记得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第二天，我惊喜地得知，只要不直接引用原话，我可以发表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更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可以在龚澎的帮助下检

---

<sup>①</sup> 龚澎1970年因患脑瘤去世，她的同志和无数外国友人深表哀悼。乔冠华于1971年11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首任团长。

查和订正我的记录，龚澎的手边有书面的记录，因此本文的内容应该是基本准确的。

我们的谈话内容广泛，如毛所言，是“山南海北”。谈话是“海阔天空”的，而谈话的某些方面又有其独到之处。当然，毛见过的人，数也数不清，但是他并不经常邀请西方的非共产党人士与他一道用餐。我想，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是第一个可以发表与他的谈话内容的外国人。

我为什么是个例外呢？大概是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被通缉的“赤匪”，还住在陕西的窑洞里。1936年，我还是一个年轻的记者，为了看看蒋介石十余年来试图“剿灭”的是什么样的人，我设法去了中国的西北。我是进入老“红区”的第一个记者，也是第一个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其他领导人的记者。毛那一年43岁，消瘦，身材高于普通的中国人，那次6000英里的从中国南方（经由西藏高原的东部）的大撤退使他更加坚强了。这次大撤退现在以“史诗般的长征”著称于世。许多个夜晚，我坐在他的窑洞里，听他给我讲他个人的经历，讲到那时为止的共产党的革命历史。

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今年72岁的毛，与我在宏伟的人民大会堂一间宽敞的北京厅又见面了。隔着宽阔的广场，人民大会堂与紫禁城的大门——天安门遥遥相望。

我与毛的上一次谈话，是在1960年，那时，中国正处在天灾人祸造成的萧条之中。苏联的技术人员突然撤走，工业设备的供应被中断，300多个重要工程的合同被突然取消。农业连续两年遭遇水旱灾害，粮食作物或是减产或是颗粒无收。在大跃进设定了高不可攀的目标的同时，处在实验阶段的人民公社的正常生产也被打断了。通过严格实行定量供应，才避免

了大规模的饥荒。当时，毛告诉我，他的人民还不能吃饱饭。他预计中国要花 50 年的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到 1965 年的 1 月，情况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连续三年的好收成，不仅使人民填饱了肚子，还积累了一些储备粮和储备肉。各地的商店出售的基本食品和必需消费品，价格低廉。中国向苏联还清了她的最后一笔外债。核装置的爆炸则成为一种有助于恢复共产主义（和爱国）的自信和自尊的重要象征。

毛主席完全可以骄傲地讲述他的“自力更生”的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没有自我夸耀。我发现，他深陷在哲学的思绪中，他在思考他与死亡的约定，他似乎准备把自己的政治遗产留给后人去评价。但是到了第二年，这个老战士充分表露了他还有第二条生命，为了保证他的教导能对青年产生持久的影响，他还有时间去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的谈话，是在每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进行的。全国人大的会议紧张紧张地开了几个星期，会议期间，毛与各省赴京的领导一道夜以继日地出席会议。如果他是一位病人，我们的谈话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我们的谈话六点之后开始，晚饭时也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晚饭后大约两个小时，在谈话的过程中，他自始至终都非常从容。

后来，主席的一位医生告诉我，毛没有器质性的病变，除了他那个年龄的人常有的疲劳外，没有任何疾病。他的晚饭像往常一样，并不丰盛，菜是辣味的湖南菜，饭量适中，还喝了一两杯中国的葡萄酒。那天晚上，他大概吸了十几支烟。

谈话开始时，一位摄影师进来，拍了一个短片。毛说，这是应我的要求安排的。我是提出过谈话全程录像的要求，但没抱太大的希望。我说：“几年前，我请你给我讲一讲你的生活

经历。起初，你不同意。我分辩说，这会有助于让中国人和外国人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工作动力是什么。我想你会同意，发表你的经历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现在，又出现了许多谣言，说你病得很厉害。在电视屏幕上向全世界表明，那是个被大大地夸大的谣言，这样做不好吗？”

毛苦笑着回答说，可能是有一些那样的疑惑。他不久要去见上帝了。

我们1960年的会面，中国的报界没有做报道。1965年，我们谈话的那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和我的大幅照片，照片的说明中，我只是被称作“《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人”。谈话的全文（按要求，只做了一两处删除）第一次发表了。1965年2月17日，经过压缩后的谈话内容首先刊登在巴黎的《新直言报》和东京的《朝日新闻》上，随即，汉堡的《明星》杂志、罗马的《欧罗巴》、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华盛顿特区的《新共和》杂志分别刊登了这次谈话的内容<sup>①</sup>。由于我根据自己的笔记做了一些扩充，并把扩充的内容同龚澎的记录做了核对，所以必须对（以前发表的内容）做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公布这次谈话，并在官方的政府和党的报刊上发表关于这次会面的报道，显然给这次谈话增加了几许分量，使它完全不同于重叙旧谊。而我认为，那可能是毛想以这种方式告诉美国人，中国人是怎样看待战争与和平的，特别是怎样看待越南问题的。

后来，也就是在1970年我重返中国时，几个朋友向我指

---

<sup>①</sup> 美国的各大报，包括《纽约时报》，都拒绝刊登这篇谈话。

出，主席 1960 年的谈话，特别是关于去见上帝的那些话，可能是有意误导那些希望他赶快上路的人。我在国外发表的谈话内容，中国的新闻界从未公开刊载，但是我知道，它已被翻译成中文，而且在党的高层领导中传阅。毛直截了当地说，只要中国的领土没有遭到直接的攻击，中国不会介入越南。毛的这个说法，是一种政策的预告，而这个政策当时可能还没有得到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的完全批准。

### 西藏和神

我说，“上次看到你的时候，中国正经历困难的时期，但现在的情况好得令人印象深刻。你在 1960 年对我说，支持政府的人有 90%，反对政府的人只有 10%。现在的情况怎样呢？”

毛回答说，各地还有一些蒋介石分子，但他们人数不多。许多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更多的人有望改变他们的思想。至于这些人的子女，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总之，可以说 95% 或更多的人，是团结的，是支持社会主义的。

我想到了刚刚被撤消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职务的班禅喇嘛。土地改革即将结束，以前属于喇嘛僧侣集团及其经管者的土地，很快就要集体化了。经过 13 年对受到北京保护的青年和没有土地农奴的灌输，共产党迅速地壮大了，他似乎已经做好了清除古老的僧侣集团残余政治影响的准备。由于毛主义的教师教会了人们识字，使人们掌握了科学和工业的奥秘，僧侣集团的权威现在已经被彻底削弱了。喇嘛教和它供奉的神祇正在被渐渐地淡忘。周恩来总理最近在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召开前宣布，应该给予班禅喇嘛一个“改过自新的最后机会”。

“班禅喇嘛的难题，是不是他与以前农奴头上的封建喇嘛—领主政权之间存在着联系，”我问道，“或者说，你是不是认为他作为宗教领袖的职责与独立于寺庙的新政权之间存在着冲突呢？”

毛回答说，这基本上是一个土地问题，而不是宗教自由的问题。封建领主失去了土地，他们的农奴得到了自由，现在做了主人。班禅喇嘛与过去的特权阶级中的一些“坏蛋”搞到一起，他们不仅阻挠改革，还组织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的某些成员揭发了他们的计划。班禅周围的有些人还不是思想旧得无法改造，他们也可能表现出进步。班禅也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思想。班禅现在仍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现在住在北京，但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回拉萨；回不回拉萨由他自己决定。

至于作为一种宗教的喇嘛教，没有人压迫它真正的信徒，所有的寺庙都是开放的，宗教仪式也在照常举行<sup>①</sup>，但问题在于，活佛们并不总是按照他们的说教行事，他们也远远谈不上对世俗事务不感兴趣。达赖喇嘛本人曾对毛说过，他不相信自己是活佛，尽管如果有人公开说这样的话，达赖会加以否认。基督教的许多牧师和神甫，也不是完全相信他们布讲的教义，但是他们的许多追随者却是真正的信徒。有人说，毛自己从来不信迷信，但情况并非如此。他对我说过，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经常拜佛；年轻时，他与母亲一道，反对过不信佛

<sup>①</sup>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个别寺庙外，所有的寺庙都被关闭了。

的父亲。有一天，他父亲走过一片人际稀少的树林，碰到一只老虎（一只活的老虎，不是纸老虎），他拼命跑回家，给神献上了供品。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他们遇事就求神拜佛，无事则把佛置诸脑后。

“中国还有神吗？”

有，当然有；据我所知，中国人有的不止是一个神，而是许多神。每一样东西都有神：门神、灶神、雨神、山神、慈悲的神，等等。甚至一块石头也能成为神。有几百万人仍然信奉伊斯兰教，几百万人仍然信奉佛教和道教，还有几百万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也有一些人真诚地信奉喇嘛教的神。

“你去没去过西藏呢？”

没有，他从没去过西藏，只是在长征途中路过了西藏的东部边缘。那个时候，他走了很多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他没能看到。例如，他们（国民党人）没让他看到云南府（昆明），让他去了贵州，却没让他看到贵阳（贵州省会）。现在，他可以去云南，但他没有去。他也没有去过新疆。

他记得，他30年前第一次对我说起，他的父亲遇到了一只老虎，他说，那时候第一次与国民党的战争行将结束，他们的状况极为糟糕。然而，纵然人数很少，中国的老红军还是团结和强大的。我见过他们，那时他们的手中只有轻武器。

“还有赤卫队员手中的梭镖。”

是的，甚至还有扫帚柄。胜利或失败从一开始就不是由手中的武器决定的。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必胜的意志和正确的目标。许多因素会发生作用。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武器比过去好了，但决定胜败的仍然是同样的因素。

“那时候，人们想的主要是把中国从日本的手中解放出来。

当然，我那时也没能预见到革命的中国在世界上崛起的全部意义。”

### 美国如何武装革命

主席回忆道，我第一次在保安见到他的时候，他们正在为抗日战争做准备。1937年与蒋介石达成共同抗战的协议后，毛的部队避开与敌军主力作战，集中精力在农村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日本人帮了很大的忙。他们占领了中国东部大片领土，烧毁了许多村庄。他们教育了人民，激起了人民的政治意识。他们创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得以扩充部队和增加自己地域的条件。今天，日本人来见毛并向毛致歉时，毛会感谢他们的帮助。他说，他倒是希望日本人能深入到西安，甚至重庆。如果他们真是这样做了，游击队力量的壮大将会更加迅速。日本的共产党人，甚至日本社会党的左翼和右翼，都认为日本的军阀帮助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支持蒋介石，同样是帮了共产党的忙。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们所依赖的，主要是从蒋介石的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制武器。现在，在越南，解放武装力量也是由美国以同样的方式武装起来的。

蒋总司令一直是他们的“教员”。没有他的教导，毛与他的同志们就不能摆脱右倾机会主义，就不会拿起武器去与他战斗。实际上，是蒋介石和日本军阀直接教会了他们如何战斗。而美国则是他们的间接教员。

“西贡的某些美国评论家，把越共的力量与1947年开始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的人民解放军做了比较。这些情况可以做

相应的比较吗？”

主席认为不能。中国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要解放整个广大的农村。到1947年，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已经超过100万，抗击着蒋介石一方的数百万军队。那时，解放军已经可以用师和集团军的兵力作战，而越南南方解放力量现在只能在营或至多在团的规模上作战。美国在越南的兵力仍然比较少。当然，如果他们增加兵力，他们就会加速武装反对他们的人民。但是，如果我告诉美国领导人，他们正在聚集一场最终将会打败他们的革命运动，他们不会听。他们不会让越南人决定自己的事务。吴庭艳的想法他们听吗？胡志明和毛都认为，吴庭艳还不算太坏。他们希望美国人再多留他几年，但是，急躁的美国将军讨厌吴庭艳，把他搞掉了。总之，把他暗杀了，天地间的万物就更和平了吗？

“现在越共靠自己的努力能够赢得胜利吗？”

能，他说，他认为越共能够赢得胜利。相对而言，他们的情况要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那个时候的中国没有外国的直接干涉，但现在，美国的干涉可以帮助越共武装和教育它的士兵和军官。反对美国的人，现在不仅仅是解放军。吴庭艳不想服从命令，连将军们也都有了这种独立的倾向了。美国教员很成功啊。

我问毛，有些将军是否会很快加入解放军。毛说，是的，有些人最终会仿效向共产党投诚的国民党将军。

### 关于第三世界

“美国对越南、刚果和其他前殖民地的干涉，提出了一个

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看是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新殖民主义与法国人喜欢说的‘第三世界’（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所谓不发达国家、前殖民地国家和现在仍然是殖民地的国家）中的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是否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或者说，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说，关于这个问题，他还没有成型的看法。或许，我可以帮助他？他记得，肯尼迪总统也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肯尼迪不是宣称，美国、加拿大和西欧没有太大的实际的和基本的差异吗？这位总统说，将来真正的问题在南半球。这位已故的总统鼓吹建立“特种部队”和进行适应“地区人民战争”的训练，他可能想过我提出的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过去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他们反对殖民地革命的斗争没有改变他们的性质。那些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吗？如果发生一次大战，难道它的目的就不是为了重新划分控制所谓的不发达国家的势力范围吗？实际上，所谓的发达国家今天并不是那么团结。看看法国就可以明白，戴高乐的政策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坚持不受美国支配的独立；第二是调整法国的政策以适应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的变化。结果是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法国是它所说的“第三世界”的一员吗？关于这个问题，最近，他问过一些来华访问的法国人，他们告诉他，不，法国是发达国家，不可能成为由不发达国家构成的“第三世界”的一员。看来问题还不那么简单。

“那么，能不能说，法国采取的行动是第三世界的行动，但它不是第三世界的成员？”

大概可以吧。肯尼迪总统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还因为这个问题研究过毛关于军事行动的文章（毛说，他看到过这则消息）。毛在阿尔及利亚反法斗争期间，还从阿尔及利亚朋友那里得知，法国人正在读他的著作，用他的知识来对付他们。但在那个时候，毛告诉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德，他的书是根据中国的经验写成的，不能用于相反的目的。它们可以用来开展人民的解放战争，但不能用来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它们不能挽救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失败。蒋介石也研究过共产党的材料，但他也没有逃脱失败的下场。

毛说，中国人也研究美国人的书，但是，如果中国人用它们来打反人民的战争就不好了。例如，他读过一本名为《不确定的号角》的书，作者是美国驻西贡大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泰勒将军的观点是，核武器可能根本用不上，因此，非核武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他赞成发展核武器，但希望优先发展陆军。现在他有了验证他的特殊战争理论的机会了。他是去年6月才到的越南，在越南的时间还比不上朝鲜战争。泰勒将军在越南会获得一些宝贵的经验。

主席还看过一些美国政府下发给部队的关于如何对付游击队的文章。这些指导性的文章，讲述的是游击队的缺陷和军事上的弱点，阐述的是美国获胜的希望。它们忽视了一个决定性的政治因素，这就是，无论是吴庭艳还是别的傀儡，脱离了群众的政府不可能打赢反对解放的战争。帮助这样的政府不会有好下场。但是，美国（政府）不会听他的话，也不会听我的话。

“在东南亚、印度、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都存在着一些与中国革命相似的社会条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

问题，解决的办法也极为不同。但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些地方发生的社会革命可以大量借鉴中国的经验？”

他回答说，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的情感与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结合，产生于压迫和过去的罪恶。哪里有压迫和奴役，哪里就会有革命。但是，在大部分我谈到的国家里，人民追求的只是民族独立，而不是社会主义——那完全是另外的问题。欧洲国家也出现过反封建的革命，但美国没有真正的封建时期。

“美国在南方各州的奴隶制时期，只有过短暂的地区性封建主义时期。一百多年之后，过去的奴隶们仍然在为社会和政治平等而斗争，所以，不能说美国没有封建主义的影响。”

他说，美国首先打了一场进步的独立战争，摆脱了英帝国主义，后来，打了一场内战，建立了自由的劳工市场。华盛顿和林肯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进步人士。美国的联邦刚刚建立的时候，遭到了欧洲所有王室的憎恨和恐惧。这说明那时的美国是革命的。现在，美国人民需要进行摆脱国内垄断资本家统治的斗争。毛问我，我是美国哪个地方的人？

“我出生在中西部的密苏里，地理环境与你的家乡湖南省大致相当。我们那里不出产革命者，不过密苏里出了马克·吐温和哈里·杜鲁门——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密苏里不是蓄奴州，但也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故土，是200年前从印第安人手中夺走的。美国人认为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者，但印第安人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中国没有对少数民族进行过残酷的掠夺。3000多年之后，中国有超过一半的土地仍然属于少数民族，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人口仍然有将近5000万。今天，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怎样呢？”

他说，正在改善。一句话，重要的是，要尊重他们，平等地对待他们。

“我们知道，世界上大约 3/5 的地方属于第三世界，这些地方都存在着非常尖锐的问题。人口增长比率与生产增长比率之间的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利于革命。那里的生活水平与富裕国家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等待苏联去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不发达地区出现议会制度与和平地建立社会主义，需要等上 100 年吗？”

毛认为不会等那么久。

“这个问题不会是与中国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分歧有关吧？”

他表示同意说，是与中苏分歧有关。

“你认为，如果不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有可能既完成了民族独立又完成了现代化建设吗？”

他说，使用“完成”这个词，总会让人停下来想一想。大多数相关的国家与社会主义革命还相距甚远。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共产党，而有些地方则只有修正主义的党。据说，拉丁美洲有大约 20 个共产党；其中的 18 个党还发布了反华的决议。他停顿了一下，说了一句结束这个话题的话：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革命。

### 赫鲁晓夫与个人崇拜

“西方的评论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共产党人，严厉地批评苏联的领导人采用阴谋和不民主的方式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毛没有直接回答问题。他说，即使在倒台前，赫鲁晓夫先

生在中国也不是很得人心，几乎看不到他的画像。但是，在赫鲁晓夫倒台前，书店里有他的书卖，现在仍然有他的书卖，而在苏联却买不到他的书。世界需要赫鲁晓夫；他的幽灵还会游荡。肯定会有人喜欢他。中国会怀念这个反面教员。

“按照你的三七开的标准（即一个人的工作 70% 是正确的，30% 是错误的，则他的工作就是令人满意的），你怎样评价苏联党的现任领导？他们离不及格还差多远？”

毛说，他不想用这样的条件谈论现任的领导人。

“中苏关系有没有改善？”

可能有一些改善，但改善不大。主要的差别在于，没有了赫鲁晓夫，中国就失去了写论战文章的靶子。

我说，“苏联批评说，中国鼓励‘个人崇拜’。这种批评有根据吗？”

毛认为可能有些根据。据说斯大林曾经是个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根本不搞个人崇拜。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中国人有个人崇拜的情感和惯例。这种说法可能有些道理。赫鲁晓夫先生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根本不搞个人崇拜……

“你在中国开展了革命，同时，你也使外国的中国学革命化了，现在出现了毛主义学派和北京学的学派。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次会议，会上教授们在辩论，你是否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会议结束后，我问一位教授，如果能够证明，毛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做出过创造性的贡献，这对他们的争论是否会有影响。那位教授不耐烦地回答，‘当然不会有影响。那与这个问题完全无关。’”

毛放声大笑。他说，两千多年前，庄周写了一篇关于老子的著作（在《庄子》一书中）。于是出现了百家思想流派，辩

论《庄子》的含义。

“1960年，我上一次与你见面时，我曾问你是否写过自传，或有过写自传的想法，你回答说，你没有写过，只是对我谈过关于你的生活的一些情况。但是，有些教授说，他们发现了你写的‘自传’。最近有一个困扰着教授们的问题，你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著名的哲学文章，是如你的《选集》所说写于1937年的夏季，还是写于此后的几年？我似乎记得，1938年夏季曾见过这两篇未出版的文章的译本。你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两篇文章？”

他回答说，他确实是在1937年夏季写的这两篇文章。在卢沟桥事变<sup>①</sup>之前和之后的几个星期，他在延安的生活比较平静。部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为（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的基本哲学课程，搜集了一些资料。为了给将要参加为期3个月学习的年轻学员提供今后几年的政治指导，需要撰写一些简要而基本的教材。在党的一再要求下，毛撰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和日常实例相结合的方式，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毛说，他基本上是晚上写作，白天睡觉。他的文章写了几个星期，课上的讲座大约是两个小时。毛还说，他个人认为，《实践论》是一篇比《矛盾论》更重要的文章。

“有一篇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没有收入你的《选集》中，但西方的毛泽东问题专家认为是你写的<sup>②</sup>。你写

---

① 日本大举侵入中国长城以南的开端，是毛早已预见到的事变；毛准确地预见了这次事变，极大地增进了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望。

② 见 *China Quarterly*, No. 19, July - Sept., 1964, London.

过这样的文章吗？”

毛让我把问题再重复一遍。他回答说，他从来没有写过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他说，如果他写过，他会记得的。

“1927年以后，你一直忙于学习战略和战术。1937年以前，你能有时间读黑格尔的书吗？”

毛说，在那以前，他读过黑格尔的书，还读过恩格斯的书。他补充说（或许，他想到了美国的批评家），他从来没有读过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书。他们的著作中有好书吗？我问他，他年轻的时候是否听说过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有闲阶级的理论》。毛说没有见过这本书，如果它曾被译成中文的话。我提到了另一本书，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那是一本对19世纪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著作，它的预言性写法令人在今天读来仍然饶有趣味。我还提到了当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保罗·斯维济（Paul Sweezy）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毛说，很遗憾，这几本书他都没有读过。

## 原 子 弹

“刚才我们说到了老虎，”我说，“你仍然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他说，那只是一种说法，一种比喻的说法。原子弹当然可以杀人。但是人民最终会摧毁原子弹，那时它就真的成了纸老虎了。

“有人引用你的话说，中国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害怕原子弹，

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其他国家的人民可能被全部消灭，而中国还会留下几亿人，可以重新再来。这种报道有事实根据吗？”

他问道，那个报道认为他是在什么时候，怎样说那些话的？我告诉他，一则消息称，一位南斯拉夫外交官说，毛曾说过，即使欧洲人被全部消灭，中国还会有3亿人活下来。

毛说，他可能谈过这个问题，但他记得不是这样说的。他确实记得，他在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时曾与他有过一次谈话。他记得，他说的是，中国不要战争。他们没有原子弹，但是，如果别的国家要打仗，整个世界就会出现一场灾难，也就是说要死很多人。至于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他说的不止是中国。他不相信一颗原子弹会毁灭整个人类，如果是那样的话，连一个进行和平谈判的政府都找不到了。他在会谈中对尼赫鲁提到过这一点。尼赫鲁说，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他知道原子弹的破坏力。他确信没有人能够活下来。毛说，事情可能不像尼赫鲁说的那样。现在的政府消失了，还会出现别的政府取而代之。

毛说，他听说美国拍了一部电影，叫《海滩上》，影片讲述的是核战争把世界带向末日。那是一部科普电影吗？

“它被称之为科幻电影。”

毛说，不久前，赫鲁晓夫先生曾宣称，他拥有了一种能够杀死所有生物的致命武器。然后他又立即收回他说过的话——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毛不会否认他说过的话，他也不希望我替他否认这种传言（关于核战争中中国有数亿人可以生存下来）。美国对原子弹的毁灭能力有过不少说法，赫鲁晓夫也大肆渲染过原子弹的毁灭能力。在这一方面（夸耀自己的毁灭能力），他们都比他强，所以与他们相比，他是落后的。不是这

样的吗<sup>①</sup>？

但是，最近他看到了一篇调查报告，报告的作者是一些在比基尼岛核试验6年后探访该岛的美国人。1959年以后，研究人员一直生活在比基尼岛。第一次登上该岛的时候，他们必须在林间的草丛中开路前行。他们看到四处奔跑的老鼠，看到鱼儿像以往一样在溪流中游弋，听到鸟儿在林间唧唧喳喳地叫。井水可以饮用，植物枝叶繁茂。细菌的增加达到每亩400千克。核试验后可能会造成两年的破坏，但大自然依然发展如故。老鼠怎么会活下来？植物被毁灭了，但种子没有被毁灭，它们沉睡在地下，等待着地表被净化。对于细菌、小鸟、老鼠和树木来说，原子弹确实就是纸老虎。可能对人类自己来说，它是不一样的……

毛最后一句话的更深刻的含义是（龚澎后来也同意我的看法），即使人类从地球上消失了（大规模的自杀），生命也不会被人类制造的原子弹灭绝。

## 裁 军

所有的政府都在谈论完全彻底的裁军。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提出过裁军的建议；苏联也曾建议裁军；美国也一直在谈论裁军，但结果却是完全彻底的扩军。

“约翰逊总统可能会发现，一个一个地解决东方的问题很困难。如果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些问题的实际复杂性，可能他最好的做法就是直接面对问题的实质，接受中国的建议，召

---

① 有些人认为毛是个根本不知道核恐怖为何物的无知农民，毛在这里是以含蓄的方式嘲笑他们。

开一次最高级会议，讨论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问题。”

毛同意这种说法，但他的结论是，那不太可能。即使约翰逊先生自己愿意召开这样的会议，他也不过是垄断资本家们的管家而已，垄断资本家是决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中国只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可能还必须要证明能把一个变成两个，而且要不断变化，以至无穷。但是，中国不想要那么多的原子弹，原子弹确实没有太大的用处，原因就在于没有哪个国家敢使用原子弹。有几颗用来做科学实验就够了。中国甚至连一颗原子弹也不愿意有。

“我记得你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中国南方的一个无知的地方军阀，他张贴布告，悬赏捉拿传闻中领导一些匪徒到处惹是生非的‘苏维埃先生’。现在是‘中国原子弹先生’（Mr. China A - Bomb）在惹麻烦。为什么会这样？”

是的，毛担心他的名声不好；帝国主义者就是不喜欢他。帝国主义者也不喜欢“中国原子弹先生”。但是，把什么事都归咎于“中国原子弹先生”真的就很公平吗？发动反对中国的运动真的就很公平吗？中国暗杀吴庭艳了吗？但吴庭艳还是被暗杀了。肯尼迪总统被谋杀，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很意外。他们没有谋划那次谋杀。苏联的赫鲁晓夫被撤职，中国人又感到十分意外。他们也没有下过那样的命令。

## 关于联合国

“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受到中国的称赞<sup>①</sup>。你认为这

---

<sup>①</sup> 在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苏加诺和摧毁印尼共产党以后，印度尼西亚于1966年重返联合国。

一行动是否开了一个先例，会引起其他国家的退出吗？”

毛说，开了先例的首先是美国，它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现在，联合国的大部分成员国不顾美国的反对，赞成恢复中国的席位，于是就搞了一个新的名堂，需要 2/3 的多数，而不是简单的多数。但是，问题在于，在过去的 15 年里把中国排斥于联合国之外，中国是有得呢还是有失？印度尼西亚之所以离开联合国，是因为它感到留在联合国里没有多少好处。至于中国，她自己不就是一个联合国吗？与联合国里某些投票支持剥夺中国席位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无论是人口还是版图，都要大得多。中国是一个大国，她在联合国的外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我怎么想？在过去的 15 年里，如果中国是在联合国里，中国会更好吗？

“是的，可能会更好，如果那不意味着把一个中国分为两个中国。但是，现在有些人说，中国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想加入联合国。”

那样说不好。如果联合国 2/3 的成员国邀请中国加入，而中国人不接受邀请，那不是要被称为民族主义者了吗？（即反国际主义者）但是，即使联合国决定承认中国大陆，不承认台湾集团，就不会有困难了吗？他们怎么能既谴责中国是侵略者，又给中国以席位呢？（指美国军队进入北朝鲜后，联合国因中国的介入而通过决议，指称中国为侵略者。）但是，假如给中国摘掉侵略者的帽子？那又会怎样呢？联合国会指认美国在越南是侵略者吗？可能美国不会同意这样的变化。因此，中国进入联合国没有什么危险。

“现在考虑成立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国际组织可行吗？”

毛指出，这样的讲坛已经有了。一个例子是亚非会议。另一个例子是新兴力量运动会，这是美国把中国排斥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外以后组织的。

（定于1965年3月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会议的筹备会议，因诸多问题而备受烦扰。其问题包括，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的争端，万隆会议亲华国家一方坚持认为苏联是严格意义上的欧洲国家，必须排除在亚非会议之外。当时，中国认为，这个亚非组织基本上是独立于新殖民主义和西欧资本的，第三世界有计划发展的潜在中心。只要在国内发展上遵循中国的“自力更生”原则，遵循亚非国家之间相互帮助的原则，亚非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就可以不要按照传统的资产阶级方式用缓慢而又痛苦的方法去积累资本。这样一种理论上的替代办法，当然意味着缺乏资本的亚非国家的政治发展将更为迅猛和激进，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早日到来。中国和她的最亲密的盟友长期被排斥在受美国支配的联合国之外，印度尼西亚最近也退出了联合国，显然在一段时期内，亚非会议也将被看作是独立于联合国而存在的永久性穷国组织。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中苏关系的对立，亚非会议走向了另外的方向。）

### 中国有多少人？

“主席先生，在中国自己的联合国里，实际上有多少人呢？”我问道，“你能告诉我最近的人口调查得出的数字吗？”<sup>①</sup>

主席回答说，他确实不晓得。有人说有6.8—6.9亿，但

---

<sup>①</sup> 中国于1964年的春季和夏季做过一次抽样调查，但正式结果没有公布。

他不相信。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我提示说，按照定量供应的票证（布票和粮票）计算不应该有困难。毛指出，农民有时候把情况搞混乱了。解放前，他们隐瞒生育情况，由于害怕抓壮丁，儿子不做登记。解放后的情况是多报人口，少报土地，尽量少说产量，夸大灾情。现在生了一个孩子会马上报告，但人死后可能会几个月不报告（他的意思是说，用那样的办法可以得到额外的票证）。毫无疑问，实际出生率是下降了，但农民仍然迟迟不愿实行计划生育。死亡率的下降可能要大于出生率。人们的平均寿命从大约 30 岁提高到了将近 50 岁。

## 美国在越南

“你对美国有什么忠告？”

很久以前，他们就建议美国缩手。美国在世界上到处伸手。和以前一样，美国的统治者不会听。

美国的处境是困难的，在越南尤其困难。撤军不好；不撤军也不好。无论哪里出现了乱子的苗头，美帝国主义都会派军队去，先是派到这里，然后又派到那里。

“我听到某些华盛顿的人士说，舰队和海军陆战队在越南与在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反正要向他们付钱。”

是的，他们有很多事可干。哪个地方的反革命分子都需要他们的帮助。比如在刚果。在旧中国，天津、青岛、上海，甚至在北京，都可以看到美国兵。他们全都走了。实际上他们很快就走了。

中国取得反帝革命胜利的条件是：第一，旧的统治集团软弱无能，它的领导是那个老打败仗的蒋介石。第二，人民解放

军强大，领导有能力，人民相信自己的事业。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美国就可以干涉。否则，他们或者插不上手，或者很快就会离开。

吃晚饭的时候，毛问道，我认为约翰逊先生是否可以试一试与他的前任不一样的越南政策。我说可能不行；他可能会沿着老路越陷越深。但是，越南战争是不得人心的，而约翰逊先生希望有一个好名声。他的政府面临许多国内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亚洲打一场更大的战争解决不了的。不过，总而言之，由于胡志明和毛泽东不会给他提供一条“有诱惑力的出路”，不付出巨大的代价，他是不会离开的。我已经把我的看法告诉了外交部长陈毅，“明年以前，美国在越南的兵力达到10万人，我不会感到意外。”

毛问我，约翰逊先生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国内问题。

我列举了几个明显的问题，例如失业问题，尤其是黑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会加剧紧张的种族关系。当然，战争可以暂时减少失业的人数。自动化是造成失业的一个因素。我还谈到了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徙。农村的机械化和资本化使数百万小土地所有者沦为无地之人，并把他们抛向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现在，美国总人口中只需大约8%的人就可以生产出超过全国消费量的粮食。

毛让我把数字重复一遍。我重复数字的时候，他疑惑地摇着头。他只说了一句话，那怎么可能？

## 中国与美国

“过去的15年里，历史的力量把美中两国人民分隔开来，

割断了两国人民所有的实际交往，我个人自然很遗憾。今天，鸿沟似乎比以往更大了。但是我认为，它最终不会是一场战争，不会是一场重大的历史悲剧。”

毛说，历史的力量终究会使两国人民再次走到一起；那一天肯定会到来。可能我是对的，在这个过程中，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只有美国军队到中国来，才会发生战争。他们可能来，他们也可能不来。如果他们来，他们确实不会得到多少好处。那是根本不允许的。美国领导人大概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会侵略中国。这样就不会发生战争，因为，如果他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中国当然决不会派军队进攻美国。

“有没有可能因为越南问题发生战争呢？我看到许多报纸的报道说，美国已经考虑把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

不，那不会发生。腊斯克先生现在已经澄清了，美国不会那样做。腊斯克先生以前可能说过那样的话，但他本人已经作了更正，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因此，越南北方不会发生战争。

“我曾不时与一些美国高级官员谈话，其中也包括腊斯克，我从谈话中得出的印象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也就是美国的统治者，根本就不理解你。”

为什么不理解？中国的军队不会越过边界去打仗，这清楚得很。只有美国进攻中国，中国人才会打仗。那还不清楚吗？中国人要忙自己国内的事情。越过自己的边界打仗是犯罪。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越南南方的人民能够应付他们的局势。

“美国官员一再说，如果美国撤出越南，那么，整个东南亚将被占领。”

毛说，问题是被谁“占领”？被中国人占领，还是被当地的人民占领？中国只能被中国人占领。

“越南现在有中国的军队吗？”

毛肯定地说，越南北方没有中国的军队，东南亚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中国的军队。中国在自己的边界以外没有任何军队。

“腊斯克说过，如果中国放弃她的侵略政策，美国就会撤出越南。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毛回答说，中国没有侵略政策可以放弃。中国侵略什么地方了？中国没有采取过任何侵略行动。中国支持革命运动，但不是采取侵略别国的方式。当然，只要有解放斗争，中国就会发表支持的声明，举行支持的游行。恰恰是这一点，使帝国主义者感到恼火。

毛继续说，在有些地方，例如金门和马祖，中国会故意整出点动静。大概是因为美国人远离家乡心神不安，那里响上几枪，就能引起很大的注意。你想一想，在中国的领海里放几发空包弹，能干什么事。不久前，美国人认为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不足以对付那里的炮击，又派出第六舰队的一部分开向中国，还从旧金山调来了部分军舰。到了这里后，他们发现无事可做。所以，好像是中国可以命令美国的军队开来开去。

蒋介石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也能命令蒋介石的军队东奔西走。当然，海军衣服穿好了，肚皮吃饱了，必须得给他们找点事情做。但是，那些真正武装干涉别国的人，那些轰炸和焚烧别国人民的人不被看作是侵略者，而在家放一放空枪就被说成是侵略者，怎么能有这样的道理呢？

有些美国人曾说过，中国革命是由苏联侵略者领导的，而

实际上，中国革命是由美国人武装起来的。同样，武装越南革命的也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在最近的几个月里，解放武装力量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美式武器的供应，而且通过招收受过美国训练的南越傀儡军士兵和军官，扩大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解放军，也曾通过把美国人为蒋介石训练和武装的军队吸收到自己一方的方式，壮大了队伍，增强了力量。这场运动被称为“换帽子”。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之所以大批地换帽子，是因为他们不信任自己的长官，他们感觉自己会白白地送死，会因为戴错了帽子而被农民杀死，到了这样的时候，胜负的结局就临近了。现在，南越傀儡军队中换帽子也越来越普遍。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越南南方出现了解放阵线获胜的形势？”

毛认为，美国军队还不打算离开。战斗可能还会持续一两年。之后，美国军队会发现待在那里没有意思，就会回家去，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

“在最近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他说，如果美国不首先从越南撤军，中国将反对召开实施 1954 年条约的日内瓦会议，我理解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你现在的政策，是不是坚持美国先撤军，然后再参加讨论统一的越南的国际地位的日内瓦会议？”

主席说，他不知道周总理对我说的话。他个人认为，应该提到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先召开会议，然后美国撤军。第二种可能，先撤军，后召开会议。第三种可能，召开了会议，但美国仍然驻军西贡，与南朝鲜的情况一样。最后一种可能，无须召开任何会议，或达成任何国际协议，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把美国人赶出去。

1954年日内瓦会议规定，法国军队撤出整个印度支那，禁止任何其他外国军队进行干涉。美国违反了日内瓦公约，而且一再违反日内瓦公约……坦率地说，美国在越南南方驻军是一件好事。它锻炼了人民，壮大了人民的解放军。只有一个吴庭艳是不够的，就像在中国只有一个蒋介石还不够一样。必须要有日本占领中国八年半。只有那样，中国才能产生有才干的领袖和强大的革命军队，才能打败国内的反动派，才能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去。

“如果美国采取和平政策，从南朝鲜、台湾、整个东南亚和海外所有地方撤军，中国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否会同意彻底销毁核武器，同意世界范围的全面裁军？”

毛说，坦率地讲，他从来没有想过这种问题。

“我没有见过约翰逊总统，不过我想，如果你有话要对他讲，我可以转告他。你有话要对他讲吗？”

主席停顿了一会说：不，没有。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问道，“你真的认为中美关系有改善的希望？”

是的，他认为有希望。那需要时间。他这一代（在他有生之年），可能不会改善了。他不久要去见上帝了。

## 去 见 上 帝

“说到你的健康，这是以前没有谈过的问题，从今天晚上的情况看，你的健康状况很不错。”

毛苦笑着回答说，可能有些问题。他再次说到，他不久要去见上帝了。我相信吗？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想弄清是否有一个上帝。你相信上帝吗？”

不，他不相信，有些自称是消息灵通的人说，有一个上帝。神似乎有不少，有时候同一尊神可以支持所有各方。在欧洲的战争中，基督教的上帝支持过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即使他们之间相互开战，仍然是这样。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上帝支持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但那个时候，支持另一方的是真主。

吃晚饭的时候，毛说到他的两个弟弟被杀害了，他的第一个妻子由于参加革命被杀害了（1930年），他们的儿子在朝鲜战争期间也被杀害了。他说，奇怪的是，死亡总是不愿眷顾他。多少次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但阎王爷就是不让他去。他有什么办法呢？有几次他似乎必死无疑。他的警卫员被打死的时候，就站在他的身边。一次，一位被炸弹炸死的战士的鲜血溅满了他的身体，但他却毫发无伤。

“那是在延安吗？”

是在延安。他的警卫员在长征途中被杀害<sup>①</sup>。毛还有数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按照辩证法的法则，一切斗争最终都会化解，包括地球上人类的生存斗争。

“命运使你免遭厄运，可能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非凡的业绩。我不记得，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还有谁能像你一样，从偏僻的乡村走出来，不仅领导了一次成功的社会革命，而且书写了她的历史，构想了获取军事胜利的战略，系统地提出了

---

<sup>①</sup> 毛的弟弟毛泽覃 1935 年在战斗中牺牲。毛的另一个弟弟毛泽民，参加过长征，1942 年在新疆一次反共清洗中被杀害。

改变中国传统思想的意识形态学说，然后在一种新型的文明中实践了自己的哲学，并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沉思了一会儿后，他对我说，我知道他开始生活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学教员。那时，他没有想过会打仗，也没有想过会成为共产主义者。他只不过是一个像我这样的民主人士。后来——有时候，他也对各种理由的巧合感到疑惑——他对建立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兴趣。总之，事情没有按照个人的意志发展。其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就是事实……

“1937年听过你讲课的年轻人，后来在实践中学习了革命，那么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通过什么方式学习革命呢？”

当然，今天中国20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打过仗，没有见过帝国主义者，不了解掌权的资本主义。他们对旧社会没有亲身的了解。父母可以对他们讲旧社会的事，但听一听过去的事，读几本书，与亲身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人是按照自己的环境创造历史的。你已经根本改变了中国的环境。许多人不知道，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长大的年轻一代将会做些什么。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可能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年轻人会否定革命，去干坏事：与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势力重返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一边去。我问过他的想法。他当然不希望他们是反革命，但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人们按照我们无法预见的条件去决定。从长远的观点看，未来的人们应该比我们更有知

识，就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比封建时期的人更有知识一样。占优势的判断将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今天的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后人，将会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去估价革命工作。

毛的声音低沉下去，他微微地合着双眼。地球上人们的状况始终在迅速地变化着。他说，从现在起的1000年后，我们所有的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可能会显得相当可笑。

在我起身告辞前，主席向美国人民表达了他的问候，他只说了一句话，他祝美国人民进步。如果他的祝愿是美国人民获得解放，不是肯定会有人不同意吗？他们不是会说他们已经获得了选举权吗？但是，对于美国人民中没有真正获得解放的人和希望获得解放的人来说，他的祝愿是最美好的祝愿。

毛不顾我的一再辞别，一直把我送到门口，看着我坐进汽车。他没有穿大衣，一个人站在北京的寒夜里，用这个古老的文化名城的传统方式向我挥手告别。门口没有警卫人员，甚至整个晚上附近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武装警卫人员。房间内外只有两三个衣着简朴的年轻女性，他们有时站在毛的背后，好像是护理员，他们是毛的女儿？毛站起来的时候，其中的一位搀扶着他的胳膊。

与我握手的时候，毛说了一句中国的谚语：“天有不测风云”，他是在提醒我，要我保重。

汽车开动了，我回过头去望着他，他怀抱着双臂，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向人民大会堂。

---

## 附录二

# 1964 年与周恩来的两次谈话

(1964 年 10 月 22 日, 12 月 16 日)

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两次谈话中, 我了解到了 1964 年中国工农业生产的一些实际情况和估算的数字, 这是 4 年来中国第一次正式披露这样的消息。这些消息表明, 中国的粮食产量和某些优先发展的工业, 已经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 人民也从 1959—1961 年的连年歉收和苏联全面撤消对华援助的挫折中大致恢复过来。总理的谈话很谨慎, 没有任何夸大的成分, 他的谈话与中国人普遍持有的态度一样, 中国还需要一两个丰收年, 才能确保度过难关, 达到相对的富足。

两次谈话周恩来都是在他的住所接待的我。他的住所坐落在以前的紫禁城内现已辟为官邸的住宅区里。我们的谈话大约持续了 4 个小时。他看起来很健康, 对于他患了“重病”的谣传, 他一笑置之。虽然他已经 66 岁了, 鬓发间仍然难得见到几缕白发。他的谈话质朴、实在, 强烈表现出, 他厌恶冒险和赌博, 他深刻地了解, 要使中国成为完全现代化的国家, 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他这一代人是远远不足以完成的。他的谈话有

一些不能公开发表。但他同意，谈话的内容大部分可以转述大意，有些内容则可以直接引述。

在概述外交关系的时候，总理认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在近期缓和的希望。他说，承认台湾政府的独立（可能），将使中美紧张关系多年不可能得到缓和。如果联合国承认台湾政府的独立，中国将会拒绝与这个国际组织发生任何接触。他称赞戴高乐“拯救”了法国，尤其赞赏他奉行的独立财政政策。在谈到与赫鲁晓夫的苏联的十大分歧时，他说出现了一个好的变化：赫鲁晓夫被撤职了。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参加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也坚决反对新的苏联领导人再次提出的由赫鲁晓夫提议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

周总理说，中国1964年粮食产量的初步报告，到年底约有10%尚未统计，但他保守地估计，总产量约为两亿吨。他说，这个数字是根据人民公社实际向政府交售的粮食和缴纳的税款统计的。总理说，统计学家更倾向用其他统计数字，比如对“抽样方法”（即统计不同条件下的典型产量）得出的数字取平均值。“抽样”统计的数字表明，与1963年相比，1964年粮食产量的增幅为14%至15%。（据此，1964年的收成将达到2.1亿吨，这可能是历史上最高的产量。但中国的官员仍在等待最后的统计结果，没有轻易地公布这个最高的产量。）

总理说，1964年大批地区棉花产量的增幅达40%至50%。（他没有提供所有地区的产量。有理由认为，与1963年相比，全国总产量的平均增幅不会低于15%。这也是一个新的纪录。）

灌溉设施的扩大、农村电气化程度的提高、化肥使用量的增加以及普遍有利的气候条件，都是促进农业恢复的原因（在

另一次谈话中，农业部副部长吴诚告诉我，中国 1964 年的化肥产量高达 700 万吨，这个数字大约为香港的外国分析家提供的数字的两倍)。

钢产量“仍略低于历史最高水平”，但总产量比 1963 年提高了 20%。总理肯定地说，大部分工业产品的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和品种的大幅度增加，使中国的工业经济更加平衡和更加现代化（以前的钢铁产量数字中含有大量土炉冶炼钢铁产量的数字。现在土炉冶炼的方法基本上不用了。驻北京的外国观察家估计，中国 1964 年现代化生产的钢产量在 1 300 万—1 500 万吨之间）。

在某些新的和老的工业领域，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总理说，中国最近实现了石油的“自给自足”，其主要原因是，新开发的大庆油田打出了高产油井。他预计，1965 年的石油产量将达到 1 000 万吨。中国现在可以生产多种现代的燃料。早在 1962 年我曾报道过，中国正在制造自己的喷气式引擎和喷气式飞机，我的报道是否正确？总理证实说，我的报道没有错。他说，过去的几年质量已经有了极大改善。

总理强调说，他的政府正在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的任务之一，是系统而广泛地普及计划生育。目前正在开展宣传，但在农村地区，只能逐步地深入（提倡并应用所有现代的和实用的节育方法，包括经过要求的堕胎）。总理明确地说，中国的目标，是把人口增长率逐步地降低到日本的水平。

在核领域，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做数百次核实验”，周总理认为那种做法完全没有必要。但是中国将来核武器的发展速度（大概是氢弹），不会低于工业发达的国家。总理说，中国单方面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明确地排除了使用小当量核

武器和战术核武器。与此同时，中国将坚持要求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

关于越南南方问题的解决方案，北京的观点是，必须履行实现越南和平统一的 1954 年日内瓦公约。总理强调说，首要的问题是保证美国的军队撤出越南南方，“这样，越南人民就可以自己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

周恩来认为，边界争端是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但是他承认，意识形态的分歧确实影响了许多方面的政策。他非常满意地表示，中国到 1965 年初将全部偿清欠苏联的债务。此后，中国将不再借外债。中国的国内债务也将在 1968 年以前还清（以前，中国与苏联集团的贸易额占中国总外贸额的 80%，但是 1964 年，中国已经与 125 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其外贸额的 70% 以上产生于同苏联以外的国家的贸易）。

我们的谈话从农业问题开始。在谈到收成之后，我问道，既然情况好转了，为什么中国还要继续从国外购买粮食。总理的解释是，两三年前买粮食是为了缓和实际的短缺，而最近购买粮食是出于商业和调剂的目的。把稻米出售给“许多国家”（如锡兰、古巴、印度尼西亚），以低价进口的小麦取代国内的稻米消费，这种做法对中国是有益的。小麦基本上是在城市里销售，这可以使农村留下更多的稻米，用做内部的储备。这一政策还将继续下去。

扩大自留地是为了鼓励生产，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恢复”，这个问题国外仍然存在争议。我问道，有些报道说自留地的产量能占总产量的 20%。总理说，自留地不会超过全部耕地的 7%，而且增加自留地也不允许超过 10%。自留地的总产量很难获得。自留地的产量通常不报告，但统计人员用

“抽样方法”统计1964年粮食产量时，有10%不予计算，自留地的产量包括在这10%当中。毫无疑问，许多自留地的产量要高于集体土地的产量。农民下工后悉心照料自留地，为了增加产量，他们施用圈肥和其他肥料是毫不吝惜的。

谈话继续进行：

问：“就平均的情况而言，自留地施用的肥料是不是比集体的土地要多？”

周总理：“为了得到现金，农民会把自己的圈肥卖一部分给集体。但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会留下一些自己用（于自留地）。

“最近正在上演一出戏，名字叫《送肥到田间》。每一个人都像剧中描述的先进社员那样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没有必要演这出戏了。明眼人都会知道，一出戏提倡的（社会态度），恰恰就是有些人难以做到的。这出戏表现的模范人物，是为了帮助落后的人赶上去。因此，西方的记者没有必要说三道四。我们承认，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先进的。我们评先进是为了给其他人树立学习的榜样。

“为了发现事实而到中国来的那些人，不必去寻找什么内部消息。他们可以在我们的舞台上或宣传中发现问题。当然，舞台上或宣传中提倡的，有时也可能是错误的，但一般的情况是可以辨别的。我们鼓励好事，批评坏事，那就是说，坏事肯定存在，而好事也不尽完美。如果每一件事都是好事，我们当然会找出更好的事作为榜样。

“例如，我们正在宣传的榜样是大寨大队。这个大队在（山西省）太行山区，那里的土地都是坡地，到处是沟壑，土地贫瘠。但就是在这个地方，人们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完全靠自

己的努力，把所有的坡地变成了梯田，发展了生产，把穷山沟变成了富山沟。

“在过去的 11 年里，大寨大队只向国家贷过一次款，而且在第二年就还清了贷款。它完全是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山西省）确实正在修建一些大型的蓄水工程，但是，大寨的水利工程完全是由大寨人修建的。过去的 11 年，大寨的每一户人家平均每年（通过集体）向国家交售 1 吨的粮食。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事情。今年交售粮食的数量甚至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大寨当然是一个好榜样。这样的榜样在中国的每一个省都可以找到。中国的农村人口超过 1.2 亿户。如果（全国）每一个公社或大队卖给国家的粮食达到平均每户 1 吨，那么总数将超过 1.2 亿吨。当然，这个目标现在还达不到，但我们必须发扬大寨的精神，这个目标将来肯定有可能达到。”

据说，中国的各个人民公社在向国家缴完公粮和卖完余粮后，还能留有总产量 60% 的粮食。向国家交售 1.2 亿吨粮食，意味着总产量将超过 3 亿吨——这将使中国居于世界粮食出口国的前列。1964 年，大寨有 83 户人家，全大队有 360 口人，平均每户 4.3 人。对于人口统计学者来说，这些数字可能是令人感兴趣材料，他们可以用来推算中国难以捉摸的“总人口”和未予公布的 1964 年人口普查的结果。

问：“中国（1957 年）的 15 年计划说，中国将于 1973 年在工业生产方面赶上英国。为什么最近听不到这个口号了？”

周总理：“超过英国不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问题。1957 年，苏联把它的目标确定为在总产量上超过美国，我们把超过英国的口号定为目标。经过几年来自力更生的探索，我们积累了一整套建设的经验，我们认识到，超过英国不应该是我们的

主要目标。我国的工业现代化，不是仅仅通过增加几种工业产品的数量就能够实现的。以石油为例。英国实际上不生产石油，如果用这方面的数字作指标，我们可以一举超过英国。但那是个非常低的目标，我们就是做到了这一点，能说我们赶上和超过英国了吗？现在来看看我们的高目标。以电力为例。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英国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电力的应用非常广泛。工业需要电力，普通消费者也需要电力。无论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什么样的危机（危机期间，钢产量和煤产量可能都会下降），发电量不会有实质的下降，因为电力生产的成本可以用取自消费者的赢利偿付（非工业消费的不断需求，是最低限度的基本生活的保证）。1964年，中国农村的电力是1957年的22倍，但就人均发电量而言，中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赶上英国。由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所以每一个国家需要的特定的工业产品的数量是不一样的，一个国家这种产品需求量大一些，另一个国家那一种产品需求量大一些。我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而他们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这两种经济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重要的事情，是研究我们的工业和技术的整体水平。”

问：“你能告诉我你们最近对中国总人口估算的数字吗？我看到和听到的事情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是要认真地限制人口增长。你预计什么时候年人口增长率会降到2%以下？”

周总理：“计划生育是实现我们的目标的第一步。在一些城市里开展得很顺利，但是，不能期望这项工作在农村马上取得重大成效。死亡率正在以大大高于出生率的速度下降。老年人的寿命更长了，婴儿的死亡率更低了。这是因为，人民可以

得到的基本生活资料改善了。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经富裕了。但是，你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情况比旧中国好多了。当然，中国目前的生活水平大大低于美国。但是，我们没有500万的失业人口。美国失业者的家庭生活非常苦，而有些人却享受着远远高于中国的生活水平。在中国，不同人的生活水平差别不大。这就是死亡率低的原因。

我们鼓励计划生育。这方面的工作在城市里，尤其是在学校、工厂和政府机关，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这些地方的年轻人认识到了晚婚的好处，而且愿意在婚后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可行的，但是，需要适当宣传和教育，需要时间。如果中国的人口增长率能够在本世纪降到1%以下，那将是令人非常满意的。”

问：“你认为中美关系有改善的可能性吗？你认为科学家和学者的交流是有益的吗？”

总理：“要改善中美关系，必须首先考虑原则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我们一直坚持下面两点。第一点是中美之间必须在（万隆会议）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另一点是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所有军队。只要能就这两个原则问题达成协议，其他的问题就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而只谈枝节问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华沙会谈已经谈了九年多，但美国一直拒绝同意这两个原则。美国跟在别人后面说，它也是支持和和平共处的；但中国提出和平共处，美国就拒绝。这不是证明了美国政府说过的话是虚伪的吗？至于某些人访问中国的问题，目前也不可能达成协议。我们欢迎的人，美国政府不会让他们来，美国政府愿意派

到中国来的人，我们又不欢迎。总之，原则问题不解决，小问题也会陷入僵局。可能你是个例外。我们欢迎你，美国国务院最近也允许你来。”

我插问了一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的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的计划，对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目前，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声称，它代表中国。当然，任何爱国的中国人都不会同意。但是，如果台湾有人堕落到惟美国的马首是瞻，为美国的政策需要服务，宣称台湾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依赖在美国政府操纵和高压之下的联合国的多数，继续侵占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不仅中美关系不可能得到改善和恢复，我们甚至不会与联合国发生任何联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美对抗就不是持续几年的问题，会长期存在下去，存在多少年，我们也不知道。它会一直持续到美国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并放弃这个政策的那一天——我相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问：“日本的佐藤政府似乎也准备支持美国的让台湾独立的计划。你认为这是佐藤先生准备为收回冲绳付出的代价吗？”

总理：“这两个问题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日本有能力收回冲绳，它的看法不会与美国的看法一样。这样的日本将不再是今天的日本。现在，它跟在美国后面，叫嚣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是只承认台湾。这是追随美国的政策，给美国的政策当吹鼓手。这表明，日本既没有收回冲绳的决心，也没有收回冲绳的能力。”

问：“中国倡议召开一次 1954 年日内瓦公约签字国会议，以结束越南战争。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否准备讨论戴高乐将军提出的对越南的独立和中立化实行国际保障的建议？”

总理：“我们坚持认为，应该在履行日内瓦公约的条款的前提下实现越南的独立和统一，越南的制度应该按照越南人民的意愿决定。今天越南南方的问题，不是立即召开一次会议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美国的军队必须撤出越南南方，以使越南南方的人民能够自己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至于尊重老挝、柬埔寨的和平、中立和独立的问题，应该立即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这些问题。”

问：“国外有报道说，中国的原子弹比美国专家预计的要复杂得多，这样的报道意味着什么？”

总理：“美国的专家根据他们收集到的资料得出了结论，他们认为，我们爆炸的原子弹，在技术水平上要高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专家比你懂得多，可能比我懂得也多。我们两个人都不是专家。”

问：“增加核武器的储备，好像与孩子们玩木头兵游戏一样幼稚，因为核武器是不能真正使用的。但是，每一次威胁使用核武器，都与开始一场赌局非常相像。这种情况是不是非常危险？”

总理：“没有那么危险。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

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隔了20年。”

总理：“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我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事物。一些国家已经拥有了核武器，但没有哪个国家敢冒使用核武器的风险。不然的话，泰勒将军为什么要发明‘特种战争’？有趣的是，他正在试验他的发明。我们中国的干部（定期）下到农村的基层单位，去积累第一手的经验。现在泰勒也在（越南）积累经验。不过，他去的地方是个苦地方。”

总理谈了谈游击战在越南的成功，然后就谈到了法国的崛起，自从离开越南和阿尔及利亚以来，法国已经成为能够向美国挑战的强国。他接着说：

“为什么戴高乐能够如此自豪？因为他结束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他撤走了 80 万军队和 100 万平民，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完全独立，他这样做表面上是丢了面子，而实际上他从经济危机中拯救了法国。美国能出现一位从世界各地撤走驻军，使全世界彻底改变对美国的看法的总统吗？”

在谈到未来和眼下繁重的任务时，总理提到了经济上的几个鲜明的对比，中国有巨大的 16 000 吨水压机，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同类机械媲美，同时，运输还要靠胶轮大车；中国有精密的仪器和柴油驱动的大型轮船，同时，农民还在用着木制的小船和油灯。他说，“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上海，积肥和运送肥料的小船破旧不堪。在江苏的北部，甚至可以看到更落后的现象。例如，在南通东南部靠海边的启东县，那里的土地都是水浇地，但连一头牛都没有，更不要说农业机械了。为什么？因为不需要机械。每个农民只有一亩多地。收成很好：皮棉亩产超过 50 公斤，粮食亩产大约为 500 公斤。实际上，所有的土地都浸透了水，只能用人力耕作。没有必要深耕土地。当地的河渠稠密，运送肥料或是用非常小的木船，或是靠人们用扁担挑。但是，那里的产量高，人民也相当富足。在这样的地方怎样实现机械化？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以革命战争为例，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打败了蒋介石，还与美国打了仗。那不仅是装装

样子，我们为此流了血。但坦率地说，我这个总理搞了15年的经济建设，还没有完全掌握中国的经济建设。我学到了一些东西，但学得不是很好。我们大家都在学习。经济发展的规律极为复杂。我们获得了一些经验，但我们必须获得更多的经验。有些规律我们已经理解了，但是更多的经济发展的规律还有待理解。我们做了不少正确的事，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错事。一个人必须取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过去的战争就是这样。我们有时打胜仗，有时打败仗，而且不止一次打了败仗；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丰富了自己的经验，领导我们的革命走向了胜利。建设也是一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敢于面对困难，才能克服困难，只有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和错误，才能纠正这些不足和错误。

“不了解这些情况的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始终都是完美的。这怎么可能呢？还有一些人是专门挑毛病，他们看到了我们的不足，就认为中国的经济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好转了，有些人又说一切都好极了。他们总是不能对中国形成正确的看法。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时，困难和不足还会出现，我们要前进就必须不断地克服它们，我们还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发现更好的方法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向前。革命斗争是这样，生产和建设也是这样。换句话说，阶级斗争是这样，生产斗争也是这样。人们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要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

# 索 引

(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 1954年日内瓦会议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204, 211, 218
- Chen, Jerome, 62 注①
- Dimond, E. Grey, 39 注①
- 阿尔及利亚 (Algeria), 188, 218
- 埃德加·斯诺夫人 (Mrs. Edgar Snow), 3, 6—7
- 癌症 (Cancer), 50, 55
- 艾灸 (Moxibustion), 33
- 安德烈·贝当古 (Andre Bettencourt), 163
- 鞍山钢铁公司 (Anshan steel complex), 8
- 奥尔德斯·赫胥黎 (Aldous Huxley), 37—38
- 八路军 (Eighth Route Army), 105
- 巴基斯坦 (Pakistan), 11
- 班禅喇嘛 (the Panchen Lama), 182
- 保安县/志丹县 (Pao An/Tze Dan), 7, 134—139
- 报纸 (Newspapers), 23; 另见中国的新闻报道、外国的新闻报道
- 北京 (Peking), 3, 7—9, 13—14, 35, 40—41, 49, 52, 54—55, 79, 110, 169, 173
-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84, 87, 112
- 北京工业学院 (Peking Technical College), 113

- 北京商学院 (Peking Commercial College), 113  
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29  
比基尼岛 (Bikini Islands), 195  
避孕 (Contraceptives), 30, 41—42  
避孕药 (Birth-control pill), 25—26, 30, 40—44, 46  
不发达国家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187  
布赖恩·梅格雷思 (Brian Maegraith), 53  
财富 (Wealth), 132  
采育人民公社 (Tsa Yui People's Commune), 57  
苍蝇 (Flies), 54  
“产值” (“Output value”), 106, 179, 206  
长征 (the Long March), 106, 179, 206  
朝鲜 (Korea), 72, 177, 198, 205; 另见南朝鲜  
陈毅 (Chen, Yi), 200  
陈永贵 (Chen, Yung-kuei), 42—43, 139  
赤脚医生 (Barefoot doctors), 50—51, 55—56, 151  
冲绳 (Okinawa), 217  
出口 (Exports), 148, 214  
出生率 (Birth rate), 42—44, 46—47, 199  
传染病 (Infectious diseases), 52—54  
达赖喇嘛 (Dalai Lama), 183  
大不列颠 (Great Britain), 见英国  
大男子主义 (Male chauvinism), 46  
大学与学院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7, 29, 84, 87, 112—113, 151  
大跃进 (Great Leap Forward), 63, 73, 75, 141, 179  
大寨大队 (Ta Chai brigade), 42—43, 139, 213  
戴高乐将军 (General De Gaulle), 164, 187, 210, 213  
戴玉华 (Tai Yu-hua), 50

- 德哈斯 (J. A. DeHaas), 41
-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 (Dwight D. Eisenhower), 10 注①, 72
- 邓拓 (Teng T' o), 80
- 邓小平 (Teng Hsiao - p' ing), 64, 74, 78, 86
- 迪安·腊斯克 (Dean Rusk), 201—202
- 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者 (Imperialism and imperialists), 17, 70, 104, 187, 189, 196, 202, 204, 206
- 第二次世界大战 (Second World War), 6
- 第三世界 (The Third World), 187—190, 198
- 第一次国共内战 (Nationalist - Communist civil war, first), 6
- 电力 (Electricity), 214
- 定量 (Rationing), 25
- 东北 (Northeast China), 100
- 东南亚 (Southeast Asia), 11, 163—164, 189, 202, 204
- 东亚 (East Asia), 11
- 董必武 (Tung Pi - wu), 8
- 对毛泽东的描述 (Descriptions of Mao Tse - tung), 4, 176, 179—180
- 对毛泽东的颂扬 (Glorification of Mao Tse - tung), 64—65, 160—162
- 对周恩来的描述 (Descriptions of Chou En - lai), 11, 147, 175, 209
- 堕胎 (Abortion), 29—32, 45, 211
- 俄国 (Russia), 9, 11; 另见苏联
- 恩格斯 (Engels), 66, 193, 207
- 法国 (France), 188, 210, 217—218
- 反帝 (Anti - imperialism), 200
- 反帝医院 (Anti - imperialism Hospital), 29, 31, 35
- 反封 (Antifeudalism), 189
- 反革命分子 (Counterrevolutionaries), 82, 97, 106, 207
- 反美 (Anti - Americanism), 3

## 索 引

---

- 反侵略政策 (Antiaggression policies), 202
- 反修医院 (Antirevisionist Hospital), 52, 55—56
- 反资 (Anticapitalism), 189
- 防空洞 (Air-raid shelters), 165
- 飞机 (Aircraft), 123
- 非正常性关系 (Promiscuity), 44
- 非洲 (Africa), 187, 189
- 肥料 (Fertilizer), 148—149, 210, 212
- 分娩 (Childbirth), 31, 40
- 分权 (Decentralization of government), 166
- 封建主义 (Feudalism), 70, 189, 206
- 服兵役 (Military service), 26, 121; 另见士兵
- 服饰 (Clothing), 21
- 妇女 (Women), 44—45
- 妇女的地位 (Position of women), 42, 136, 162, 210
- 钢铁生产 (Steel production), 73, 149
- 革命 (Revolution), 87—89, 155, 163, 164, 179, 189—190
- 个人崇拜 (Personality cult), 17, 62—67, 71, 160—162, 191
- 个人崇拜与毛泽东 (Personality cult and Mao Tse-tung), 62, 66
- 工代会 (Workers' congresses), 127
- 工业 (Industry), 63—64, 73, 75, 131, 142, 147—148, 151, 209, 214—215, 218
- 工业事故率 (Accident rate in industry), 49
- 工资 (Wages), 23—24, 135, 160
- 公共卫生 (Public health), 48, 56
- 公路 (Roads), 137
- 公民王某 (Citizen Wang), 21—26
- 龚澎 (Kung P'eng), 65, 178, 179, 181, 195

- 龚浦生 (Kung P' u - sheng), 178
- 共产党与共产主义 (Communists and Communism), 76, 79, 94, 177, 185, 190; 另见中国共产党
- 共产主义青年团 (Communist Youth League), 80 注①, 114
- 钩虫病 (Hookworm), 53
- 官僚主义 (Bureaucracy), 18
- 官僚主义分子 (Bureaucrats), 116
- 广东省 (Kwangtung province), 49, 143
- 广州商品交易会 (Trade Fair at Canton), 8
- 国际主义 (Internationalism), 69
- 国民党人 (Nationalists), 136, 174, 184, 186, 203; 另见台湾
- 国民生产总值 (Gross National Production), 149, 180
- 国营农场 (State farms), 108—109, 114—115
- 海瑞 (Hai Jui), 79—81
- 韩素音 (Han Suyin), 113
- 汉口 (Hankow), 35
- 和平 (Peace), 10—11, 174, 177, 181, 204
- 和平共处 (Peaceful coexistence), 156
- 河北 (Hopei), 102
- 河内 (Hanoi), 156, 174
- 核武器 (Nuclear weapons), 124, 154—155, 173, 180, 188, 196, 204, 211, 217—218; 另见原子弹
- 核战争 (Nuclear war), 195
- 赫鲁晓夫 (Khrushchev), 63, 65, 72, 75, 191, 195, 197, 210
- 黑格尔 (Hegel, G. W. F.), 193
- 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11, 172, 173, 174, 175
- 轰炸越南 (Bombing of Vietnam), 18
- 红军 (Red Army), 93, 98, 107, 120, 122, 136, 184

## 索 引

---

- 红卫兵 (Red Guards), 7, 13, 16 注①, 19, 43, 48, 85—88, 96, 100, 107, 120, 161, 175
- 红小兵 (Little red soldiers), 103, 121
- 红医工 (Red Medical Workers), 56
- 洪若诗 (Joshua Horn), 59
- 胡志明 (Ho Chi Minh), 186, 200
- 湖南 (Hunan), 50, 71
- 华北 (North China), 79
- 华东 (East China), 95
- 黄华 (Huang Hua), 118
- 黄克诚 (Huang K'eh - ch'eng), 73
- 黄一平 (Wang Yi - p'ing), 116
- 黄永胜 (Huang Yung - sheng), 8
- 婚龄 (Marriage age), 30, 44
- 婚前性关系 (Premarital sex), 43—45
- 积极分子 (Activists), 20, 79, 97, 115, 136
- 疾病 (Diseases), 33—38
- 集体农业 (Collective agriculture), 64, 108, 134—143, 212—214; 另见人  
民公社
- 集体收入 (Collective income), 142
- 几内亚 (Guinea), 56
- 计划生育 (Family planning), 40, 46, 56, 211, 215; 另见节育
- 计划生育战斗组 (Family Planning Fighters Group), 41
- 技术 (Technology), 123
- 寄生虫病 (Parasitic diseases), 53
- 佳木斯 (Kiamuze), 108
-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194
- 价格 (Prices), 24—25

- 柬埔寨 (Cambodia), 3, 10, 164, 166, 170—171, 217
- 江青 (Chiang Ch'ing), 81
- 蒋介石 (Chiang Kai-shek), 10 注①, 46, 70, 79, 152, 174, 179, 185, 188, 203—204, 207, 216
- 交通 (Transportation), 25; 另见铁路; 公路
- 教育 (Education), 13, 19, 109—110, 113
- 阶级斗争 (Class struggle), 76, 81, 84, 220
- 阶级消亡 (Elimination of classes), 61
- 接生员 (Midwives), 50
- 节育 (Birth control), 42, 162, 211; 另见计划生育
- 《解放军报》 (Newspaper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69
- 金门 (Quemoy), 202
- 进口 (Imports), 148
- 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220
- “经济主义” (“Economism”), 75, 78
- 军队与人民 (Army and the people), 121—127
- 军队与中国共产党 (Army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93—99, 125—127
- 军官 (Army officer), 106, 110, 121—122, 125—126
- 军事训练 (Military training), 122—123
-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66
- 柯庆施 (K'o Ching-shih), 46
- 柯西金 (Kosygin), 166
- 垦荒 (Land reclamation), 137, 139, 142
- 空想社会主义者 (Utopian socialists), 193
- 拉丁美洲 (Latin America), 187, 189
- 喇嘛教 (Lamaism), 183
- 朗诺 (Lon Nol), 3
- 劳改农场 (Prison farms), 106

## 索 引

---

- 老挝 (Laos), 170, 217  
老子 (Lao Tzu), 192  
雷锋 (Lei Feng), 103  
李立三 (Li Li - san), 77  
李世平 (Li Shih - pin), 138  
李万春 (Li Wan - chun), 116  
李先念 (Li Hsien - nien), 8  
李雪峰 (Li Hsueh - feng), 84  
李仲山 (Li Chun - shan), 100  
理查德·尼克松 (Rechard Nixon), 5, 10—11, 163—164, 169—173, 177  
历史 (History), 206—207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10 注①, 152—153, 163, 171, 173, 197—199, 210, 216  
粮食生产 (Grain production), 47, 142—143, 148, 210, 213—214, 另见  
    农业  
廖沫沙 (Liao Mo - sha), 80  
列宁 (V. I. Lenin), 75, 76  
林彪 (Lin Piao), 14, 15, 19, 69, 74, 78, 79, 93, 136, 175, 179  
林登·B. 约翰逊 (Lyndon B. Johnson), 170, 196, 215, 204  
林巧稚 (Lin Ch'iao - chih), 29—31, 39, 40—41, 49—50, 54  
刘少奇 (Liu Chao - ch' i), 4, 14—19, 62—64, 70, 73—78, 80, 83, 85—  
    89, 95—96, 107—108, 127, 148, 182  
刘文元 (Liu Wen - yuan), 116  
刘易斯·亨利·摩尔根 (Lewis Henry Morgan), 66  
刘雨生 (Liu Yu - sheng), 113  
流行性疾病 (Epidemic diseases), 54  
庐山 (Lushan), 72—73, 74  
陆定一 (Lu Ting - yi), 14, 75

- 陆平 (Lu P'ing), 84
-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On Self - Cultivation of Communists), 75—77
- 罗瑞卿 (Lo Jui - ch'ing), 107
- 洛伊丝·惠勒 (Lois Wheeler), 见埃德加·斯诺夫人
- 麻风病 (Leprosy), 54
- 马海德 (George Hatem), 41, 45—46, 55
-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 (Marxism and Marxists), 94, 97, 116, 142, 192—193
- 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 (General Maxwell Taylor), 188, 218
- 马桥公社 (Horse Bridge commune), 134
- 马修·李奇微将军 (General Matthew Ridgway), 4
- 马祖 (Matsu), 202
- 毛泽东 (Mao Tse - tung), 3—5, 7—8, 10—23, 46—47, 50, 55, 58, 61—66, 80—85, 100, 111—112, 118—120, 136—137, 139, 150, 151, 155
- 毛泽东的健康 (Health of Mao Tse - tung), 180, 205
- 毛泽东的魅力 (Charisma of Mao Tse - tung), 62
- 毛泽东的语录 (Quotations of Mao Tse - tung), 3, 69
- 毛泽东的住所 (Residence of Mao Tse - tung), 159—160
- 毛泽东的著作 (Writings of Mao Tse - tung), 66 注①, 68—70, 71, 77, 192—193
- 毛泽东夫人 (Mao Tse - tung, Mme), 见江青
- 毛泽东思想 (Mao Tse - tung Thought), 13, 15, 19—20, 30, 93, 98—99, 114—116, 142, 151
- 毛泽东与党 (Mao Tse - tung and the Party), 150
- 毛泽东与节育 (Mao Tse - tung and birth control), 42
- 毛泽东与军队 (Mao Tse - tung and the army), 93—99, 105, 122—123
- 毛泽东与刘少奇 (Mao Tse - tung and Liu Chao - ch'i), 70—71, 74—78, 83—

89, 95—96

- 毛泽东与尼克松 (Mao Tse - tung and Nixon), 169—175, 177  
毛泽东与彭德怀 (Mao Tse - tung and P' eng Teh - huai), 72—74  
毛泽东与彭真 (Mao Tse - tung and P' eng Chen), 81—82, 83  
毛泽东与人民公社 (Mao Tse - tung and commune), 142  
毛泽东与上帝 (Mao Tse - tung and God), 83, 181—182, 205  
毛泽东与现代化 (Mao Tse - tung and modernization), 131  
毛泽东与周恩来 (Mao Tse - tung and Chou En - lai), 176—177  
毛主义者 (Maoists), 16, 20; 另见积极分子  
美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of United States), 17, 70, 104, 204  
美国 (United States), 5, 9, 11, 66, 155, 169—177, 181, 185—186,  
187—189, 196, 214, 215, 217—219; 另见中美会谈  
美国国务院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6, 169, 216  
美国海军 (United States Navy), 203  
美国人民 (American people), 4, 70, 163, 207  
美国与蒋介石 (United States and Chiang Kai - shek), 70, 185, 216  
美国与印度支那 (United States and Indochina), 3—4  
美国与越南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200—204, 211  
美式武器 (American weapons), 185, 203  
民兵 (Militia), 102—103  
模范公社 (Model communes), 139—140  
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 (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 163—164  
莫斯科 (Moscow), 71; 另见俄国  
内战 (Civil war), 6, 97, 136, 174, 186  
男女合校 (Coeducation), 44  
男性绝育 (Male sterilization), 41  
南朝鲜 (South Korea), 204  
南泥湾 (Nanniwan), 105—120

- 尼克松与访问中国 (Richard Nixon and China visit), 169—177
- 尼克松政府 (Nixon Administration), 124, 171
- 聂荣臻 (Nieh Jung - chen), 125
- 农村地区 (Rural areas), 102, 105—110, 131, 214; 另见农业
- 农村地区的医疗问题 (Health problems in rural areas), 53—58
- 农村人民公社 (Agricultural communes), 108, 114, 131—138, 151, 212—  
214
- 农村医疗 (Rural medicine), 50—51, 53—58, 100—102
- 农民 (Peasants), 65, 71, 78—79, 94, 102, 108, 112, 124, 131—133,  
135, 136, 139, 141, 218
- 农奴 (Serfs), 182
- 农业 (Agriculture), 75, 124, 131, 147—151, 179, 209—210, 212, 219
- 农业机械化 (Mechanized agriculture), 108, 219
- 疟疾 (Malaria), 53
- 虐待俘虏 (Maltreatment of captives), 120, 165
- 诺尔曼·白求恩 (Norman Bethune), 69
- 欧洲 (Europe), 189; 另见欧洲各国
- 彭德怀 (P'eng Teh - huai), 14—15, 72—74, 77, 80
- 彭佩云 (P'eng P'ei - yuan), 84
- 彭真 (P'eng Chen), 14, 16, 64, 79—84
- 乒乓 (Ping - pong), 8—9, 172
- 破坏分子 (Saboteurs), 120
- 普通人的生活 (Life of man in the street), 21—26
- 汽车 (Automobiles), 25
- 强奸 (Rape), 44
- 乔冠华 (Ch'iao Kuan - hua), 65, 178
- 清华大学 (Tsing Hua University), 7
- 去见上帝 (Goning to see God), 83, 162, 181—182, 205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63, 150, 180, 183
- 人口 (Population), 42, 43, 46—48, 150, 190, 194, 199, 211, 213—214
- (人民) 公社 (Communes), 8, 13, 22, 24, 25, 42—43, 47, 50, 56—58, 63, 73, 75, 102, 179
- 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6, 10 注①, 52, 71, 94, 124, 171, 173; 另见中国
- 国
- 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Celebration of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3—5
- 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 15, 93, 103, 120—126, 165, 186, 203—204; 另见军队; 中国军队
- 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onstruction Corps), 106, 109
- 人民解放军医务工作者(People's Liberation Army medical workers), 56, 100—102
- 《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 84, 88, 181
- 日本 (Japan), 10 注①, 11, 21, 43, 152, 153, 154, 164, 177, 185, 204, 217
- 日本共产党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85
- 三面红旗 (“Three red banners”), 75, 80
- 沙石峪 (Sandstone Gulch), 102, 139
- 山西省 (Shansi province), 42, 139, 213
- 陕西省 (Shensi province), 7, 41, 50, 93, 105, 113, 134, 179
- 上海 (Shanghai), 8, 14, 42, 49, 71, 81, 83—84, 96, 110, 140, 219
- 少数民族 (Minority nationalities), 4, 190
- 社会帝国主义 (Social imperialism), 17
- 社会革命 (Social revolution), 189, 206
- 社会化的医疗 (Socialized medicine), 53
-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115, 78
- 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者 (Socialism and socialists), 13, 75, 124, 182,

189—190

- 沈阳 (Shenyang), 100, 103
- 生产 (Production), 190, 209, 214, 220
- 生产建设兵团 (Army Construction Corps), 106, 109—110
- 生化学家 (Biochemists), 48
- 生活标准 (Living standard), 211, 215
- 失业 (Unemployment), 200, 215
- 十五年计划 (Fifteen - Year Plan), 214
- 石油 (Oil), 149, 210, 214
- 食品 (Food), 24—25, 47, 114, 138, 177, 180, 201, 209
- 士兵 (Soldiers), 103, 105—106, 121—122, 124—125
- 士兵的津贴 (Pay of soldiers), 125
- 士兵的训练 (Soldiers training), 121—126
- 世界革命 (World revolution), 76
- 收入 (Income), 23—24, 134—135, 150
- 首都医院 (Capital Hospital), 29
- 寿命 (Longevity), 46—47
- 税收 (Taxes), 22, 134
- 说假话 (Lying), 165
- 私人农业 (Private agriculture), 212
- 死亡 (Death), 43, 46, 55, 205
- 苏联 (Soviet Union), 9, 65, 109, 155, 179—180, 196, 203, 209, 211;  
另见俄国
- 苏联与中国 (Russia and China), 见中苏关系
- 苏联最高苏维埃 (Supreme Soviet of U. S. S. R.), 63
- 孙子 (Sun Tzu), 123
- 台湾 (Taiwan), 10, 47, 152—153, 163, 171—174, 198, 204, 216—217
- 谭仲 (T'an Chung), 115

- 唐明照(T'ang Ming - chao), 159
- 唐闻生(T'ang, Nancy), 159
- 特务 (Spies), 120
- 体力劳动 (Manual Labor), 112, 116, 219
- 铁路 (Railway), 149
- 土地分配 (Land distribution), 106, 212, 219
- 外国的新闻报道 (Foreign press), 152
- 外科手术 (Surgery), 49—50; 另见针灸疗法
- 外贸 (Foreign trade), 211—212; 另见出口; 进口
- 王广久 (Wang Kuang - chou), 52, 55
- 王明 (Wang Ming), 77
- 王明德 (Wang Ming - teh), 107
- 威廉·Y. 陈 (Chen, William Y.), 33—34, 36, 52
- 卫生 (Sanitation), 52—53
- 卫生部 (Ministry of Health), 55
- 卫生工作者 (Health workers), 55
- 文化 (Culture), 22, 79
- 文化大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 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文盲 (Illiteracy), 22
- 无产阶级 (the Proletariat), 14, 71, 77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4, 7, 12—20, 48, 52, 61, 68, 70, 79, 81, 84—86, 87, 120, 142, 151, 165, 175, 180
- 无产阶级专政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76, 79
- 吴诚 (Wu Chen), 210
- 吴晗 (Wu Han), 14, 16, 79—81, 84
- 吴庭艳 (Diem, Ngo Dinh), 186, 188, 197, 204
- 五七千校 (May Seven Cadres' School), 14, 108—120, 126

- 武汉 (Wuhan), 85
- 武器 (Weapons), 122—123
- 西安 (Sian), 7, 8, 113, 116
- 西北 (Northwest China), 11, 93, 95, 105, 134, 179
- 西伯利亚 (Siberia), 108
- 西藏 (Tibet), 182—184
- 西哈努克亲王 (Prince Sihanouk), 3, 8, 164
- 先进的科学 (Advanced science), 48
- “小红书” (“Little red book”), 69
- 心血管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55
- 新兴力量运动会 (Ganefo), 198
- 新殖民主义 (Neocolonialism), 189
- 性 (Sex), 44
- 性病 (Venereal diseases), 54—55
- 修养 (Self-cultivation), 76
- 修正主义与修正主义者 (Revisionism and revisionists), 78, 85, 104, 116, 120, 165, 190
- 徐宏图 (Hsu Hung-t'u), 35
- 徐秋凤 (Hsu Chiu-feng), 114
- 宣传 (Propaganda), 73
- 宣传的阴谋 (Conspiracy by propaganda), 76—82
- 学校 (Schools), 100—101, 109, 112, 151; 另见教育; 大学与学院
- 学院 (Colleges), 见大学与学院
- 血吸虫病 (Schistosomiasis), 54
- 亚非会议 (Afro-Asian Conference), 198, 210
- 亚洲 (Asia), 见东亚; 东南亚
- 延安 (Yenan), 7, 105, 136, 192
- 燕京大学 (Yenching University), 7

## 索 引

---

- 养猪场 (Piggeries), 8, 102, 115, 117
- 姚伟 (Yao wei), 8, 118
- 姚文元 (Yao Wen - yuan), 81, 83, 84
- 叶海亚·汗 (Yahya Khan), 11
- 医疗 (Medicine), 36—39, 48—51
- 医疗保险 (Health insurance), 56
- 医疗费用 (Medical expenses), 25—26
- 医疗服务 (Health services), 40; 另见医生; 医院
- 医疗教育 (Health education), 53
- 医疗问题 (Health problems), 52—53
- 医生 (Doctors), 35, 39, 54—55, 57
- 医务工作者 (Medical workers), 55, 100—102; 另见医生
- 医院 (Hospitals), 49—51, 55—56, 151
- 艺术家 (Artists), 118
- 疫苗 (Vaccines), 41, 55
- 意大利共产党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191
- 意识形态 (Ideology), 78, 84, 165—166, 190, 206
- 阴与阳 (Yin and Yang), 33—34
- 印度 (India), 189, 194
-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197, 198—199
- 印度支那国家 (Indochinese countries), 3—4, 153, 156, 170, 173, 204
- 英国 (Britain), 217
- 游击队 (Guerrillas), 71, 72, 95, 105, 137, 185, 188, 218
- 友谊医院 (Friendship Hospital), 52
- 与毛泽东的谈话 (Interviews with Mao Tse - tung), 159—166, 178—208
- 与周恩来的谈话 (talks with Chou En - lai), 147—156, 171, 204, 209—
- 220
- 预防医疗 (Preventive medicine), 53, 56

- 原子弹 (Atom bomb), 18, 63, 72, 74, 165, 194—196, 217; 另见核武器
- 约翰·加德纳 (John Gardner), 112
- 约翰·肯尼迪 (John Kennedy), 6, 188, 197
- 越共 (Vietcong), 170, 186
- 越南 (Vietnam), 4—5, 6, 18, 163—164, 169—171, 173—174, 177, 181—182, 185—187, 188, 198, 199—204, 211, 219; 另见越南北方; 越南南方
- 越南北方 (North Vietnam), 170, 201—202
- 越南南方 (South Vietnam), 202, 203—204, 211, 217
- 战争 (War), 10, 153, 155, 172, 181, 201—202
- 张维逊 (Chang Wei - shen), 52, 56—57
- 张闻天 (Chang Wen - t'ien), 73
- 张学良 (Chang Hsueh - liang), 11
- 浙江 (Chekiang), 8, 143
- 针刺 (Acupuncture), 29—39, 48, 55, 57, 100—102, 151
- 政治 (Politics), 122—123, 150
- 政治犯 (Political prisoners), 106; 另见虐待俘虏
- 政治局 (the Politburo), 15—16, 66, 73, 78, 79, 159
- 政治局领导 (Leaders of the Politburo), 64
- 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s), 22, 71, 76, 80, 119
- 中共北京市委 (Peking Party Committee), 16, 17, 84, 161
-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ilitary Affairs Committee), 63
- 中共中央宣传部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paganda Department), 75
- 中国 (China), 见人民共和国; 中国各地区, 如华北
- 中国的版图 (Size of China), 131
- 中国的对外政策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155—156, 166

## 索 引

---

- 中国的美化 (Beautification of China), 22
- 中国的内战 (Civil wars in China), 6
- 中国的人口 (Population of China), 46—47, 150, 194, 199, 213—214
- 中国的少数民族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China), 4, 190
- 中国的生活 (Life in China), 21—26
- 中国的新闻报道 (the Chinese Press), 172
- 中国的政治宣传 (Chinese political propaganda), 3, 14, 17, 70, 161
- 中国革命 (Chinese revolution), 193, 203, 206
- 中国共产党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4, 12—20, 61—63, 68, 71, 74, 77, 80—81, 93, 141—142, 150—151, 182, 206
-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Ninth Party Congress), 12, 150
- 中国共产党章程 (Constitu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85—86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68, 72, 73, 75, 80—84, 139, 150, 161, 182
- 中国军队 (Chinese army), 78, 84, 93—94, 102; 另见军队
-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Sino - Foreig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105
- 中国与俄国 (China and Russia), 见中苏关系
- 中国与国际关系 (China and world relations), 152—153, 155—156, 166, 210
- 中国与联合国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197—199
- 中国与美国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6, 9—11, 124, 152—153, 162—163, 169, 173—174, 196—198, 201—205, 210
- 中国与欧洲 (China and Europe), 152
- 中国与英国 (China and Britain), 214
- 中美会谈 (Sino - American talks), 9—10, 163—164, 166, 171—174, 216
- 中苏关系 (Sino - Soviet relations), 17—18, 63, 72—75, 76, 131, 142, 153—154, 165—166, 190—191, 198, 210, 211
- 中苏友谊医院 (Sino - soviet Friendship Hospital), 52

- 中药 (Herbal medicine), 35, 38, 41
- 中医 (Traditional medicine), 33—36, 38, 57
- 周恩来 (Chou En - lai), 3, 6, 8, 12—13, 31, 43, 47, 64, 89, 93, 97, 126—127, 132, 173—177, 178, 183
- 周恩来与毛 (Chou En - lai and Mao), 175, 176—177
- 周恩来与尼克松 (Chou En - lai and Nixon), 175, 177
- 周文长将军 (General Chou Wen - chiang), 125
- 周扬 (Chou Yang), 14, 80
- 朱德 (Chu Ten), 93
- 朱少清 (Chu Shao - ch'ing), 106—108
- 住房 (Housing), 25
- 庄周 (Chuang Chou), 192
- 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分子 (Capitalism and capitalists), 18, 79, 163, 187, 189, 196, 206, 214
- 宗教 (Religion), 182—184, 205
- “总路线” (The “General Line”), 75
- 佐藤 (Mr. Sato), 217
- 作为建设者的军队 (Army as builder), 105—110
- 作为教师的毛泽东 (Mao Tse - tung as teacher), 161, 206

# 漫长的革命

THE LONG REVOLUTION

〔美〕埃德加·斯诺 著

ISBN 7-5060-2354-7



9 787506 023542 >

ISBN 7-5060-2354-7 定价:15.00元